

目 录

弘扬中华文化 宣传少奇思想 促进旅游繁荣 服务社会发展

特 稿

- 2 刘少奇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学习刘少奇的党性修养理论与实践 / 石仲泉

刘少奇与经济建设

- 14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刘少奇主持国民经济调整的历史贡献 / 贺全胜
22 大跃进时期刘少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浅析 / 唐 强

刘少奇与党的建设

- 28 “我们的修养不能脱离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
——学习刘少奇的党性修养理论与实践 / 聂 勇
31 试析刘少奇修养理论对当前党建的启示 / 唐 芳

刘少奇与军事

- 35 刘少奇与苏北抗日根据地 / 范学恕
39 皖南事变前刘少奇加强新四军党建工作述论 / 刘新庆

刘少奇与文化建设

- 45 刘少奇新闻思想与实践 / 刘伯强
53 试析刘少奇在白区工作期间的宣传工作 / 罗超群

刘少奇家风研究

- 58 刘少奇家书解读 / 李桂芳
64 “成为一个真正对人民有用的人”
——读《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中有关家风建设、子女教育的几封书信 / 赵丛浩

史海钩沉

- 68 刘少奇在瑞金的故事 / 曹春荣
71 魏振卿口述：刘少奇视察高唐姜店 / 徐秋宁

学习·感悟

- 74 刘少奇谈如何“做一个好的党员” / 刘新庆
76 历史丰碑 / 刘振法
77 对讲解工作的几点思考 / 刘徐嘉
79 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讲解员 / 成宣熠

花明园

- 80 《诗影花明楼》散文诗选登 / 摄影：罗 雄 配音：菲 萍
82 歌曲《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 / 词：王 硕 叶翔鹰 曲：王富文
84 纪念刘主席诞辰 120 周年 / 黄树诚、刘丙坤
85 一张老照片的故事 / 孙意谋

工作提要

- 87 2018 年 7—12 月刘少奇同志纪念馆工作提要

资料索引

- 91 2018 年 10—12 月刘少奇同志纪念馆及刘少奇研究相关资料篇目索引

封面图片：1949 年，刘少奇访苏时在莫斯科宾馆的办公室里。
封底篆刻：胡 伟



刘少奇纪念馆 馆刊

刘少奇故里管理局
刘少奇同志纪念馆 主办

2018 第四期（季刊）总第 52 期

主 管：中共长沙市委办公厅
主 办：刘少奇故里管理局
刘少奇同志纪念馆

本刊编委会

主 任：刘 晖 聂 勇
副 主 任：易锦君 黄 可
熊学爱 彭明建
主 编：彭明建
副 主 编：刘伯强
执行编辑：刘新庆
责任编辑：李杏明 李桂芳
罗超群 唐 芳
周雨城 钟辉平
李艳珍 龚知明
校 对：唐 强

印 刷：市委机关文印中心
地 址：中国·湖南·长沙
宁乡·花明楼

邮 编：410611
电 话：0731-87096155
邮 箱：shaoqiguankan@sina.com
网 址：shaoqiguli.com
微 博：@刘少奇纪念馆馆刊
内部资料准印证号：湘A刊2016012号



刘少奇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为纪念刘少奇诞辰120周年而作

石仲泉

刘少奇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成熟的最早领导集体中（以七大的“五大书记”为标志），1922年就与毛泽东有工作关系，但形成密切的共事关系却在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之后。两人的密切共事是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后。1937年王明回国后的延安12月会议，刘少奇坚定地支持毛泽东独立自主的抗战路线，这是他后来到中央辅佐毛泽东的一个关节点。五六年后，他就成了中共中央的二把手。

刘少奇参与党的领导核心虽然较晚，但他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爱国情怀却不晚于其他人。早在1915年5月袁世凯接受卖国的“二十一条”时，他就参加学校的罢课游行，与同学们一起写下“誓雪国耻，勿忘国耻”血书，成为讨袁斗争骨干分子。他还将自己的名字“刘渭璜”，改为“刘卫黄”，意即保卫炎黄故土。这说明他开始把振兴中华民族看作重要使命。1920年夏，他了解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情况，感到中国有了消除亡国灭种危险的办法。一年后，他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参加已经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明确表示：“资本主义已不可能统治全世界了，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必将由人类的努力开始实现，我们处在这时代的人，应把无穷的希望，促进这段历史。”^[1]从此，他作为中国共产党最早一批党员，踏上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艰苦征程。

一、刘少奇成为中国工人运动卓越领袖，白区正确路线光荣代表，奠定他为民族解放和民族

复兴事业奋斗的历史基础

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首先要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这就要进行工农革命斗争。刘少奇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时，就表示首先搞“工人运动”。他在1922年春回国，分配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此后，他与中国工运结下不解之缘，参与领导了许多重要罢工。他从事白区秘密工作，除领导所在省委全盘工作外，也领导该地区工运斗争。这时，他既是工人运动的卓越领袖，又是党在白区正确路线光荣代表。

刘少奇在这一时期的突出贡献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领导安源路矿工人罢工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安源路矿是中国最大近代工业企业汉冶萍公司的主体，拥有1万多工人。1922年9月初，刘少奇来此领导路矿罢工。他作为工人俱乐部全权代表与路矿当局谈判。戒严司令威吓说：如果工人坚持罢工作乱，就将你这个代表先行正法。他毫不畏惧：万余工人的要求正当，你们把我砍成肉泥，也不能使工人复工。解决复工唯一办法就是答应万余工人的正当要求！经过反复较量，当局屈服了，路矿罢工获得胜利。这是没有任何人员损失情况下的全胜，为中国工运罕见。1924年9月，汉冶萍总工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恢复汉冶萍总工会组织，他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二七惨案后，工人运动低迷，唯有安源工运得到巩固和发展。这是中国工运史的奇迹，他也因此成为著名工运领袖。

（二）参与组建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五卅运动。1925年春，刘少奇告别安源，到广州参与筹备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这是他从担负地区工运领导到成为全国工运领导的发端。他负责起草大会文件，组织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10万人游行；向大会作报告，强调民主革命的目标是要推翻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实现民族解放。他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副委员长。会后不久五卅运动爆发，他赶到上海参与领导这场规模宏巨的大罢工。在反动势力准备实施大规模镇压时，他领导一些有影响的大厂工人代表同厂方进行复工谈判斗争。五卅运动这一有20多万工人参加的3个月罢工，是中国工运的空前壮举。他是这次工运的出色组织者。

（三）参与领导武汉收回英租界斗争和组织武汉工人纠察队。1926年2月，党中央调刘少奇到广州主持筹备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加强省港大罢工领导力量。他以很大精力推动各行业工人联合，巩固各级工会；在全国三次劳大的新一届执委会中，当选为秘书长。北伐开始后，他从广州到武汉，参与领导湖北全省总工会，负责鄂、湘、赣等六省工运。1927年1月，他参与领导武汉各界群众收回英租界斗争取得的胜利，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重大胜利。他还组建工人纠察队，同叶挺部队配合作战，打退了进攻武汉的夏斗寅叛军。这支纠察队有5000人、3000条枪，是党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6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决定解散工人纠察队，省总工会接到通知后，变通执行。刘少奇等将破旧枪支集中上缴，将好枪交给已暴露身份的纠察队员带着，投入叶、贺部队参加南昌起义。

（四）领导满州中东路工人复工斗争取得胜利。1929年夏，刘少奇调任中共满州省委书记，

管辖东北三省党的工作。在白色恐怖下，这里的党组织遭到严重摧残，群众斗争沉寂。他到达奉天（沈阳）后，派得力干部在奉天和哈尔滨等城市恢复并整顿党的组织。他本人和省委其他人分头到各重要城市发动组织群众。中东路工人正在进行复工斗争。他巡视了解到中东铁路总工厂工人住宅区党的工作扎实、群众斗争基础较好，决定全力领导这里的失业工人开展复工斗争，直至胜利。他打开党在满州的工作局面后，1930年6月，受中央委派担任中国工会代表团团长，前往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五）坚持工运斗争正确路线，被撤销中央职工部部长。1930年8月，赤色职工国际五大开幕，刘少奇作了关于中国职工运动的发言。他当选为国际执行局委员后留下工作。但他对工运斗争的策略路线与赤色职工国际的认识相左，对中国革命实际的 analysis 遭到共产国际负责人否定，并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1931年秋他回到上海，在六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任中央职工部部长等职。他发现职工运动存在着严重“左”倾，与临时中央的认识产生分歧。临时中央批评他是有系统理论、又有实际的一贯的机会主义路线，撤销了其职工部部长。当年与他共事的杨尚昆写道：少奇同志在那种极其复杂而又艰难的环境中，正确地估计了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情况，明确提出了白区工作的指导方针，主张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既要严格分开，又要巧妙地联系起来；反对那种鄙弃一切合法手段，甚至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混淆起来的做法。^[2]杨尚昆这段评论，是对刘少奇被誉为白区工作正确路线代表的简明诠释。

二、坚定支持毛泽东独立自主抗战路线，开创华北、中原、东南抗战崭新局面，为民族解放



复兴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刘少奇被撤销中央职工部部长后，1932 年冬离开上海到达中央苏区，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等职。这时，毛泽东被解除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专司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之职。刘少奇不顾临时中央在上海的批评，全力支持毛泽东提出的各项经济政策，继续同“左”的错误作斗争。刘与毛没有联手，但无疑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

刘少奇在中央苏区主持筹建有 1.28 万人的红军，被命名为中央警卫师（工人师）。但他没参与中央高层领导，也未在军中任职。红军长征后，他被任命为新组建的红八军团（湘江战役后并入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但在整个长征过程中未参与中央领导决策。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党中央为加强华北地区党的领导力量，任命他为中央驻北方局代表，直接指导北方局工作。这是刘少奇人生道路的一个转折点。由于领导北方局、开展华北抗日游击战争、巩固华北抗日根据地成绩卓著，中央又委派他任中原局（后为华中局）书记。他深入华中敌后，发展苏北，重建新四军，为民族解放走向民族复兴作出了突出贡献。从此，他的人生之旅经历了整整 30 年辉煌。

（一）北方局工作展现新气象，华北抗战开创新局面。1936 年初春，刘少奇到达天津，以中共中央代表名义领导北方局，迅速改变了华北工作局面。他大力贯彻瓦窑堡会议精神，纠正统一战线工作中“左”的思想影响，对推动宋哲元和二十九军抗日起了重要作用。他提议关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的 60 多名干部履行一定手续出狱，以增强华北干部力量；经党中央批准，这批干部分赴各条战线成为中坚骨干。他委派两名同志与

国民党代表接触，他们赴南京谈判成为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最早的滥觞。他支持薄一波等同阎锡山建立起特殊统一战线关系，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放手发动和组织群众，为山西成为八路军开辟的重要抗日根据地奠定了群众基础。他根据新形势，适时地批评中央右和“左”的倾向，对历史上群众运动和统一战线中的错误做了深刻总结，获得毛泽东支持。毛在政治局指出：刘的报告基本上是正确的，他领导群众斗争和处理党内关系，也基本上是正确的。“今天党内干部中像他这样有经验的人是不多的，他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3] 这个讲话是评价刘少奇是白区工作正确路线代表的源头。

卢沟桥事变爆发，揭开了全民族抗战新的一页。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代表赴太原领导华北抗日游击战争。八路军主力开到山西前线，华北进入以中共与八路军为主体的游击战争阶段。他进一步强调独立自主，争取广大乡村成为游击战争根据地。先是领导建立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随后又提出在平原地区发展游击战争，建立了冀中、冀南豫北根据地。这两个根据地不仅牵制日军南侵进展，配合了正面战场，而且使华北抗日游击战争得以长期坚持。他还支持组织冀东平原抗日武装暴动，指导山西党组织同阎锡山的倒退行为进行斗争。华北抗战呈现的生气勃勃局面，与他卓有成效的工作密不可分。

（二）深入华中敌后，开辟抗战独立自主发展的新天地。1938 年秋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是遵义会议后又一次重要会议。刘少奇参加会议，报告了在华北的工作，毛泽东肯定他在华北独立自主进行抗日游击战争的正确路线。六中全会提出“巩固华北、发展华中”方针，成立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原局，承担“发展华中”战略重任。

抗战以来，党在华中的局面滞后。刘少奇的任务就是去开辟抗日游击战争新天地。他明确提出新四军向东发展战略，要求首先建立皖东根据地。针对右倾顾虑，指出：不能一切经过国民党，捆住自己手脚，应放手建立抗日根据地。他的讲话解决了困扰华中党组织多年的思想问题。1940 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在皖东发动反共磨擦。他直接指挥战斗，取得在津浦路西、路东的胜利，创造了在对方优势兵力围攻下固守待援、打守卫战的成功战例。这次胜利还一改过去请回国民党县长主持地方政权、以退让求团结的做法，选派新四军干部担任县长，在多个县成立抗日民主政府。皖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初步改变新四军困难局面，创造了向苏北发展态势，成为华中党的工作转折点。

苏北是联结华北八路军和南方新四军的枢纽，也是华中敌后抗战最能发展的地区。刘少奇认为华中的主要发展方向是苏北，发展皖东是为了给进军苏北提供立足点。为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他电请中央将先行渡江北上的新四军叶飞部留在苏北，并提出华北八路军派三个以上主力团到华中作战。中央同意他的请求，派黄克诚率部来华中。经过黄桥战役，黄克诚率八路军五纵同陈毅、粟裕部在盐城会师。这标志着苏北敌后联成一片，华中局有了最大的抗日根据地。这一格局打通华北、华中联系，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企图将八路军、新四军限死在黄河以北的阴谋，华中敌后形势根本改观。

（三）皖南事变后重建新四军，全面建设华中抗日根据地。1941 年初发生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刘少奇最早获悉这一消息并电告中央。他对新四军军部在皖南的处境一直担心，早就提议将军部转移到江北皖东，但项英（政治委员兼副军

长）犹豫不决，错过良机，导致遭受这次惨烈损失——9000 多人经过 7 天 7 夜奋战，除约 2000 人突围外，大部牺牲、被俘或失散，军长叶挺被扣押，项英等遇难。面对这一突然事变，刘少奇表现了过人胆略和卓越智慧，为重建新四军，巩固和建设华中抗日根据地作了精心部署。

一是重建新四军军部，整编新四军为坚持华中敌后抗战的强大力量。中央接受他的建议，在苏北重建新四军，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新四军统一整编为 7 个师，辖 9 万余人，活动区域扩大。东南局与中原局并为华中局，以刘少奇为书记。重建的新四军完全摆脱国民党当局无理限制，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独立自主，放手发展，各根据地呈现一片新气象。

二是加强政治建军和群众工作，团结社会各阶层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建军就是加强“部队党化程度”，“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完全执行党的政策和命令来完成党的任务”。^[4] 这使华中地方和部队各级干部提高了执行中央路线的自觉性。加强群众工作，普遍组织农救会，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建立各种抗日群众组织，成立苏北临时参议会，建立健全抗日民主政权，对巩固苏北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

三是深入总结皖南事变经验教训，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刘少奇指出：原东南局主要领导一味强调华中特殊，不敢向敌后发展；对国民党无原则退让，人家不允许的事就不敢去做。为了吸取教训，他提出：加强党性教育，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党性就是一切为党为无产阶级利益打算，这个基本点每个共产党员要把它贯彻到实际行动中去。”“人力、财力、物力加上马克思主义就等于胜利。”^[5] 华中各根据地，通过各级



党校培训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他本人也在干部训练班上讲课。在华中两年多时间，他对理论问题思考很多，写了七八篇关于党的思想理论和组织建设的文章，是理论写作的高峰期。《论党内斗争》等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精彩篇章。

三、协助毛泽东执掌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大权，为赢得民族解放、走向民族复兴的革命战争胜利殚精竭虑

抗战开始后，形成两国三方特殊关系。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的战略布局，是主体和两翼配置。主体是党中央，在延安运筹帷幄。一翼是在国统区设立一个中央局，六届六中全会前是武汉长江局，六届六中全会后是重庆南方局。另一翼在沦陷区主要为两个中央局：六届六中全会前是北方局和东南分局；六届六中全会后增设中原局，东南分局提升为东南局，再加北方局，在皖南事变前为三个中央局；皖南事变后，东南局与中原局并为华中局，直至抗战结束都是北方局和华中局两个中央局。就刘少奇言，他先后担任北方局、中原局和华中局一把手，为开辟这两个地区的敌后战场和抗日民主根据地作出了卓越贡献，成为耀眼“明星”。

全党整风运动特别是高级干部整风检讨内战时期的路线后，中央领导层对那个时期路线问题有不同认识，而毛泽东和刘少奇在那时受到排斥、打击，对那时的路线有深刻体会。毛泽东需要刘少奇到中央来。1942年底他回延安后，协助毛泽东执掌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大权，开始形成中央核心领导二把手态势。

（一）参与领导整风运动，进入党中央核心。1942年3月，刘少奇踏上回延安的千里征程，还受命解决所经山东、河北和山西沿途根据地各种

问题。这说明他已作为中央大员在解决中央交办之事。年底，他结束近10个月“小长征”到达延安。这时的延安正在开展整风运动。为了领导全党整风，1943年3月，中央领导机构改组，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中央书记处。重组的中央书记处为政治局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书记处讨论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刘少奇兼任中央组织委员会书记，并参加中央军委，任副主席。这次调整，在组织程序上解决了遵义会议以来毛泽东为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地位，也确立了刘少奇在中央的显著地位。

刘少奇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后，提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突出宣传毛泽东思想。1943年7月，他为庆祝党的生日发表文章，提出这个概念。文章仿效斯大林捍卫列宁、批判俄国孟什维克反对派的思路，分析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赞扬毛泽东是在各种艰苦复杂革命斗争中久经考验的、精通马列主义战略战术的、对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无限忠心的伟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马列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这种历史，在客观上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中心构成的”，这就需要“把毛泽东同志的指导贯彻到一切工作环节和部门中去”^[6]。刘少奇的这一论述，对推进整风运动发生了重大影响。

（二）参与主持党的七大，代理中共中央主席。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党的七大召开作思想和组织准备。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面总结党成立24年来的历史经验。“决议”在谈到党在白区工作的经验时，赞扬刘少奇是“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1945年4月党的七大开幕，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

的报告》，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特点、党的指导思想等重大问题，高度评价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毛泽东思想。报告指出：就革命实践言，毛泽东是“我国英勇无产阶级的杰出代表”，“我们伟大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全党全国人民审慎选择的“伟大领袖”，“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就革命理论言，毛泽东是天才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为灾难深重的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指出了达到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毛泽东道路”。还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同时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特出的、完整的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这是我们党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首次全面评价和完整概括。

七大选举新的中央领导成员，刘少奇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正式形成。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他代理中央主席，作出了这样几项重大决策：一是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紧急调动数十万部队和大批干部，快速抢占东北，争取在国共两党较量中居于主动。二是指导重庆停战协定谈判，争取实现和平民主新阶段。在重庆发生打伤各界著名人士的校场口事件后，指示我解放区严加警惕国民党破坏和平协议。三是指导新四军五师坚持鄂豫边根据地，组建中原军区，准备“以必死之心，来求取生路”突破重围，迎接大规模内战爆发。四是主持起草“五四指示”，改变抗战以来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为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提供指导方针，使即将开

始的解放战争能获得人力物力支持。他代理中央主席10个月，是一生最繁忙的时期，为民族解放走向民族复兴的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

（三）主持中央工委，进行中央委托的各项工作。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1947年夏毛泽东转战陕北，刘少奇东渡黄河，主持中央工委工作一年多，为党夺取解放战争胜利进行中央委托的各项工作。这主要有：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确定平分土地原则，为新中国的土地改革作准备；指导晋察冀军事工作，成立晋察冀野战军，取得清风店战役胜利，攻克石家庄首创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大城市之创例”；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统一财经政策，管理华北地区兵工生产和交通运输，解放区生产建设有了很大发展；合并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中央局，组建新华北局兼任第一书记，两个地区的党政军财全部统一，为夺取全国胜利作了重要准备。1948年4月，毛泽东等到达河北阜平，党中央和中央工委会合。中央工委完成使命，中国革命进入夺取全国最后胜利新阶段。

（四）研究新民主主义经济问题，参与筹建新中国。晋察冀与晋冀鲁豫解放区合并后，华北解放区是全国最大解放区。华北局的工作，一方面是进行土改、发展生产、训练干部，支援前线；另一方面是为筹建新中国作准备，研究怎样组建中央政府、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1）1948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为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筹建新中国进行谋划。刘少奇在会上着重谈了深入研究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成分问题，对新民主主义经济作了系统的分析。毛泽东表扬他说：新民主主义问题，少奇同志分析得具体，两个阶段的过渡讲得很好。（2）1949年3月召开七届二中全会，为全国胜利后各项工作制定方



针政策。他对城市工作发表了要有城乡统一观点、要依靠工人发展生产和召开人民代表会议等意见。毛泽东要他继续研究。（3）受命赴天津考察，解决尽快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问题。他根据毛泽东的四面八方政策指出：劳资两利就是允许资本家剥削。实行新民主主义经济，允许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对工人阶级好处多，坏处少。他的讲话纠正了城市工作“左”的偏向。（4）1949年4月，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民党基本垮台，新中国成立在即。党中央决定由他率代表团赴苏访问，就新中国成立事宜与斯大林交换意见。代表团在苏联与斯大林就贷款、派遣专家、海空军援助等问题举行多次会谈。斯大林表示，完全赞同中共中央通报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形势、召开新政协、组建中央政府和苏中关系等问题的看法。斯大林还说：革命中心由西方移到了东方，现在又移到了中国和东亚。你们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这次访问直接沟通了中共中央同斯大林的联系，对中苏关系的发展和苏联对新中国的态度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参与决策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性变革，开启了为民族复兴而奋斗的新征程

新中国成立了！刘少奇在求学时代立志“想从工业入手改造中国”的期盼，终于来临了。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实现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他提出了不少深刻思想。在这个时期，党中央对某些具体问题尽管有不同看法，但对于实现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认识基本一致，重大决策没有原则分歧。刘少奇协助毛泽东处理党和国家一切重大事务，日理万机，兢兢业业。

（一）对探索建设新中国道路的重要思考。

新中国的家底是积贫积弱、一穷二白。基于这样的国情，建设一个新的社会，只能靠全党和全国人民在实践中摸索前进。刘少奇提出了两个重要思想：一是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中国工业化。1949年8月他指出：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爆发，经济建设的任务就不变。我们就是“要把中国工业化”。1951年2月和7月，还说：经济建设已成为我们国家的中心任务，我们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化与工业化”^[7]。在建设时期，“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二是提出“人民内部的矛盾”概念。他的读书笔记写道：国营工厂管理机关与工人群众之间的矛盾，是国营工厂内部的公私矛盾。“这种矛盾和关系是工人阶级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和关系”，“应该用同志的、和解的、团结的办法来处理这种矛盾和关系”。还指出：“矛盾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根本上敌对的不能和解的矛盾，另一类是在根本上非敌对的可以和解的矛盾。我们在观察问题的时候，必须分清这两类矛盾的不同性质。”^[8]

这是我们党最早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思考。仅此就说明，刘少奇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二）参与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在国民经济基本恢复和大规模土改基本完成后，从1953年起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经过稳定物价、五反运动等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党中央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不利于国民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日渐担忧，开始考虑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1952年9月毛泽东指出：二中全会提出限制和反限制，现在这个内容更丰富了。10年到15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15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改变了建国初期的设想。毛泽东的新设想得到了刘少奇和其他领导人赞同。一个月后，刘少奇赴

莫斯科参加苏共十九大，向苏共中央和斯大林征求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意见。斯大林赞同中共中央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刘少奇转达苏共中央的意见后，毛泽东更坚定了，与刘少奇等人深入地研讨这个问题。1953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接着，刘少奇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代表中央讲话说明了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容。年底，他主持批准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并在次年2月七届四中全会报告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过程和基本内容。他主持全会通过决议，批准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三）担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重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伟大功效”。党中央原本设想我国基本进入社会主义后再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新宪法。1952年刘少奇访苏时受毛泽东委托与斯大林谈了这个想法。斯大林建议，为了驳斥国际敌对势力对新中国的攻击并便于中国更好地开展建设，以提前召开全国人大、制定新宪法为好。毛泽东接受这个建议。从1952年底始，他和刘少奇等就为召开全国人大和制定新宪法作准备。

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刘少奇参与修改，并主持宪法起草委员会逐章逐节讨论。他还负责起草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1954年9月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开幕，他向大会作关于宪法草案报告，指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中国共产党是国家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必须在遵守宪法和其他一切法律中起模范作用。大会一致通过宪法，选举国家领导人。他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刘少奇十分重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

“伟大功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怎样发挥它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呢？他指出，这是一个有伟大功效的制度。为了发挥它的伟大功效，一是建立经常的视察制度，人大代表要分期分批到地方和基层视察。视察对象，应该有好一点的、比较坏的和中等的不同类型，使代表能接见他们所要见的人。二是民主必须和健全法制相结合。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制定了一些法规法令，但远远不能适应民主化的法制需要。全国人大召开后，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等一批重要法律法规，为我国法制建设起了奠基作用。三是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对政府的监督。他说：国家这么大，机关这么多，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但也会有不好的。好的干部如果没有经常的监督也可能变坏。除了广大人民的监督外，还必须加强各级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认真实行国家监督。他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和运转做了开创性工作。

五、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主持国民经济大调整，在探索民族复兴的曲折道路上披肝沥胆、呕心沥血

事非经过不知难。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异常艰辛。1956年党的八大制定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路线，但从1957年起，党在探索道路上不断磕磕绊绊，摔跤子；在“左”与纠“左”的交替中徘徊前进，在正确与错误的交织中曲折发展。刘少奇经历了三“左”三纠，即1958年的“左”和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的纠“左”；1959年庐山会议后期起再犯“左”，1960年下半年又纠“左”；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左”的思想再度发展，1965年初又局部纠“左”。这里，主要谈前两次他所经历的“左”和为纠“左”作



的巨大努力。他参与了“左”的错误，又积极、坚决纠“左”，表现了真正共产党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坦荡胸怀。

（一）参与筹备党的八大，作政治报告，展现了探索民族复兴道路的正确认识。1955年10月，中央决定1956年召开八大。此后，刘少奇投入紧张准备工作。为起草政治报告，他找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座谈，作系统调查研究。在准备阶段，他参与对八大指导思想的调整，强调既反右倾保守又反急躁冒进。1956年9月八大开幕，他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

报告在总结七大以来历史经验基础上，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提出了今后的基本任务。这就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发展社会生产力上来；经济建设执行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总方针；改进党和国家机关职能，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国家法制等。为了保证这些任务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必须继续保持正确领导，努力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坚持群众路线作风；各级组织都执行集体领导原则，扩大党内民主；在全党反复进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教育。八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决议，还明确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刘少奇的报告和大会通过的决议，构成八大政治路线的主要内容。它极大地鼓舞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实现民族复兴而不懈奋斗。

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央领导机构，刘少奇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首位副主席，仍协助

毛泽东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二）对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调查研究和深刻思考。由于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对我国的影响，也由于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有不健全的地方，再加上领导机关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等，国内也发生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和农民退社等事端。对于这些新问题，毛泽东首先提出《论十大关系》，随后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这对刘少奇产生了巨大思想共鸣。因为他在1951年就提出过“人民内部的矛盾”概念。为了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指导实践，他决定到社会基层作深入调查。

通过近两个月调查研究，刘少奇形成许多独到见解，提出了不少改革主张：一是要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使其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许多农民闹退社，说明大社超过生产力发展水平。所有制基本解决后，分配问题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要大力解决。二是要把经济搞活，既有计划性，又有灵活性、多样性。社会主义经济的特点是计划性，但国家计划不可能计划那么多，只能计划一部分，这就需要利用自由市场，既可以补充社会主义经济的不足，也可以帮助把经济搞得多样和灵活。三是改革国家包下来的某些制度，办学校可以多种形式。不仅国家办学，工厂、机关、农村合作社等都可以办学，私人也可以办学。多种形式一起上，就能解决学校不足导致的学生读书难、升学难问题。升不了学的中小学毕业生，也可以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四是人民内部矛盾，大量地表现为人民群众同领导者的矛盾。处理好这种矛盾，关键在领导。某些领导干部搞特殊化，贪图享受，将来会跌交子。要处理好领导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防止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产生。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调查很重视，召集政治局

和书记处会议，听取他的汇报。在毛泽东倡导下，1957年上半年全党形成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热潮。

（三）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热潮中，参与初步纠“左”。1957年夏开始的反右派斗争，“左”的指导思想得到了发展。刘少奇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对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错误也负有重要责任。如果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还是局部性错误，那么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则带有全局性。这个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党为迅速改变国家一穷二白面貌，奋发图强，超英赶美，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畅想曲。刘少奇也指挥了“畅想曲”。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报告，将“十五年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作为全党行动目标，是“畅想曲”的一个音符。他对北戴河会议后全国迅速掀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感到惊喜和振奋，也头脑发热讲了些大话，并在酝酿着共产主义愿景。好在他有注重调查研究习惯。在了解到一些不顾客观条件的蛮干做法和弄虚作假、虚报浮夸现象后，头脑开始清醒，心中感到不安。毛泽东也发现了这些问题。他同毛泽东一起纠“左”，批评“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等。但由于是在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前提下进行的，因而纠“左”努力不坚决、不彻底。在本是继续纠“左”的庐山会议上，由于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陈述了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及其经验教训，有的提法比较尖锐，就被认为是右倾机会主义。会议由纠“左”转为反右，刘少奇也参与批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辨析。庐山会议后，全党开展“反右倾”运动，经济建设又一次掀起蛮干狂潮，进一步加剧了1958年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对国民经济破坏的恶果。这是他始料未及的。

（四）刻骨铭心的湖南农村调查和“七千人大会”报告对经济困难原因的尖锐分析。庐山会议后“全面跃进”的后果在1960年上半年显现出来。国民经济出现令人震惊的滑坡，农业主要产品产量下降到建国前水平。许多地方发生的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现象异常突出，党中央采取紧急措施解决粮荒问题，同时要求干部改变作风。毛泽东提出将1961年作为实事求是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刘少奇带头到湖南农村调查，要住老乡家，睡门板，铺稻草，深入了解情况。经过44天调查，了解到办食堂完全脱离群众；大炼钢铁，山林基本砍光；拆房子搞居民点，怨声载道。看到广大社员吃不饱饭，病了很多，死了一些人，荒了不少田，心情非常沉重。他不断诚恳地表示：这次回来，看到搞成这个样子，中央有责任，要向你们承认错误。这次教训很深刻，要子子孙孙传下去，以后再也不犯这个错误。社员群众回答造成困难的原因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个看法令他震撼，也使他更为清醒。

贯彻经济调整“八字”方针一年多，农村形势日益好转，但城市形势依然严峻。为解决各级干部对调整工作的不正确认识，推动“八字”方针落实，中央决定召开“七千人大会”。刘少奇负责起草大会主题报告，又作主旨讲话。他谈到1958年以来党的工作指出：总的来说，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但不能说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与七个指头关系。有些地区的缺点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湖南农民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能缺点错误是主要的。他强调：要

实事求是，就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从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这还要有勇气，没有勇气就不敢实事求是。他号召全党发扬毛泽东提出的“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精神，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他的报告和讲话，对广大干部从那几年“左”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起了重要作用。

（五）主持调整殚精竭虑，对经济形势的分析与毛泽东产生分歧。“七千人大会”后，为贯彻落实经济调整要求，刘少奇召开小范围的“西楼会议”。他说：“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目前是一个困难的形势，类似非常时期，就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措施贯彻下去。陈云在会上全面分析财政经济上的困难，提出了克服困难的意见，有的说法也很尖锐。

由于一些负责人不同意“西楼会议”对形势的估计，对陈云的看法有非议，为了进一步统一思想，刘少奇又召开 100 多人的中央工作会议（“五月会议”）。他说：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从经济上看，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我们对困难的认识迟了一点，在城市里，在工业方面，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目前这个形势不扭转，国民经济要崩溃。我们应当充分估计当前的困难，以及还没有想到的困难。要准备迎接困难。会议还研究了大幅度精减城市人口，关停并转部分工厂企业，调整计划指标等力度很大的落实措施。他还针对一部分人提出这样调整是否太消极的疑问，指出：我们减少这么多城市人口，关这么多厂，指标调低，不是消极的。缩短工业战线，是为了

加强农业战线。只有这样，才能阻止经济状况恶化。这样的步骤是当前所能采取的最积极措施。我们有这个本事，经过努力，把当前困难逐步克服。会议还提出了包产到户问题。尽管没有展开讨论，但毛泽东了解到情况后，批评刘少奇没有顶住。这预示着两种思想的交锋即将到来。

六、深陷“左”的漩涡，“文革”首当其冲，为党在探索民族复兴的曲折道路上蒙亘古大冤，党拨乱反正走上民族复兴坦途后，终获昭雪平反

1962 年八届十中全会，是党领导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民族复兴事业的一个节点。从 1961 年下半年启动调整国民经济“八字”方针和 1961 年八届九中全会提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起，全党对于集中全力进行调整的认识是一致的。但随着调整的深入和经过调整取得初步成就后，对调整形势怎么看以及对此前工作中缺点错误怎么估计，在中央领导层有不同意见。1962 年秋的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重新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随后又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标志着党的指导思想再次“左”转。刘少奇也难以例外。他在“四清”运动中主持制定的两个“后十条”也“左”。但是，他的指导思想仍有两个侧面。除了“四清”运动的“左”之外，还提出不让重提阶级斗争干扰经济调整工作，并且继续探索经济体制改革和教育制度改革。这是正确和比较正确的一个侧面。如果说这个时期的“左”，主要在城乡社教运动和思想文化领域，那么随着“左”的指导方针发展，到 1966 年 6 月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全局性了。它将“左”的思想发展到极至，是绝大多数人未曾想到的。

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本意，从政治上说，是旨在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在组织上则是要整顿和重建党的组织。刘少奇怎么也

没想到这场突然降临的“文化大革命”，就“革命”的对象言，是冲着他的，并且使他陷入灭顶之灾。由于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以及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作了完全错误的判断，对有不同意见的干部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被视为两条路线斗争，乃至敌我斗争。这就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人为制造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波涛汹涌的洪流中，不能不产生一大批冤假错案。刘少奇作为共和国主席毫无权力保护自己，在遭受惨痛屈辱和严重迫害后，于 1969 年 11 月去世。这是党在探索民族复兴曲折道路上的一大奇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拨乱反正，党和国家走上了民族复兴坦途。1980 年 2 月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全会发表的《公报》指出：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几十年

来一贯忠于党和人民，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一伙出于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目的，捏造材料，蓄意对刘少奇同志进行政治陷害和人身迫害，并对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加以诬陷，统统打倒，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这是我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必须彻底平反。1980 年 5 月，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在刘少奇追悼大会上致词，指出：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彻底推倒了强加在刘少奇同志身上的种种罪名，郑重地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历史宣告了林彪、“四人帮”一伙阴谋的彻底破产，刘少奇同志将永远活在我国各族人民的心中。

刘少奇为民族解放和民族复兴伟业立下的丰功伟绩，重新光耀历史，铭刻千秋。

〔注释〕

- [1] 刘少奇填写的“团员调查表”，1922 年初，莫斯科东方大学档案。
- [2] 参见杨尚昆：《怀念少奇同志》，《缅怀刘少奇》，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 页。
- [3]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 年 6 月 3 日。
- [4] 刘少奇在华中军分区干部会议上关于建军问题的发言记录，1941 年 6 月。
- [5] 刘少奇在华中干部会议上的总结，1941 年 5 月 19 日；刘少奇在华中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1 年 5 月 6 日。
- [6]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00 页、第 293 页。
- [7]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干部会上的讲话，1949 年 8 月 28 日；《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60 页；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党的文献》，1989 年第 6 期。
- [8]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93-94 页。

（作者系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会会长）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刘少奇主持国民经济调整的历史贡献

贺全胜

【摘要】20 世纪 60 年代刘少奇主持国民经济调整，有力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断发展。主要内容是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压缩基本建设投资、缩短工业战线、延长农业战线，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促进工农业协调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为国民经济发展、充实和提高提供了指导，为当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先行做了有益探索，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做出了重大历史贡献，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刘少奇 国民经济调整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对于担当造福中国人民、复兴中华民族的执政重任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艰难复杂而又必须认真直面的重大问题。

“大跃进”并没有带来国计民生改善而是急躁冒进造成国民经济曲折发展，这催促中共党人反思工作方法，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刘少奇此时担任共和国主席，实际主持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断发展做出瞩目的历史性重大贡献。本文试就 20 世纪 60 年代刘少奇主持国民经济调整的历史背景、主要实践和基本经验，略陈管见，以激励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事业蓬勃健康发展，努力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政治追求和时代精神，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一、刘少奇主持国民经济调整的历史背景概说

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时期。如何才能多快好省地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改变和摆脱“一穷二白”面貌，提高国计民生水平，是全党尤其中共最高领导层紧迫深思的重大主题。“大跃进”就是在这种强烈的国家社会改变愿望的环境中发生的探索性实践，试图以此能够达到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美好愿景。但是，这种超越当时社会生产力实际的规模

建设活动，并没有带给国人所预期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理想成效，社会主义建设在艰难曲折中缓慢发展。认真反思和深刻总结“大跃进”以来我国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缜密研判国民经济现状和发展形势，全党全国人民特别是中共最高领导人又率先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此时刘少奇正好担任共和国主席，对这一重大问题的认识，走在全党前列。在这样的国情特点和经济社会背景下，刘少奇肩负起主持国民经济调整的时代重任，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创造性重大贡献。

“大跃进”以来我国国民经济不景气。这种经济状况的内在成因有许多，而最根本要因就是经济建设指导方针上“赶超”冒进急于求成思想所致，主观上演发经济结构失调、生产与消费脱节，民生不济，欲速不达。面对国民经济的现状，刘少奇认为，必须实行改革调整方略，尽快扭转国民经济紧张局面，推进国计民生事业发展。他分析并指出经济困难情况，表现为粮食、副食品、布料、用具等生产生活资料“不够”，也就是说，“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表因上是“天灾”，“这是因为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一九六一年这三年”我国农业因灾“减产了”，但深究其因，是主观要因上的“人祸”，这“就是在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①。从

全国经济情况看，“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②这直接造成了“商品粮供应短缺，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生产秩序混乱，通货膨胀等情况”，民生素质“都大幅度下降”^③。对此，刘少奇提出“现在就是要下一个很大的决心”来调整“回头”，把全党思想转变到国民经济调整上面来，“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回头，还要坚持，那就不是路线错误也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应当好好“总结经验”，实行经济调整，“是时候了，再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④。否则时之已晚，再来调整就更加困难了。这样的艰难经济背景，刘少奇开始了主持国民经济调整工作，把调整改革措施坚决地贯彻落实到经济战线各方面各领域的工作中去。

“大跃进”以来许多工矿企业大量招工农民，造成城镇人口剧增和商品粮供给严重短缺，刘少奇、陈云提出调整国民经济改革尤其是农业改革、精减职工和动员城市人口下乡的观点，以缓解粮食紧张局面。当时工业和文教战线太长，挤压农业经济发展空间，工农业比例失调。因此，调整国民经济的着力点，就是工业战线和文教事业适当地“后退一步”“缩短一点”，相应地延长农业战线，使工农业协调发展。农业滞后，“工业和其他各方面也不能前进”。^⑤这样，刘少奇指令“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关厂、并厂、缩小规模和从城市压缩人员下去的问题”。实现国民经济“各种比例关系安排得适当”。因此，他主持国民经济调整的中心内容，“就是要坚决缩短工业战线，延长农业战线和轻工业战线，压缩城市人口下乡”。只要农业经济形势回升“好转”，就会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好转了”^⑥。1960 年 6 月，刘少奇在上海主持有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部分部委主要负责人参加的经济工作座谈会上直面当年上半年经济建设“问题是比较严重的”，提示全党经济工作要注意防止“计划偏大”“盘子安大”和“浮夸之风”，坚持

实事求是、“冷热结合”，如果再让经济紧张状况“继续下去，现在是一个指头，将来可以慢慢扩大，可以扩大到两个指头、三个指头的”。他反复强调经济建设要遵循经济规律，注意生产与生活、积累与消费、建设速度与计划安排之间平衡发展，从实际出发，动态调整、协调并进，“不要搞那么多基本建设”特别是重复建设^⑦。经济调整工作越主动越彻底就越好，国民经济体系就会较快趋向持续健康发展，实现国民经济调整预期目标，奠定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坚实基础。

二、刘少奇主持国民经济调整的历史过程和主要实践考辨

20 世纪 60 年代刘少奇主持国民经济调整，呕心沥血胼手胝足，辛勤不懈工作。经过两个历史阶段的调整实践，国民经济形势复苏。他为国民经济调整发展和充实提高，做出了历史性重大贡献，由此奠定了他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崇高历史地位。

1、深入全国调查研究，为国民经济调整提供科学依据。1960 年七八月，我们党在北戴河会议作出调整国民经济的重大决策。1961 年 1 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全党努力贯彻落实国民经济调整方针政策。为了更好推动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为经济调整和发展提高提供科学依据，刘少奇力行垂范，率先深入全国工矿企业、农村和林区等调查研究，全面了解经济建设实情，掌握第一手资料，推动改进工作方法，提高调整工作水平。一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部分省市视察调研。1960 年四五月，刘少奇先后视察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部分省市经济建设情况，深入郑州第四棉纺厂、第二砂轮厂、洛阳拖拉机制造厂、洛阳滚珠轴承厂、洛阳矿山机器制造厂，西安机械制造厂、黄河机械制造厂，重庆钢铁公司、重庆建设机床厂、重庆空气压缩机厂，考察长江三峡水电站坝址



三斗坪，视察上海泰山化工厂、上海电机厂、上海汽轮发电机厂等企业，并在全中国机械工业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上海现场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坚持群众路线，“要经常注意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以及经济政策和制度，“包括工资制度的调整”。“此外，要组织托拉斯，组织综合性公司，或联合性企业”，改革不合理规制，实行“以块块为主，统一管理”，推动“技术革命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8]。这一次考察调研，时间长、地域广，主要是工矿企业，视察生产和管理工作，为国民经济调整的决策和实施，做了基础性准备工作。

二是湖南农村调查。1961年四五月，刘少奇深入湖南宁乡、长沙两县农村调查44天。他此行“采取过去老苏区办法，直接到老家”，“一切轻装简从”，“既不扰民，又可以深入群众”调查真实情况。在宁乡县东湖塘公社王家湾生产队调查，发觉“宁乡县问题那样严重”，认为“不进行调查研究的决定出来的东西是不可能符合客观情况的”。^[9]在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调研时，发现公共食堂“缺点不少，坏处不少”，规模大、人口多、浪费严重，认为“从前的政策有问题”，收回自留地、拆房子、禁养家禽牲口等政策不合实际，农民“生活不如以前”了，“在食堂问题上，我们违背了群众的大多数”，我们“应该吸取教训”^[10]。他还“着重谈了如何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和实行群众路线问题”，对于“真正把情况调查清楚，……我看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例如粮食政策、供给制、按劳分配、公共食堂，“这些政策到底正确不正确”，只有“去调查一下”，才能掌握情况的真实性和科学性^[11]。他调查思考，提出允许“自留地、发展家庭副业、发展生活资料可以自由生产”，不能平调产品，凡“以前平调的要赔，以后不准平调”。“我们不能剥夺农民的利益”^[12]，努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三是1961年七八月东北和

内蒙古林区调查。行前，刘少奇听取林业部负责人汇报林业工作，指出：“我国森林资源很少”，坚持实行采伐和造林相协调的方针，“我们这一代不要把森林搞光了。搞光了，我们死后都是要受审判的”。^[13]当黑龙江省委书记欧阳钦等人汇报林业工作时，刘少奇提出林业“可否采取包产办法”，“栽树也可以计件”。刘少奇冒雨视察小兴安岭带岭试验林场的人工更新林和树木园，提出加强林区企业生产管理，充分利用林木，不要浪费，把“采伐、造林、集材、装车任务完成得好，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成本降低，质量提高，节省材料”。^[14]支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他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林业干部会上发表讲话，主要阐述充分利用森林资源、满足国家建设和人民群众需要的方针，以及林区工人工资制度、木材价格、恢复合理规章制度、采伐与更新方式、林业局管理体制等问题，说：“生产关系不适合，就妨碍生产力的发展，调整一下，使它适合了，就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促进森林资源的充分利用，从而满足国家和人民群众各方面的需要。”^[15]强调林业生产“要总结栽树经验”，“要有专业队伍，采取包栽、包活、包成林的办法”，建构并完善林场、工段、小组、个人负责制。^[16]

总之，刘少奇这几次重大调研活动，基本摸清了我国经济建设情况，为国民经济调整和发展提高先行调整探索、理性思考，提供了科学依据，有力推动国民经济调整方针政策及时付诸实践。

2、刘少奇主持国民经济调整的历史过程。刘少奇主持国民经济调整和发展提高，分为两个阶段的历史过程。第一阶段，是1960年下半年到1962年底，主要着力对农业经济调整，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加强农业战线，保证农业生产。这是扭转国民经济困难局面的恢复阶段；第二阶段，1963年到1965年国民经济再调整。这是在巩固第一阶段调整成果的基础上对国民经济体系各行各业实施全面调整与提高，是国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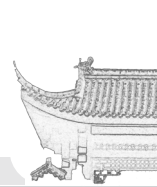
经济充实和提高阶段。经过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努力调整工作，我国国民经济紧张困难局势复苏好转，为建构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一阶段调整，扭转经济困难局面，调整和恢复国民经济结构。北戴河会议，我们党决定从1960年下半年起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恢复国民经济内部结构。经济调整，是从农业经济开始的，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国民经济发展指导方针，适当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和降低重工业发展比重，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重要论断，要求全党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推动国民经济调整。刘少奇担当共和国主席要任，积极响应党中央、毛泽东的指导思想精神，认真主持国民经济调整工作。1961年5月底，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总结“大跃进”以来我国经济建设的成绩与缺点，深刻分析国民经济困难原因，揭示国民经济调整的紧要性，提出了克服经济困难的基本对策。他指出：“总起来讲，这几年的问题，就是工业、交通、文教都办多了。非农业人口搞多了，农民养不起这么多人，所以非减少不可”，即以农轻重为序调整国民经济内部结构势在必行。实质上“就是说，工业战线要缩短，农业战线要延长”。^[17]调整方针政策实施后，国民经济好转初见成效，“农村分了自留地”，有了收成，“农民又养起猪来了，养起鸡来了”，“副食品也比较多了，某些乡村里面的生活可能比城市里面要好一点”。城镇居民看到农村经济形势好转，“就愿意回去了”，“现在有的地方就已经发生了这样的情况”。他总结经济建设经验，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的农业大国里过分抑农扬工是不切实际的做法，这方面我们曾经“是有过一些教训的，这回又有了一次教训，以后不要再重复这个教训了”。^[18]他这一重要论断，在贯彻落实“以

农业为基础”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推进国民经济调整，是走在最前面，代表了全党较好水平。这是他总结“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重要认识成果。

1962年1月，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提出我国经济建设要善于总结经验，扬长避短，“倾箱倒筐地承认曾经有过的和还存在的缺点和错误”，努力贯彻执行经济调整方针政策，使经济困难这类“坏事就能够变为好事”^[19]。他的书面报告和重要讲话，对于当时统一全党思想认识，把注意力集中到贯彻执行国民经济调整的“八字方针”上面来，扭转国民经济困难局面，起到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全国范围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展开后，有些地方出现了隐瞒矛盾和问题的做法、执行调整措施不力的现象，1962年2月，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发现国家财政50亿元赤字未上报，经济形势比较严峻，批评“过去几年没有揭露赤字是不对的。搞不好，经济还要继续恶化”，指示“有赤字要提出来警告大家，采取措施来弥补”。实际上“只有暴露了问题，才好解决问题”。他强调当时国民经济处于困难的“非常时期”，“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20]尽快扭转国民经济困难局势，加快国民经济恢复进程。

刘少奇总结第一阶段调整工作，认为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景光明，全党还要继续坚决执行党中央制定各项调整政策措施，更好更快地恢复国民经济。他指出：“从农业开始的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已经进行了一年多”，取得了显著成效，但还需再接再厉，坚持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我们必须踏踏实实、干劲十足地做好这种调整工作”，勇敢地“去迎接摆在我们面前的新的战斗任务”。^[21]第一阶段调整即“从一九六〇年下半年开始的国民经济调整，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到一九六二年底，取得了显著



成效，一九六三年国民经济出现全面回升的趋势”。^[22]

第二阶段再调整，巩固第一阶段调整成果，推动国民经济进一步全面调整和充实提高。这一阶段，实际上就是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所说“这种调整工作，还要继续进行一段时间”的时间段。1962年4月，刘少奇讨论当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时说：“国民经济有全面失调问题，要全面调整。”“在经济上没有大好形势。”^[23]1962年2月，我们党根据经济建设实际，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出从1963年起，再用两三年时间继续进行调整的重大决策，在争取国民经济好转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善经济建设的内外部结构，为以后国民经济发展创造更好条件奠定坚实基础。这个阶段调整内容，集中表现为大幅度精减城市人口、关停并转低效的工矿企业、调低国民经济计划指标。应当说，实施这些调整措施是积极稳健之举，有利于国民经济恢复、充实和提高。刘少奇指出：“我们减少这么多城市人口，关这么多厂，指标调低”，“缩短工业战线”，“我看不是消极的”，而“是为了加强农业战线。只有这样，才能停止目前经济情况的继续恶化，才能转入主动，才能在以后继续前进。我想，这样的步骤是当前我们所能采取的最积极的措施”。第二阶段“调整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是社会主义建设中间的一个战役”。全党勇于调整改革创新，焕发精神，把调整工作做实做好。他坚信：“我们有这个本事，经过一段时期的努力，把当前的困难一步一步地克服。”^[24]极大鼓舞全党增强经济调整的政治定力和胜利信念。

1962年7月，刘少奇主持国民经济调整的关键节点就是巩固农村集体经济，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坚定“贯彻执行中央正确的政策”，主要是落实“农业、商业方面的政策，以及工业支援农业的政策等”，全面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尤其农村工作的同志“要抓巩固集体经济问题”^[25]，夯实农村集体经济基础。他坚持不懈地贯彻经济调整政策思想。8月，北戴河会

议和随后召开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刘少奇对强调抓阶级斗争、淡化经济调整工作的现象表示担忧，认为阶级斗争不要随意联系，“阶级斗争一联系，什么问题都联系上了”，自然会把“自留地多少，生产责任制、包工包产等等”问题，“都联系上”，特别不要“把全党的力量都用去对付阶级斗争”。毛泽东、刘少奇反复强调，要把经济工作放在第一位。这样，“经济调整工作能够基本上按照原定的计划继续进行”。^[26]

为了制定1963年国民经济计划和提出国民经济发展“三五计划”设想，刘少奇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主持召开了九次中央政治局汇报会，听取经济战线、文教战线、国防工业等方面的工作汇报，对国民经济再调整、充实和提高，做了全面具体部署。他要求全党尤其经济部门坚决继续贯彻落实国民经济调整的各项政策措施，在经济形势初有好转的情况下决不要放松经济工作，指出：“国民经济开始好转，但是还要紧张工作。”继续精减基本建设投资 and 城镇人口，计划“不要一下子搞那么大，搞得大了，又来调整”，就浪费了时间和人力物力财力，“老百姓也受了苦头，国家也受了损失”，很“划不来了”^[27]。

第二阶段再调整，到1965年基本结束，圆满收功，取得了新的更大成绩。这一阶段，“着重于巩固、充实、提高，为国民经济今后的大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28]这一阶段基本完成，标志着国民经济发展“三五计划”开始实行。

3、刘少奇主持国民经济调整的创新性思想内容。

刘少奇主持国民经济调整，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经济发展规律，深入调研探析我国国情和经济建设状况，在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指导下主要对农业经济、工农业之间比例、基本建设战线、国营企业生产管理等方

面实施调整政策和措施，提出了许多创新性思想论断，对于扭转国民经济困难局势发挥了重要作用，推进国民经济调整工作有序运行。一是保持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稳定性，推动农业生产力发展。在小农经济的生产力状况下，集体所有制是适合农村经济发展的所有制形成，有利于调动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推进农业经济发展。刘少奇认为，集体所有制急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思想和做法，超越了现实生产力水平，应当保持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相对稳定性。他指出：所有制形式过渡，“要有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一是生产力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一是人们的觉悟提高到了一定的水平”，不是“想过就过”的，“过渡的迟早，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过渡早了，不仅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妨碍、破坏生产力的发展”。^[29]这些论断，深刻阐述了我国国情条件下保持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相对稳定性现实生产力要义。因此，刘少奇主持国民经济调整，始于农业战线稳定发展的重大实践。“经过生产关系的这个调整，就可以比较彻底地克服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集体所有制“就能够更加适合农村生产力的状况，就能够建立在更加稳固的基础上”。^[30]二是基本建设投资要与生产力相适应，坚决压缩基建规模。基本建设战线过长，违背马克思主义再生产原理，在我国当时生产力状况下必须坚决地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基本建设投资问题突出来了。“大跃进”以来基本建设投资剧增，超越了国家财力，造成了原材料、能源、交通运输、劳动力紧张局面和国民经济结构失调等问题。新建项目猛增，原有企业和设施缺失资金和技术改造革新而不能正常运行，整体上挤压和制约经济建设，形成恶性经济循环。经济调整伊始，党内对这一情况和问题尚未达成共识，调整工作较为缓慢。刘少奇认为，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战线太长，使工农业生产与生活、积累与消费等经济比例关系“发生了严重不协调的现象”^[31]，必须切实执行统一调整政策，“继续缩短基本建设战线，

绝对不允许再有国家统一计划以外的建设项目”。同时，“调整工业企业的生产任务，坚决压缩或者停止那些”高耗低效的“企业的生产”，让优质高效企业“尽可能增加生产”^[32]。刘少奇在讨论1962年国民经济计划时根据马克思主义再生产原理提出“先维持简单再生产，再搞扩大再生产”的论断，调整任务是“大力恢复农业，稳定市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至于基本建设，在最近两三年内，除了维持再生产的工程和十分必要的扩大再生产的某些工程之外，其他都要一律停止”，指示“一九六二年的计划‘必须根据上述原则迅速进行调整’”。^[33]这应当是符合经济实际的最积极有效的调整措施。三是改革和调整规章制度，加强生产经营管理，推进国民经济发展。“大跃进”时期我国工业企业发生结构失调、生产管理混乱、规章制度废弛、浪费严重等现象。刘少奇主持国民经济调整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改革和调整工业企业规章制度，加强生产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1962年6月，刘少奇提出企业生产“要有科学管理，要建立一套规章制度”，“避免生产的盲目性”^[34]，降耗增效。四是统计成本，实行经济核算权。企业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应当统计成本，实行相对独立的经济核算权。刘少奇强调，企业必须“加强经济核算工作”，实行经济核算权。如果“不注意成本、劳动生产率”核算，“就会多花了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各企业要注重净产值这个指标，好好搞经济核算”。实行“有计划工作的综合平衡”^[35]。这些创新性重要论断，对于推进国民经济调整，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4、刘少奇主持国民经济调整的重大贡献。刘少奇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从我国经济建设实际出发主持国民经济调整。调整期间，他以高度政治责任感、科学求是精神和民本勤政思想，积极调整探索，摸清经济情况，提出了许多创新性调整思路 and 办法，为国



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付出了艰辛努力，做出了历史性重大贡献。一是不辞劳苦，深入全国各地调查研究，掌握经济建设情况，为我们党决策和实施国民经济调整方略提供了科学依据；二是积极参与制定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提高的方针政策，并根据调整实践及时修订经济计划指标，推进国民经济回归平稳发展轨道。经过两个阶段的调整，国民经济开始复苏好转，国民经济回归稳健良性运行的轨道。刘少奇总结说：“我们现在进行的调整工作，一方面是巩固已经取得的成就，一方面是巩固已经取得的成就，一方面也是为实现长远的奋斗目标打下新的基础。”全面深入推进国民经济“各方面的调整工作做出新的显著的成绩”^[36]；三是提出了经济调整许多建设性创想。主要提出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延长农业战线、加强林业和企业生产管理、合理布局工农业生产结构、实行经济核算制、计划指标要适当等，折射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光辉；四是积累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为我国经济长远发展和进一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有益借鉴。他强调，经济计划的盘子不宜“安大”，要与现实生产力相适应。实质上这是提示全党遵循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重要经验，尽力规避经济困难和矛盾，推进国民经济稳健有序健康发展；五是提倡全党弘扬研读和践行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优良作风，奠定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稳健发展的坚实基础。刘少奇主持国民经济调整，秉承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济原理和基本理论，注重马克思主义经济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提出了许多建设性观点和办法，为国民经济调整、发展和提高做出了重大历史贡献，由此奠定了他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崇高不朽的历史地位，彪炳史册。刘少奇与 20 世纪 60 年代国民经济调整，历史地联系在一起，不可分。

三、刘少奇主持国民经济调整的历史经验启示

20 世纪 60 年代刘少奇主持国民经济调整，从我国经济建设实际出发，遵循经济规律，制定和实施可行的调整政策措施，积累了“极其丰富的极其深刻的经验教训”，“这些正面经验和反面经验”为当时经济调整提供了指导，也为我国国民经济长远发展尤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稳健推进，践行“五大发展”理念，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良性运行，不忘初心，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有益参考借鉴和经验启示。

1、坚持有计划按比例地客观经济规律发展经济、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的基本思想。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是客观经济规律。经济建设必守经济规律，“按经济的客观规律办事”^[37]，这是刘少奇主持国民经济调整的一条重要经验。新中国成立伊始，我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行政手段主导的经济管理体制。国民经济两个“五年计划”实施，我们党立志探索一条符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刘少奇主持国民经济调整工作，提出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要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开放自由市场、减少行政命令等重要思想论断，引导经济建设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发展。他强调指出：“如果计划搞得不好，国民经济也可能出现大的失调。”^[38]要求国家建设必须正确认识和践行有计划按比例地客观规律而组织生产和流通等各个经济环节，规避经济活动失调风险，保障经济建设稳健良性发展。

2、国民经济体系必须突出农业的基础地位及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贡献。在中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发展水平制约经济建设实践。刘少奇认为，忽视农业，必定造成国民经济结构失调。因此，他主持国民经济调整，就是从延长农业经济战线、夯实农业基础地位开始的。“大跃进”以来“平调”、扩大基建规模的做法，损害了农业生产积极性和农民利益。1957—1960 年，农业总产值下降近 30%，工业

总产值增长 1.3 倍，这“一升一降”引发工农业比例失调、不平衡发展。刘少奇总结说：“工业的发展规模，必须同农业能够提供的农产品（包括粮食、工业原料）和能够腾出的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相适应。”强调“工业必须为农业服务”，“以农业为基础来发展我国国民经济，是我们的一个根本方针”。^[39]调整之初，他就提出“至少最近几年要把农业摆到第一”，“各方面都不要妨碍农业”发展^[40]。这些重要论断，无论在当时经济调整，抑或当代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重视农业经济的基础地位，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具有指导作用和现实启示意义。

3、实行按劳分配原则，调动生产管理积极性，推进经济建设。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是调动生产管理积极性、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内在动力。刘少奇主持国民经济调整，特别注重和切实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劳分配的原则是一定要执行的。”生产劳动数量多、质量好，获得“报酬就多”，否则“报酬就低”^[41]。他在调整工作中发现违背按劳分配原则、平均主义的倾向，“这是极端错误的，定同人民的利益根本抵触的”。^[42]按劳分配原则是激励当时经济调整发展的内驱力，也是当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事业的制度要义。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始终坚持这一动力原则。

〔注释〕

[1] [2] [4] [5] [6] [15] [16] [17] [18] [19] [21] [24] [25] [30] [31] [32] [36] [37] [39] [42] [43] 《刘少奇选集》下卷 [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418-419, 337, 338, 336, 340-341, 344, 347, 336, 339-340, 421-422, 368, 448-449, 461, 356-357, 353, 371, 370, 460, 361, 365, 466.
[3] [20] [22] [28] [33] [38] 《刘少奇传》下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876-877, 898, 920, 920, 900, 848.
[7] [8] [9] [10] [11] [12] [13] [14] [23] [26] [27] [29] [34] [35] [40] [41] 《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488-490, 487, 510, 511-513, 517, 523, 529, 531-532, 553, 559-560, 564-566, 482, 557, 471-472, 492, 479.

（作者单位：中共湖南省委直属机关党校）

大跃进时期刘少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浅析

唐 强

〔摘 要〕本文主要依据《刘少奇年谱》及有关公开资料的相关记载，对“大跃进”时期刘少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进行了初步的考察，主要包括他：1. 对建设速度的认识；2. 对国民经济要综合平衡发展的认识；3. 对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认识；4. 对国民经济主要部门如何发展的认识。并认为刘少奇在该时期内的相关思想既充满真知灼见，又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关键词〕刘少奇 “大跃进” 经济建设

“大跃进”运动是中国“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挫折”^[1]。刘少奇作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是全程参与领导了“大跃进”运动的。考察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内刘少奇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相关思想，有利于深化刘少奇思想生平研究，并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借鉴。

本文根据“大跃进”运动的发展情况，以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十五年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2]的1957年11月18日为时间上限^[3]，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的1960年11月为时间下限^[4]，主要通过考察现有公开资料对该时间段内刘少奇相关社会活动的记载，对其体现的刘少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略作探析。

“大跃进”期间，刘少奇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既充满真知灼见，又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同时也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

1. 关于建设速度问题：从“既反保守主义，又反急躁冒进”到“跃进再跃进”再到“一切经过试验，实事求是，冷热结合”的转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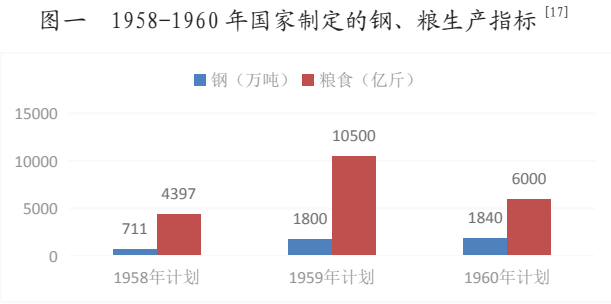
“大跃进”酝酿之初，刘少奇对这一运动的态度是有所保留的。^[5]对于国民经济的建设速度，他的看法在八大政治报告中已经讲得很明白了：“发

展速度必须是积极的，以免丧失时机，陷入保守主义的错误；又必须是稳妥可靠的，以免脱离经济发展的正确比例”^[6]，概括起来即“既反保守主义，又反急躁冒进”^[7]。刘少奇的这一发展思路与毛泽东的想法显然有冲突。毛泽东不赞同“反冒进”，并在1958年1月和3月召开的两次中央工作会议^[8]上，尖锐地批评了“反冒进”，认为“反冒进是政治问题，泄了六亿人民的气”^[9]。

面对毛泽东的批评，刘少奇的认识发生了转变，并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作了检讨：“以前对建设速度估计不足……没有意识到是一个方针路线的争论”，“从当前来讲，右倾保守的危险还是主要的”。^[10]这之后，刘少奇关于经济建设速度的认识逐渐与毛泽东的思路统一起来，并对“大跃进”表现出了强烈的乐观情绪和极大的信心。他在接见民主德国大使时说：“我们过去拟订的计划指标太低了，需要大大修改。我们提出了十五年以后赶上英国的口号，按目前情况来看，……估计十年时间就可赶上。”^[11]刘少奇的这种认识在他代表中共中央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作的工作报告^[12]中体现得更明显了。他在报告中特别强调建设速度问题，称其为“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13]。与此同时，他号召全国人民要敢想敢说，敢做，敢于破除迷信、革新创造，由此“跃进再跃进，

多快好省地完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14]

然而，随着“大跃进”运动的深入开展，高指标^[15]（如图一）、浮夸风的问题日益凸显，“以钢为纲”的指导思想以及农业产量上的巨大泡沫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衡，随之而来的就是国民经济陷入严重困难之中，同时国内出现了大量的非正常死亡现象。异常严峻的形势使人们不得不冷静下来。1960年6月10日，刘少奇主持有各大区和各省、市、自治区以及中央一些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在会上着重强调了实事求是，他说：“一方面，我们应该敢想、敢说、敢做，但是还要切实可靠，充分可靠，一切经过试验，实事求是，冷热结合。”^[16]刘少奇关于建设要“切实可靠”“冷热结合”的提法，其内涵与“既反保守主义，又反急躁冒进”实际上是一致的，这也充分说明了刘少奇在对“大跃进”中的狂热情绪进行反思后，对于经济建设速度的认识重新回到了八大路线上来。



2. 关于综合平衡问题：“国民经济的发展是要综合平衡的”

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平衡问题是经济建设中一个关键点。“大跃进”时期，刘少奇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

首先，刘少奇承认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不平衡是客观存在的，并指出国民经济应该按比例保持一定的平衡进行发展。他说：“不平衡一定会有的……任何平衡总是暂时的和有条件的”，同时，“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经济按比例发展的客观规律，

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需要保持一定时间、一定范围的平衡”。^[18]然而，在“大跃进”的形势下，这种“一定时间、一定范围的平衡”显然需要服从于“提高建设速度”，正如刘少奇在反驳“有些人担心执行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会在各部门之间，在财政的收入和支出之间，造成不平衡”时提到的：“可怕的不是出现不平衡，而是对于不平衡惊慌失措，要求先进向落后看齐，要求削足适履、因噎废食。”^[19]因而，尽管刘少奇在阐释多快好省的方针时曾指出，“为了提高建设速度”，“工业和农业必须同时并举”^[20]，但在过分强调建设速度的大背景下，这些都未得到切实可靠地执行。

1958年底，片面追求建设速度所造成的恶果初步显现出来，国民经济比例陷入严重失调之中。中共中央虽然注意到了这种情况，却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刘少奇也是如此，他曾总结说：1958年的大跃进是“全面的大跃进”，“我们的缺点就是对有些东西的生产注意不够或没有注意，因而引起经济上某些方面的失调”。^[21]这一时期刘少奇一些讲话的措辞及语气都是比较和缓的，着眼点也较为具体。例如，针对工业建设中只注重加工、制造业，忽视原材料工业的问题，刘少奇指出：“现在要优先发展原材料工业，如除钢铁外的农业方面的原材料和化学方面的原材料。”^[22]再如，针对轻重工业比例失调的问题，刘少奇指出：“轻重工业并举要注意轻工业，原料、生产、收购、价格要照顾到轻工业，这个行业差了不行，这是涉及千百万人生活的问题。”^[23]

然而，形势并没有朝着“大跃进”所期盼的方向发展，反而愈加严峻了。为此，刘少奇在庐山会议前期特意提出：“高速度发展，这是从总的形势来说的。它的发展规律，只能是波浪式前进，而不能是直线上升。不能要求每一年都是同样程度的大



跃进，还要准备出现马鞍形的可能。”^[24]刘少奇的发言是有的放矢的，“波浪式前进”与“马鞍形”的提法无不是对于当时经济形势走向的预判。与此同时，他也更加强调经济建设中的平衡问题，并提出要向其“让步”：“国民经济的发展是要综合平衡的，你不管它，它要管你。它不向你让步，你要向它让步。”^[25]这之后，虽然庐山会议后期的主要议题由“纠‘左’”变为“反右”，中共中央也号召全国人民“继续跃进”，但刘少奇关于国民经济发展应当综合平衡的思想却并未改变，并在实践中得到了发展和补充。

3. 关于生产力问题：“第一是要做好人的工作”

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是刘少奇在“大跃进”时期十分关注的问题。成都会议后，他就指出：“现在全国人民和党的主要任务，就是尽快地发展生产力，尽可能高速度地发展工农业生产。”^[26]

刘少奇曾分析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因素说：“思想上的落后和保守，以及有些规章制度不合理，就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27]那么，要怎样打破这个束缚？刘少奇强调：“要发展生产力，第一是要做好人的工作，……当前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就是党如何领导企业。管企业不能见物不见人。”^[28]如何做好人的工作呢？刘少奇指出，应当要注意三点：一是劳动制度、劳动组织的改善；二是生产关系的调整，三是政治思想教育以及技术教育。^[29]

针对第一点，刘少奇提出要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1958年1月，刘少奇致信毛泽东并送上为《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所写的关于制订和修改规章制度的条文。他在条文中指出，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对限制群众积极性及生产力发展的规章制度中不合理部分进行修改或废除，“并且拟定一些合理的新的规章制度”。^[30]此后，他又多次提到这一问题，并还曾特意指出在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的同时要注重

意保护工人利益：“要注意控制一下，不要让大多数即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工人利益受损害。”^[31]

针对第二点，刘少奇提出要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他指出，生产关系应当让步于生产力，因为“生产力是不让步的”，“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不适应就要改”。^[32]而在生产关系中，“当前主要是解决分配问题”^[33]，分配得当，就有利于提高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刘少奇还特别针对工资问题提出意见，他认为既要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劳动多，质量好，报酬就多；劳动少，质量不那么好，报酬就低”^[34]；又要兼顾公平，“‘干不干，两斤半’不好，平均主义要不得，但是高低太悬殊也要不得”。^[35]

针对第三点，刘少奇认为应当把政治思想教育和技术教育相结合。一方面，应当在物质刺激（按劳分配）的基础上开展政治教育，以“使之有理想，为整个社会利益和共产主义利益奋斗”^[36]。另一方面，刘少奇认为最重要的是技术革新。他指出：“政治鼓动不是生产力，只是解放生产力”^[37]，“现在很多人有了很高的劳动热情，但是也要有一个限度。难道可以永远这样发挥吗？”^[38]显然，政治鼓动并非长久之计：“人力是有限的，重要的是技术革新。”^[39]而把政治思想教育和技术教育结合起来，把“高度的热情和高度的技术结合起来”，“就会发挥出巨大的力量”。^[40]

4. 关于各部门发展：

（1）“以农业为基础”

刘少奇历来重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作用，“大跃进”时期也是如此。“大跃进”发动初期，刘少奇就强调农业的基础性地位：“没有农业的迅速发展，就不能有轻重工业的迅速发展，也就不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41]而随着“大跃进”运动的演进，他“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也在不断深化。

1959年11月，刘少奇在海南组织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讨论会，并在会上指出：“社会主义工业化，苏联从重工业开始，对农业的发展，注意不够，我们也有这个问题。所以现在提出农、轻、重，以农业为基础，……免得发生长期性的工农比例、轻重比例失调”，“要特别注意农业问题。……农业发展了，大搞工业也不愁没饭吃，没肉吃”。^[42]刘少奇的话是针对1958年经济建设中“重工业搞得过多，摊子铺得过大”的错误讲的，他还特别告诫说：“这种错误，……以后不要再犯了。”^[43]可惜，事与愿违。1960年上半年全国范围内的严重经济困难以及各地出现的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现象，无不说明“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并未得到有效地贯彻实施。为此，刘少奇强调，要把“农业第一”的观念建立起来：“至少最近几年要把农业摆到第一”，“各方面都不要妨碍农业。……除开尖端以外，其他的工业尽量地要为农业服务，对农业有帮助”。^[44]

从“以农业为基础”到“最近几年要把农业摆到第一”，刘少奇对于农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始终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到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时，刘少奇更是把“以农业为（发展国民经济的）基础”提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个根本方针”的地位上来。^[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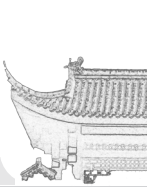
（2）“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必须同时并举”与工农业生产应当搞“多种经营”

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以改变中国贫困落后的面貌，是刘少奇的夙愿。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就曾指出：“只有工业化和电气化，才能建立中国强大的经济力量和国防力量。……才能使中国人民逐步地提高生活水平，能够过富裕的和有文化的生活。”^[46]而由毛泽东大力倡导、亲手发动的“大跃进”正为加快这一进程指出了一种可能性。要如

何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作的报告中比较详细地论述了这一点。他指出，要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做到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47]他还强调说：“发展工业生产既然是全国人民的普遍需要，这就必须执行全党办工业、全民办工业的方针。”^[48]为什么要执行这样的方针呢？刘少奇指出，一方面，中央和地方举办的大企业具有产量大、技术高的优势，“能够解决国民经济中有决定意义的关键问题”；另一方面，中小企业投资少、建设时间短、分布广，具有灵活性，可就原料、就市场，易于产销结合，也“有利于缩小城乡和工农之间的差别”。^[49]

此后，刘少奇还专门提到过工业布局问题。1958年5月21日，他在同中共河北省委、天津市委的负责人座谈时指出，除“比较精密的制造业，可以设在几个大城市”外，“其他许多工厂可以分散，不要只搞在几个大城市”，“凡是能分散的工业应该适当分散。……总之，不在一个城市搞那么多工厂，分散开来，这样比较经济合理，城乡差别会逐渐缩小”。^[50]总地说来，刘少奇关于工业布局的思考是很有深度和远见的。改革开放后，一大批乡镇企业在全国各地开花结果，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此外，“大跃进”时期刘少奇还曾专门提出工农业生产应该搞多种经营的想法。农业上，他指出对水田、旱地、平川和山地都要重视：“农业社光种稻田很不够，收入缺乏充分保证。应当开发山地，组织开山队上山种树，搞多种经营。……有了水田，又有旱地，有了平川，又有山地，这样就能够全面发展农业生产，经营多种经济。”^[51]工业上，他认为工厂应当搞副业：“工厂过去太单打一，不知道搞副业，……不务正业不行，但是单打一不好。应





“我们的修养不能脱离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

——学习刘少奇的党性修养理论与实践

聂 勇

今年是刘少奇同志诞辰 120 周年。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作为我党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在党的建设方面贡献尤为突出。

1939 年 7 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报告，在学员中引起强烈反响。毛泽东看到报告讲稿后褒扬它“提倡正气，发对邪气”，应该尽快发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形成于抗日战争时期，但这是刘少奇长期理论积淀和修养实践的成果结晶，有着持久的生命力和广泛的影响

力，是我们应该持之以恒加以学习的不朽精神财富。

“理论学习和思想意识修养是统一的”

1898 年 11 月 24 日，刘少奇出生在湖南宁乡，并在这里成长。这一时期是民族危亡的动荡年代，无数仁人志士纷纷找寻救国救民之道。青少年的刘少奇也是如此，绞辮改名、反袁驱张、武力救国……在苦闷艰难的求索中，他最终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武器，认为它“确实是真理，确能救中国”。

1920 年春，他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0 月进入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准备赴俄留学。他在这里认真学习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1921 年夏，刘少奇与任弼时等进步青年从上海出发，

赴俄留学，8 月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在东方大学，他系统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后来回忆说：“在东方大学学习八个月……我自己的革命人生观开始确定了……就是为了使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完全解放而奋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提升了刘少奇的思想意识修养，确立和坚定了他的理想信念。

在往后的革命生涯中，他总是把马列主义的理论学习置于重要地位，自己学，也倡导身边人员和其他干部群众学。他不但不断学习理论，更把所学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撰写了大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优秀论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党内首倡党员修养；《做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在战争年代探讨党员标准问题；《论党内斗争》，“理论地又实际地解决了关于党内斗争这个重大问题”；《论党》，首次全面系统阐述毛泽东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员干部“要抓好理论学习，通过坚持不懈学习，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解决问题，坚定理想信念”。在理论学习和思想意识修养方面，刘少奇做到了高度统一。

“要在革命的实践中修养和锻炼”

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国共合作破裂，中国革命转入低潮。中共临时中央在共产国际影响下，依然“左”倾，认为“革命潮流是高涨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在这种形势和环境下，一大批实事求是的党员干部因而遭到打压和排斥，毛泽东如此，刘少奇也如此。

刘少奇根据自身工作实际和思考，认为革命潮流低落，并提出“依乡村来看是高涨的，依城市看来是低落趋势”的看法。1928 年 2 月 13 日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特别会议对刘少奇作了点名批评。1930 年 8 月，他率团赴莫斯科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第

五次代表大会，会后留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却与其领导人在黄色工会和赤色工会问题上意见迥异。被赤色国际领导人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1932 年元旦刘少奇在《工运指南》发表《罢工的策略》一文，批评“左”倾冒险主义者“看不到罢工的困难，异常轻率地玩弄罢工”，使工人运动遭到失败，认为“在不利的条件下，要善于适时地结束罢工，作有组织、有计划的退却”。1932 年 2 月 14 日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时，他针对武装暴动的问题提出“实行武装暴动，群众没有发动起来，条件不成熟”的观点。刘少奇的观点虽然合乎当时的革命形势，却不合乎临时中央的意见。1932 年 3 月 14 日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严厉批评了刘少奇，并转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刘湘（刘少奇）不能担任领导工作。”会议决定撤销他中央职工部部长职务，并发文指责刘少奇所领导的中央职工部和全总党团已陷入“机会主义的泥坑之中”，号召全党“坚决无情的打溃”这种“有害的机会主义路线”。

刘少奇虽然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帽子，但他不忘革命初心，牢记自身担负的使命，以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信念和对党的无限忠诚，为党和人民的利益而始终不渝地坚持工作。刘少奇说：“必须在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中，在各种艰难困苦境遇中去锻炼自己，总结实践经验，加紧自己的修养。”临时中央时期，无疑是刘少奇加紧修养最重要的一个时期。

刘少奇指出，更要“在顺利的、成功的、胜利的革命实践中来锻炼自己，加紧自己的修养”。他以无产阶级革命以前历代的革命者为例，指出他们在事业取得胜利和成功以后，由于没有加紧修养，从而走向腐化堕落，失去革命性，成为了革命的障碍物，走向了革命的反面。他在 1948 年 12 月告诫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



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因此要通过“加强思想教育，提高纪律性”等方式提高加强修养，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

“要自觉地克服和肃清各种不正确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

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天生的，是从社会中产生的，是后天思想改造和实践锻炼的结果。共产党人之所以成为共产党人，不但要摒弃之前身上残留的错误思想意识，还要防止成长与实践各种错误思想意识的腐蚀。

刘少奇指出：“不论是无产阶级或是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党员，不论是老党员或是新党员，他们会或多或少地带有旧社会的思想意识和习惯”，因此“每个党员都必须从各方面加强自己的锻炼和修养”。由于注重不断克服自身不正确的思想意识，刘少奇的修养水平不断得到提升，加强修养的自觉性也不断提高。

他提出，可能存在某些党员，无加强个人修养之心，无改造主观世界之意，所以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时，就很可能不是用这些正确的理论去克服自身存在的问题，反而是“企图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作为达到他个人目的的武器”。这些党员如果不肃清这类错误的思想意识，就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党员。

刘少奇认为，“我们的党员，在党内应该反映正确的思想，学习好的模范，而对于不正确的思想和坏的样子，就不应该学习，而应该反对”。这样才能促进自身和他人的共同提高，提升修养水平。他在自身的工作生活中，一直保持勤俭朴素的作风。他严于律己律人，要求身边的工作人员做到出差“四不准”：不迎送，不请客吃饭搞铺张浪费，不收别

人礼物，参观时不搞前呼后拥的陪同。他要求身边人员不要以他的职务相称，一律称他“少奇同志”，倡导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

学习刘少奇的党性修养理论与实践，一要勤于修“心”。刘少奇说：“一切共产党员的修养，应该首先是思想意识上的修养。”当今时代纷繁复杂，文化、价值观趋向多元，如果我们不加强修养、固守本心，则易精神缺“钙”、动摇理想信念。只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通过加强修养不断实现心灵的净化，我们才能砥砺前行，不负组织的信任与重托。二要善于修“行”。刘少奇说：“我们的修养不能脱离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修心”是改造主观世界的过程，是提升修养的第一步；但归根结底还是要落实到“修行”这个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我们要善于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实践中不断锻炼灵魂，锤炼党性，提升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干部的党性修养、思想觉悟、道德水平不会随着党龄的积累而自然提高，也不会随着职务的升迁而自然提高，而需要终生努力。”提高党员修养是党的建设的永久性课题，更是党员自身“活到老、做到老”的恒久性功课。刘少奇深刻而渊博的修养理论永远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细细品味，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作者系刘少奇同志纪念馆馆长）

试析刘少奇修养理论对当前党建的启示

唐 芳

〔摘 要〕名人思想特别是杰出政治家的思想对现当代的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本文以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为主要范本，从其为当前政党建设提供理论基础；为加强党员个人修养提供方法论；警示政党建设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等三个方面剖析刘少奇修养理论对当前政党建设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刘少奇 修养 党建

刘少奇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等一系列著作在中国党建史上占有重要位置，至今仍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光辉。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部系统论述共产党员党性锻炼和修养的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面世的时间虽然已经过去了78年，但它依然是党员教育的重要读本，对当前的政党建设仍有重要的借鉴、指导作用。本文以《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以下简称《修养》）为主要研究范本，试分析刘少奇以修养理论为核心的党建思想对当前政党建设的启示意义。

一、《修养》为党员加强党性修养提供理论依据

我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了辉煌成就，但新形势下我们党仍然需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党中央实施和开展全面从严治党、加强作风建设、“三严三实”“两学一做”等一系列举措和活动，要求每位共产党员从思想上提升自我，加强自我修养。要加强思想修养，首先要解决为什么要进行修养的问题。刘少奇在《修养》中从人的本性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无产阶级性质两方面回答了党员为什么要修养的问题，对当前党员进行自我思想净化，实现自我提升提供了理论依据。

（一）人的本性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决定了人需要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改造自己。历史唯物主义认为，

阶级斗争是历史进程中必经的阶段。不同地位、利益、思想意识、社会组织方式决定了人类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不断地进行阶级斗争，改造自然，改造社会，也改造自己。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人的思想认识、道德水平在不断完善进步。刘少奇在《修养》中引用孔子和孟子关于修养的论述指出，没有天生的“圣人”，个体需要通过艰苦的修养的锻炼才能不断完善。^[1]他指出，“不要把自己看作是不变的、完美的、神圣的、不可能改造的”，作为社会个体的个人，需要根据时代的变化，不断地改造自己，创造社会精神文明，“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要求”。^[2]在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物质生活飞跃的今天，伴随着信仰缺失、诚信危机、享乐主义、拜金主义、道德感不强等社会问题。因此，为推动国家和社会向前健康发展，作为社会肌体细胞的个人需要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地改造自己，加强自我修养，使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相符合。

（二）无产阶级政党性质要求共产党员不断加强修养，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无产阶级政党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近代历史上最先进的革命者，是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现代担当者和推动者”^[3]，因而，要求其在社会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引领社会风尚，并不断推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建设，维护人民利益。一是无产阶级必须加强革命意志，深入实践，与以往的社会陋习、



旧社会思想残余以及自身不全面的认识作斗争，来达到加强个人修养的目的。刘少奇在深入理解马列主义原理基础上，指出人类社会的进步要求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上不断的改造自己，“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成为社会的新基础”。^[4] 共产党员除了学习历史上的革命经验，还要亲自参加到革命实践中，发挥主观能动性，加紧学习和修养，只有这样，他“才能够逐渐深刻地体验和认识社会发展和革命斗争的规律性，才能深刻的认识敌人和自己，才能发现自己原来不正确的思想、习惯、成见，加以改正，从而提高自己的觉悟，培养革命的品质，改善革命的方法等”。^[5] 二是无产阶级政党队伍参差不齐的素质要求共产党员加强个人教育，增强自我修养。在相同社会背景下，由于个人的出身、位置、教育背景、认知方式等不一样，他们对待革命实践的态度和认识就不一样。不同的品质，不同的经验，不同的主观努力和修养，加上个人所处小环境的感染，个人可能获得不同甚至相反的结果。为了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每个党员都必须从各方面加强和锻炼自己的修养。

二、《修养》为党员加强个人修养提供方法论，有着重要指导作用

刘少奇指出，共产党员“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修养，要有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和处理各种问题的修养；要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战略、战术的修养；要有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修养；要有坚持党内团结、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遵守纪律的修养；要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的修养；要有善于联系群众的修养，以及各种科学知识的修养等”。^[6] 这些修养的习得与提高，则需要通过一些具体的途径。

（一）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以科学的世界观指导实践。列宁曾指出：“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导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7] 共产党员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共产主义世界观，“作马克思和列宁的好学生”，一是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学习这些理论与方法，掌握马列主义精神和实质，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我们观察一切现象，处理一切问题的武器，特别是观察一切社会现象、处理一切社会问题的武器”，如果不能运用且掌握马列主义的武器，就有“迷失方向、背离革命立场的危险”。^[8] 要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和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建立自己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和无产阶级的坚定立场；以马列主义方法，“身体力行，活泼地指导一切的革命斗争，改造现实，同时改造他们自己”。二是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人格和品质。通过学习采用正确的态度、适当的方式，去和党内以及个人各种不正确的思想意识进行斗争，“在革命斗争中认真地去进行自我修养，去检查自己处事、处人、处己是否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9]

（二）实现理论学习与思想意识修养的统一，在革命实践中不断改造思想意识。共产党员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的学习，同思想意识的修养和锻炼，这两者密切地联系起来。所谓思想意识的修养，就是通过思想上的斗争，用无产阶级的意识克服以至于肃清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意识，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做到党员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10]，指的是明确的无产阶级立场。“一个共产党员要有比较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修养，就必须有崇高的无产阶级的立场。”一个党员如果不用马列主义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他要在一切革命斗争中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体现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这也

是不可能的”。^[11] 如何实现二者的统一和融合，就是通过革命实践。《修养》指出，学习马列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品质，“并运用到自己的实践当中，运用到自己的生活、言论、行动和工作中去，不断地改正、清洗自己思想意识中的一切与此相反的东西，增强自己无产阶级的意识和品质”。^[12] 历史与现实当中很多错误都是由于理论学习、思想意识修养、革命实践三者不能统一融合造成的。缺乏理论学习，就没有明确方向指标，会犯“左”倾、右倾、机会主义等宗旨意识缺失错误；缺乏思想意识修养，就没有自省、自持的能力，会犯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徇私枉法、官僚主义等错误；缺乏革命实践，就容易纸上谈兵，犯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等错误。近几年来，我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两学一做”，就旨在党员解决理论与实践脱离的问题，把“学”和“做”结合起来加强个人修养。

（三）坚持严格的组织纪律观，做守纪律讲规矩的共产党员。如果说理论学习是个人修养的法宝，那么组织纪律观就是戒尺，为党员为人行事提供基本准线。坚持组织纪律观，首先要做到党员个人利益无条件服从党的利益。刘少奇在《修养》中指出：“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我们党员思想和行动的最高原则。”一个党员，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都首先要考虑到党的整体利益。为党的、无产阶级、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的事业牺牲个人利益，这是一种“党性”，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最高表现”，是“无产阶级政党原则性的最高表现”，是“无产阶级意识纯洁的最高表现”。只有真正大公无私的人，才能够有很好的共产主义道德，才能有“很大的革命勇敢”，“最好地学习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待同志和党内矛盾才可能“最诚恳、坦白和愉快”，有“最高尚的自尊心、自爱心”。^[13] 现阶段，我党提出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

意识、看齐意识），要求全党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与刘少奇提出的这一点有着深刻的一致性。其次，坚持严格的组织纪律观，要做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党内斗争。要正确认识和辨别党内各种现象、各种思想意识、各种意见和主张；要“学习、提倡并发扬党内一切好的模样和正气”；“不采取自由主义态度”，积极面对党内斗争；不抱机械主义态度；在党内斗争中维护党的团结，纯洁党的思想，巩固党的组织。^[14] 共产党员要以马列主义态度，按照如上要求开展正式的、严肃的、对党有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新时期，全党更加注重严肃党内政治生活，重视党内开展有益斗争，如制定民主生活会制度，并明确规定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参加民主生活会，这些都在党员经受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进而发现问题提升修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修养》剖析政党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具有警示意义

刘少奇在《修养》中对党员队伍中存在和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问题的根源进行了论述，对当前政党建设有一定警示意义。他在“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的举例”^[15]中指出，党内存在一些不正确的思想意识，如：信仰不坚定不明确、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剥削阶级思想、缺乏大局意识等。党的信念是单一和坚定的，但涉及到党员个人修养又是复杂的。对此，刘少奇有着清醒的认识：尽管我们党是代表伟大的、坚强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思想意识的，但“在一些同志的头脑中，还或多或少反映着社会上各种非无产阶级的以至没落的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这些思想可能是潜在的，也可能在小问题上暴露出来，对于党员个人来说，有的时候，“不正确的思想意识潜伏着，被克服着”，但有时候“不正确的意识又可能发展起来，以至支配他的行动”。因此，要建设好一个先进和纯洁的队伍，除了制度强



制规范外，更需要党员个人自省、自持，“要自觉地以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去克服和肃清各种不正确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16]

2013年6月18日，习近平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强调，要“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四风’是违背党的性质和宗旨的，是当前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也是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根源”。^[17]当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意识到在改革开放的冲击下党内出现了思想滑坡甚至贪污腐化现象。围绕这一重大课题，近几年党中央陆续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两学一做”专题教育活动，都旨在通过加强党员思想教育，使党员通过反思自身存在的问题来提高党性修养，保持我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提高党性修养是党的建设的永久性课题。十八大

以来，习近平总同志就如何加强新形势下党的作风建设、提高党员修养，作了许多重要论述。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指出：“要抓好思想理论建设、抓好党性教育和党性修养、抓好道德建设，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和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模范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以理论上的坚定保证行动上的坚定，以思想上的清醒保证用权上的清醒，不断增强宗旨意识，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廉洁操守。”^[18]

读史可以使人明智，鉴以往可以知未来。78年后的今天，重温《修养》，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等一系列要求和举措，更加有力地深入开展党员教育活动，永葆党的先进性、纯洁性。

刘少奇与苏北抗日根据地

范学恕

在全面抗战中，建立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敌后抗战的一大法宝，是党动员发动全民抗战、依靠人民群众的必然选择。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与发展，成为了新四军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日、伪、顽的战略基地，使新四军真正有了自己的“家”。

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由于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它的作用不仅在苏北，而影响整个华中，扩展到华北，乃至全国。苏北抗日根据地优先开辟，与时任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同志大力坚持其如何发展华中的正确战略密不可分，正如陈毅同志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发言所说：“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央南下华中，坚决主张首先向东发展，突击苏北，帮助中央下此决心，使苏北问题顺利解决。”这是陈毅对刘少奇来华中后工作的基本评价之一，充分体现出刘少奇对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杰出贡献。

一、统观全局，运筹帷幄，帮助党中央确定发展华中必须优先开辟苏北的战略方针

1938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全会重申全党应把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独立自主的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当时，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广大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局面已经打开，而新四军在华中敌后相对发展滞后。因此，全会作出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决策，并成立中原局，由刘少奇任书记，领导华中地区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区域的敌后抗日工作。

当时，党中央虽然作出了大力发展华中的决

定，但如何大力发展，尚未形成明确的战略方针。时任中原局书记刘少奇肩负着发展华中的重任，两下河南竹沟进入华中。1939年11月，第二次来竹沟时，由竹沟东进豫皖苏边涡阳县新兴集（彭雪枫支队所在地），由新兴集继续东进皖东定远县藕塘镇（张云逸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在地），一路上进行调查研究，召开各种座谈会，听取各方意见，在他的思想上进一步明确了新四军发展华中的发展方向和行动战略部署。

据当年跟随刘少奇第二次来竹沟的刘瑞龙同志回忆：“少奇同志到竹沟后，立即召开中原局会议，分析当时华中的抗战形势和贯彻党中央发展华中方针的具体部署；认为如果八路军、新四军南北对进，席卷苏北是完全可能的。”由于刘少奇心中一直想着苏北，直到1940年4月，他对刘瑞龙说：“关于苏北的情况，我至今还不很清楚，请你们将阜宁、盐城、东台、宝应和两淮以南的同志找过来，到你处等我，以备询问。”据张震同志回忆：“1939年11月7日晚，刘少奇在新兴集与其个别谈话，谈话中明确提出，我们要向东发展，争取苏北与山东连成一片，对他启发很大。”

刘少奇在新兴集期间，认为彭雪枫在豫皖苏边发展状况很好，心中甚为高兴。于11月11日连续两次致电中共中央，提出发展豫皖苏边区的意见，意见中明确提出要赋予彭雪枫更大的指挥权，将在淮河以北、陇海铁路以南党所领导的一切武装部队统一归彭雪枫指挥。并要求彭雪枫在一两个月后，主力部队及省委干部抽一部越过津

【注 释】

- [1]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
- [2]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 [3]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 [4]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 [5]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 [6]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页。
- [7] 列宁：《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2页。
- [8]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页。
- [9]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
- [10] 文岩：提高党性修养是党的建设的永久性课题——重温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人民日报2015年7月9日，第9版。
- [11]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 [12]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
- [13]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4-45页。
- [14]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6-77页。
- [15]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2页。
- [16]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6页。
- [17]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版，第374页。
- [18]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版，第391页。

（作者单位：刘少奇同志纪念馆）



浦路东创建苏北根据地。这是刘少奇一个大力发展津浦路两侧新四军、选择豫皖苏边、皖东北地区作为下一步东进开辟苏北突破口的战略规划。

当时，在新四军发展方向上，党内意见不够统一。刘少奇主张从皖东、皖东北向苏北发展。时任东南局书记项英由于受王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思想的影响，认为应该向南发展，而且以皖南为立足点。刘少奇在与项英反复联系无果的情况下，多次致电党中央陈述自己的主张。他的意见与党中央战略意图一致，得到了党中央、毛主席的大力支持。

11月19日，党中央复电同意刘少奇对豫皖苏边区的工作部署意见，指出：“整个江北新四军应广泛猛烈的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上去，不到海边决不应停止。”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在决策层面上明确了发展华中、江北新四军必须向东发展开辟苏北的方针。并且，中共中央还指示江南陈毅部抽有力部队过江发展扬州以东，对江北新四军开辟苏北根据地进行了战略性配合。直至1940年3月29日，党中央又作出江南陈毅部队应立即向苏北发展的指示。

中共中央下定了开辟苏北的决心，使刘少奇优先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部署得到有效地实施保障。

二、先后召开中原局三次会议，解决了新四军发展方向、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及开展“反摩擦”斗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为发展苏北创造条件

刘少奇刚刚到达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在地藕塘时，国民党军事当局向江北新四军发出要求撤回江南的电报，妄图阻止新四军东进。并集中了桂系部队、安徽国民党地方武装及顽匪韩德勤部等近20个团的兵力，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向

新四军合围，企图用武力压迫新四军到江南。当时的江北的新四军来自各方，各有自己的发展计划，有的主张向北，有的主张向西。而作为东南局书记项英面对国民党压力一再让步，担心引起冲突，多方限制部队发展，限制群众运动，使江北新四军原计划深入开辟皖东（淮南）根据地不但无法进一步实施，而且部队自身处于危险之中。针对面临的严峻形势，刘少奇在藕塘先后召开了三次中原局会议，会议认真传达贯彻党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明确了江北新四军的发展方向，统一了发展华中、必须优先发展苏北的思想认识。会议批评了有些同志存在着我们“招兵买马”，怕国民党不承认，怕会破坏统一战线的模糊认识。会议强调新四军不仅要有人，有枪，还要有“家”，这个“家”就是根据地，有了根据地，还要有人民自己的民主政权。会议还制定对桂、川、西北军、东北军等中间势力应予缓和、对韩德勤顽固派采取消灭的“反摩擦”方针。

中原局的三次会议对皖东及整个华中起到思想解放的作用，推动了华中工作的转变，迅速打开了皖东抗日的新局面。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刘少奇与张云逸等人一起，先后发起了定远、半塔集保卫战，取得了反击国民党顽军大规模进攻重大胜利。同时粉碎了日伪军的大“扫荡”，创建了皖东抗日根据地，开辟了淮宝地区。成功地取得了发展华中的立足点和实现发展华中苏北计划的前进基地。

三、直陈党中央派八路军一部南下华中，支持新四军开辟根据地，并向苏北发展

为了向苏北发展，刘少奇起初打算抽调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的四个团配合豫东、皖东北的新四军第六支队东进，再由江南派一两个团兵力来配合完成这个任务。后由于江北日伪“大扫荡”

及国民党顽军“摩擦”升级的敌情变化、项英对党中央关于新四军北上发展方针持有异议的意见分歧，这一计划没有能实现。刘少奇在建议江南新四军渡江北上的同时，于1940年3月9日，他还致电中共中央，请派华北八路军至少三个团南下华中，支援新四军创立皖东、淮北、苏北抗日根据地，使八路军、新四军连成一片。刘少奇的这一建议与八路军南下华中的构思一拍即合。遵照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八路军第2纵队政委黄克诚，率三四四旅、新二旅共五个团的兵力南下华中，于6月27日到达涡阳新兴集，与彭雪枫新四军第六支队会合。

对黄克诚部到达华中后如何使用问题，时任中原局书记刘少奇提出了“向东发展、向西防御”的战略部署。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与中原局有过不同考虑，毛主席与彭德怀认为：“黄克诚与彭雪枫会合后，巩固豫皖苏这一重要战略地，同时，派先期南下华中的八路军苏鲁豫支队进至泗县、淮阴地区，向苏北发展。”彭雪枫因处境困难，也希望黄克诚留下，一起巩固发展豫皖苏边地区。而黄克诚也认为彭雪枫的想法与自己比较一致。刘少奇坚持认为：“豫皖苏边不必投放较多兵力，主要应集中皖东北地区，并向苏北发展。首先解决苏北问题再解决皖东、皖北问题，对整个华中的形势是有利的，发展苏北不是通常的开辟工作，对长期坚持华中制高点和发展有决定的意义。”

在刘少奇一再坚持下，毛主席指示黄克诚按中原局意见办。黄克诚立即率新二旅和第六八七团于7月27日到达了皖东北，与先期到达的八路军苏鲁豫支队、陇海南进支队以及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一起改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

四、协调指挥渡江北上陈粟部队、八路军第五纵队，新四军江北部队，合力开辟了苏北抗日

根据地

因党中央和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坚持发展苏北，江南新四军陈毅、粟裕部主动向党中央请缨，其主力于7月8日渡江北上，抵达苏北，并东进至黄桥地区。与此同时，八路军南下部队黄克诚部已抵达皖东北，迅速开展八路军第五纵队整编工作。为了加快开辟苏北的步伐，在第五纵队整编之时，刘少奇命令罗炳辉新四军第五支队第八、第十团及四支队七团，在八路军第四纵队六八七团配合下，于8月2日打响了开辟淮宝地区的枪声，为第五纵队开赴苏北清除通道障碍。

当时的苏北除日本侵略军外，广大敌后地区大都被国民党顽军韩德勤所统治，总兵力有16万余人。韩德勤得知江南新四军7000多人进驻黄桥地区后，反共之心不改。8月21日，在东台下达了分左、右两翼向黄桥地区新四军进攻的作战命令，要求9月2日正式发起攻击，并封锁黄桥地区粮食供应，使江南渡江北上新四军处境相当困难。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陈毅、粟裕一方面致电党中央、中原局、新四军部，请求八路军第五纵队、新四军江北部队给予增援配合，并表明趁其进攻之机一举解决苏北问题，此想法与刘少奇一致；另一方面，根据党中央与中原局要求，在八路军及新四军四、五支队无法及时增援时，依靠自身力量，全力做好单独歼灭韩德勤的部署准备。

9月2日，中原局书记刘少奇致电黄克诚、罗炳辉等“如韩部大举进攻我南面新四军，我苏北各部必须不顾一切全部南下，向盐城、东台、兴化攻击前进，以便增援击破韩之主力。各部务须即日加紧准备，推进至进攻出发点，不得犹豫，至丧失良机。”罗炳辉接电后，迅速率第五支队第八、第九团向东开进，于9月6日终于进至淮



之地位，才有可能应付各种事变。”他还要求陈少敏等要统一新四军的指挥和编制，以增强战斗力量。^[8]

鄂中、豫南党领导的武装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后，李先念任司令员，陈少敏任政治委员。

1938年11月10日，刘少奇尚在延安时，与毛泽东、王稼祥致电项英和周恩来、叶剑英，提议新四军“派二个至三个营交张云逸同志率领过江”到安徽境内活动，因为国民党方面已得白崇禧应允，且安徽中部是最便利共产党军队活动的区域。^[9]张云逸当时是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根据这一提议，张云逸于11月17日带领军部特务营赴江北，并于11月底到达安徽桐城东庄冲。^[10]到达江北后，他认真贯彻党关于新四军东进的方针。1939年2月，他率领新扩编的第三游击纵队和第四支队战地服务团2000余人，东进皖东。^[11]

1939年5月初，新四军军长叶挺亲自赶赴安徽庐江东汤池（江北新四军第四支队驻地），组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下辖第四支队、第五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由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兼任指挥，成为江北新四军的直接统一指挥机构。^[12]

1939年10月12日，刘少奇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豫鄂边根据地情况及工作布置意见，提出要从河南地方党中调一批最好的党员到部队中工作，到敌后创立根据地，并已派人去新四军五、六大队。^[13]他把许多表现突出的党员干部派到新四军中，落实党中央关于“巩固华北、发展华中”战略。这也更让刘少奇感觉到干部人才缺乏问题的严重性。因此，他在1940年1月28日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指出：“此间主要干部的配备相当困难。”^[14]

2、从延安争取干部派往新四军任职。当时的党内军中，人才缺乏是普遍的问题，即使在延安也是如此。正如刘源所说，“父亲恨不得把在延安能带

走的干部全部要来”，刘少奇甚至提出，把在延安“问题不清”的同志带往中原局。对于有思想包袱的同志，刘少奇先进行思想教育再大力起用。^[15]许多同志成为新四军发展华中、开辟皖东、挺进苏北的领导中坚，徐海东是其中突出的一位。

1939年3月，刘少奇奉命回延安参加会议，中原局工作由组织部长朱理治代理。在延安期间，刘少奇向中共中央提出让徐海东一起去华中。经毛泽东征求徐本人意见后，决定将徐海东派往华中新四军，以“更好地发挥作用”。^[16]1939年6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新四军军部发出指示：“中央决定派徐海东去皖整理四支队，担任副指挥兼四支队司令员，不日由延安同胡服一起赴皖。”^[17]

三个月后，刘少奇、徐海东带着40多名干部从延安向竹沟进发。徐海东有着卓越的军事才能，但此时身体状况不佳，长期的军事战斗，让他留下了咯血的毛病。10月上旬，刘少奇与徐海东一行到达竹沟。10月9日，刘少奇即把徐海东派往皖东江北指挥部，任副指挥兼四支队司令员。在皖东，徐海东立即抱病投入整理四支队的工作中。

新四军四支队由红二十八军改编而成，领导人高敬亭因犯错误而被错杀，导致四支队思想混乱、信念不坚定。徐海东到后通过细致的调研、谈心和教育，逐步统一了思想和认识，队伍也不断发展。12月21日至23日，徐海东带领四支队战士在周家岗以受伤22人、阵亡10人的代价击毙、打伤日伪军160余人，^[18]粉碎了敌人对皖东的第一次大“扫荡”。^[19]取得对日作战的胜利，更让四支队战士们扬眉吐气，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1939年11月11日，刘少奇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豫皖苏地区新四军部队的情况，指出彭雪枫的“基干部队已开始走向正规化，部队的各种制度与组织均已建立，服装整齐，情绪很好……已具有老

部队的各种优点，而弱点则更少些……此间局面尚有大开展之可能。给养完全有办法解决，无须延安及军部供给。只要有干部，在年内扩大雪枫部两万至三万人完全可能作到。”^[20]刘少奇重视人才，也善于发现和任用人才。他为江北新四军配备强有力的领导干部，使江北新四军的发展很快见到了成效。经过一段时期的工作，刘少奇领导下江北新四军指挥部组织起大小不等数十支游击队伍，为中原地区开展灵活机动的抗日游击战争奠定了基础，为开辟和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积蓄了力量，为实现“东进、东进、再东进”目标创造了条件。

二、发展调整组织，强化党对新四军的统一领导

刘少奇非常重视党的组织建设。1938年12月下旬，他在赴任中原局书记途中，与中共豫西特委的各县委书记、县委负责同志开会和交流时就强调，要大力发展党的组织；大力发展党，自上而下地建立各县的党组织。^[21]这种工作思路也体现在中原局和发展新四军、根据地的工作中。同时，要实现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重任，没有统一的领导和坚决的执行是不可能做到的。因此，怎样实现中原局各级党、军的统一领导，并实现贯彻执行的高效率，成为刘少奇这一时期思考的重要问题，发展和调整党和军队的组织机构，是他思考和实践的两个方向。

1、发展党的组织。健全和发展党的组织是刘少奇在向中原局所辖各区域党组织的指示中经常提到的要求。1939年9月2日，刘少奇致电彭雪枫、张爱萍：“发展华中是早已确定的方针”，中共豫皖边省委工作必须加强“领导与建立地方党及地方武装，这是创立根据地的最基本的工作。”^[22]1939年11月11日，刘少奇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发展豫皖苏边区的工作意见：“（一）在淮河以北、陇海铁路以南党所领导的一切武装部队，统一归彭雪

枫指挥。”“（二）……加强地方工作，健全省委，发展地方党”……此外，在皖北或到后方建立秘密党与群众工作。19日，刘少奇的意见得到中央批准同意。^[23]

1940年2月4日，刘少奇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皖东工作情况时，指出皖东的游击队和地方党组织在不断扩大、发展，华中工作“是在大踏步发展中”，大感困难且不能解决的问题还是缺少干部，“须请中央、华北及江南给我们以帮助。”^[24]1940年2月28日，刘少奇写信给张爱萍、黄春圃、刘瑞龙，指出：“……必须发展党，建立强大的有领导能力的各级党部。”^[25]

1939年11月中旬，朱理治、李先念、陈少敏等根据中原局和刘少奇的既定部署，在四望山召开了豫南、鄂东、鄂中党和部队负责人会议。会议宣布筹建新的豫鄂边区党委，对豫南、鄂中、鄂东等地的党组织和军队实行统一领导，并对这三个地区的抗日武装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26]四望山会议，实现了豫鄂边区党和抗日武装的统一领导。

2、整合党和军队组织机构。1939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中原局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转山东分局并告彭雪枫、张爱萍：陇海路南、津浦路东的皖东北及苏北地区，“现经中央划归中原局管理，且指定为新四军发展的主要方向，故在该地区活动之八路军部队及其他一切党所领导的部队，如黄春圃纵队等，须统一归彭雪枫同志指挥。”“党在该地区成立苏皖边区军政委员会，以张爱萍为书记，金明、黄春圃等诸同志参加，以统一党与部队及民运、统战工作等领导。”^[27]作为党在淮北苏皖边区的集体领导机构，刘少奇根据形式的发展和实际需要，对苏皖边区军政委员会进行过多次改组。1940年2月7日，中共中原局关于建立苏北、皖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提出要召集八路军、新四军及地方党的高级干部会议，除讨论一般工作外，须决定苏皖军政委员会人选。



3月28日，中原局重组苏皖边区军政委员会，以刘瑞龙为书记，有刘瑞龙、江华、张爱萍、金明、田文扬五人组成。^[28]5月9日，刘少奇致电黄春圃、钟辉、韦国清等，提出成立苏皖边区军政委员会，以刘瑞龙、金明、黄春圃、张爱萍、胡炳云、田维扬、韦国清、钟辉组织之，以刘瑞龙为书记，负责决定军事政治重要问题。^[29]至此，苏皖边区的党、军实现了进一步的统一领导。

为进一步增强党对新四军的领导权，1939年12月31日，刘少奇向中央“提议增加云逸、海东、子久三人为中原局委员”。1940年1月4日，这一提议得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同意。同时，中央还同意将江北指挥部的前敌委员会改为皖东军政委员会，^[30]以统一党、军领导，由中原局指挥。^[31]张云逸当时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徐海东为副指挥，将他们增补为中原局委员，并成立军政委员会，有利于进一步理顺中原局对所辖新四军的领导，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1940年1月3日，刘少奇与张云逸、徐海东、邓子恢致电朱理治、李先念：“所有在鄂中、鄂东活动之党所领导的部队，统归你们指挥节制，部队番号改称挺进游击纵队。”“由纵队首长组织纵队委员会，以理治、先念、质斌、少卿、少敏诸同志组织之，以理治同志为书记。凡属干部任免、部队行动及一切重要军事、政治计划，均需经纵队委员会讨论后执行，这是纵队党的最高领导机关。”1月上旬，李先念等立即落实刘少奇相关指示，在鄂中京山县八字门正式组成新四军豫鄂挺进游击纵队，李先念任司令员，朱理治任政治委员，刘少卿任参谋长，任质斌为政治部主任。^[32]游击纵队及纵队委员会的组建，进一步强化了鄂中、鄂东等区域党组织、军队系统的统一领导。

刘少奇对中原局所辖新四军队伍，进行党组织和军队组织的发展与调整，解决了原来各区域番号

不一、队伍协调性不足的问题，逐步强化了党对江北新四军的统一领导。

三、加强教育培训，坚定新四军队伍的理想信念

通过培训学习和思想教育，坚定新四军骨干力量特别是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是刘少奇新四军党建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在竹沟举办各种类型的干部培训班和党员训练班并亲自授课，培养各级党政军领导骨干和各地方选派的党员干部。^[33]在新四军队伍中，刘少奇的培训教育方式主要是创办宣传媒介、召开专题会议和举办培训学校等形式，以加强思想教育，坚定新四军干部士兵的理想信念。

1、创办宣传媒介。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是刘少奇工作的一大特色。在中原局时期，刘少奇通过创办报纸刊物，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统一党员思想认识，为新四军队伍的团结奋斗增添了力量。

1939年，刘少奇为新四军第四师办的《拂晓报》题词“为抗战的正确路线而斗争”^[34]，为《拂晓报》的意识形态和宣传舆论指明了方向。1939年12月1日，中原局的机关报《江淮日报》在盐城出版，丰富了干部官兵的精神文化生活，因而受到热烈欢迎，对此刘少奇深感欣慰。该报由刘少奇任社长并题写报头，社址设在盐城女中。^[35]12月2日，刘少奇向中共中央报告了苏北地区文化教育及宣传工作等情况，特意指出《江淮日报》订购者甚多。^[36]这一时期，刘少奇指导创办了中共中央中原局机关报《抗敌报》江北版，对外以新四军政治部江北办事处名义出版。他指出：报纸要宣传中原局的工作方针，使党的任务、方针、政策和广大群众见面，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并变成群众自觉自愿的行动。^[37]他办报的目的不仅是教育党员干部，而是将受众覆盖到江北新四军的所有成员，激发新四军团结一心的昂扬斗志。他还

指导创办了中原局宣传部刊物《江淮》。1940年12月15日创刊，刊登党的理论和抗日宣传等方面的文章。^[38]在创刊号上他以“胡服”的笔名发表《论抗日民主政权》一文，约5000字，阐述抗日民主政权的性质、任务和组织原则^[39]，鼓舞干部官兵们树立起建立和发展抗日根据地和政权观念、信心。

2、召开专题会议。刘少奇到达皖东后，通过调查研究，认识到当地工作的不足和弱点。1939年12月14日，刘少奇电告中共中央书记处：“我到皖东已数日，情况大体了解……四、五两支队减员很大，人数均不充足。地方工作薄弱，建立根据地的观念甚微弱。”^[40]这种状况的存在极大地影响了党关于“巩固华北、发展华中”战略意图的实现。

1939年12月，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中原局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向华中敌后发展的方针，号召新四军江北部队坚决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限制，以实际行动实现中共中央提出的东进意图。^[41]1940年1月18日，刘少奇参加新四军第四支队政治工作会议，并讲话。^[42]1940年7月1日，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召开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九周年大会上，刘少奇作题为《做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的报告。^[43]他在报告中指出：要建设一个好的党“最基本的还需要我们有很多很好的党员”，并号召党员：尽心负责地为党工作，爱护党的每一事物，如自己的事物一样；为党的与劳苦大众的公共事业而牺牲；做一个终身的好党员，为党的利益、无产阶级的利益亦即人类最后解放的利益而奋斗到底。^[44]

3、创办培训学校。创办学校也是刘少奇加强党员教育的重要方法。1940年2月20日，刘少奇向中共中央建议：在华中立即成立抗大分校或新四军干部学校，吸收因受李品仙压迫而逃往新四军的大批青年学生学习。^[45]在2月24日得到中共中央军委复电同意后，刘少奇立即着手创办抗大分校。1940年3月，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分校（“抗大第四分校”）在豫皖苏边区的河南涡阳新兴集创建，校长彭雪枫。同年6月底，抗大总校华中派遣大队南下豫皖苏边区，与抗大第四分校合并，仍名为抗大第四分校。校长彭雪枫兼，副校长吴芝圃兼，教育长方中锋（后为刘清明）。学员组成2个大队，下设6个中队，另设直属防训队、女生队，共1000多人。该校在抗战时期江淮平原的艰难条件下坚持办学，共培养了近5000名干部，为新四军第四师和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46]该校是新四军中成立最早、历时最长的一所分校，也是南京陆军指挥学院的前身。

1940年11月，刘少奇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军政干部学校、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干部学校、新四军皖东干部学校等部，合并组建抗大第五分校。陈毅任校长。12月2日刘少奇在向中央汇报时指出“抗大第五分校已吸收苏沪青年六百余人来学习”。^[47]刘少奇还充分利用当地的小学中学等资源培训新四军的党员和干部。这些举措对于当时为新四军培养了大批干部、缓解干部紧缺的局面，发挥了党员干部在新四军中的导向和定力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政军民学，东南西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48]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中国共产党建军的根本原则、优良传统和突出优势。刘少奇在皖南事变前加强新四军党建工作，为新四军坚持明确了政治方向提供了政治保障，也是江北新四军得以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至1940年底，新四军抗日根据地达4.4万平方公里，根据地人口1400余万。^[49]新四军主力部队从1938年4月的10329人发展至1940年底88744人，八倍有余。^[50]也正因如此，刘少奇在皖南事变后能迅速领导重新组建新四军军部，继续发挥新四军“铁军”的作用。



这一时期，他经常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报《中国工人》和其他一些工人刊物上发表指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宣传文章，深受工人群众的欢迎。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刘少奇出色地利用新闻宣传阵地做好革命宣传工作，鼓舞革命斗志、指导全国工人斗争。1928年，刘少奇和陈潭秋在天津创办顺直省委机关报《出路》，并撰写了《怎样改造顺直的党》等文章，对克服党内的悲观情绪，有效领导北方的革命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还在中共中央党刊《布尔什维克》上发表了许多文章，指导全国工人运动。1930年夏，他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当选为执行局委员，会后留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他利用国内外报刊媒体，撰写了一系列的文章，介绍中国职工运动的情况。1931年秋，刘少奇回国后，担任中共中央职工部部长、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他更加重视新闻媒体的宣传工作，多次指示全国总工会的同志要注重新闻宣传，做好运动低潮时期工人思想教育的宣传工作。这一时期，他以“仲篪”的笔名在《工运指南》上发表多篇文章，明确提出白区工作应采取以防御为主的指导方针。1933年，刘少奇负责主持编撰《苏区工人》，并根据苏区职工运动的特点，在《苏区工人》《斗争》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文章，指导和推动苏区工人运动的发展。

长征和抗日战争时期，刘少奇充分利用新闻宣传工具，宣传党的抗日方针和政策，认真进行抗日宣传和开展党建工作，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杰出贡献。1936年春，刘少奇赴华北，先后任中共中央代表、北方局书记，坚定地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以“K.V”、陶尚行、莫文华、吕文等笔名，在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报《火线》及其他公开出版物上，发表了一系列阐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指导白区工作的文

章，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936年，他组织创办《华北烽火》《华北评论》等刊物，阐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1939年，刘少奇亲自负责和领导中共中央中原局机关报《抗敌报》江北版的工作，并先后领导创办中共中央华中局机关报《江淮日报》和《真理》，宣传党的抗日方针和政策。他经常还在中共盐阜区委员会机关报《盐阜大众》、中共淮北区委员会机关报《拂晓报》以及新四军部队出版的《前锋》《迈进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鼓励新闻宣传工作。1939—1941年，刘少奇在党内报刊上连续发表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一系列的加强党的建设的宣传文章，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我党敌后根据地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刘少奇的新闻宣传工作和思想理论教育工作。1943年3月，刘少奇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除协助毛泽东做好军政工作之外，他还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做好党的理论建设和新闻宣传领导工作。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对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新闻宣传思想），做了完整的概括和系统的论述。

解放战争时期，刘少奇充分利用新闻宣传工具为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服务。1945年，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期间，认真组织好军事斗争和新闻宣传两方面的工作。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刘少奇都具体协助毛泽东指导新华通讯社的新闻宣传工作。1947年，刘少奇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期间，十分重视新闻宣传的作用，特别重视发挥新华社的舆论宣传作用。1948年10月，刘少奇在河北西柏坡对《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华北分社的记者们发表了著名的《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充分肯定了党的新闻报刊工作的重要作用，阐明了无产阶级新闻工作的性质，强调了记者工作的原则以及记

者的修养等问题，为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2、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新闻宣传实践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刘少奇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对新闻宣传工作仍然倍加关注。他虽肩负重任，日理万机，仍然一如既往地具体协助毛泽东指导《人民日报》、新华通讯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宣传工作。他针对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宣传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作过多次重要讲话，指导我国新闻宣传工作在建国初期得以迅速健康地发展。对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许多重要文章和社论，他都要亲自审阅、修改。每到



1951年5月，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作报告

一个地方，他都要嘱咐秘书尽快把当地的报刊送给他看。他对送来的报刊，看得非常仔细，密密麻麻地进行批阅，办得好的他表扬，办得不好的他批评，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给新闻工作者以极大的鞭策和激励。

刘少奇在新中国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事业的建立过程中，根据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新情况，发挥、完善、补充、发展了毛泽东的新闻思想，使新中国的新闻宣传工作能够沿着无产阶级新闻思想指引的方向和实事求是的路线健康发展。1951年，他组织召开全国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5月7日作了

重要讲话，5月23日作了总结报告《党在宣传战线上的任务》。1956年5、6月间，刘少奇为起草党的“八大”政治报告，先后两次听取了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和广播事业局负责人的汇报，5月28日，在新华社编委会汇报新华社及报刊工作情况和问题的汇报会上，他对新华社性质、任务、新闻报道的基本要求以及报刊工作等问题，作了极其重要的批示。

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和广播事业局也按照刘少奇的指示，积极进行了新闻改革，取得了好的成效。

1961年刘少奇在湖南调查时，与《人民日报》记者进行了诚恳地谈话。对某些报刊在“大跃进”期间的浮夸报道，做了严厉的批评，同时也分析了发生错误的原因，

并提出了纠正的方法。

二、刘少奇的新闻思想

半个世纪的新闻宣传实践，刘少奇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他在领导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宣传工作时，既尊重新闻工作的基本规律，又注重中国新闻宣传的特殊实际，以总揽全局的战略眼光，善于针对现实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善于从具体实践中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认识，用于指导和处理新闻宣传工作实际，大胆而又实事求是地创立了一套系统而又有独到见解的新闻思想。

他在长期新闻实践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注重从群众的角度阐述新闻工作中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报刊要充分发挥组织和团结群众以及指导革命斗争的作用，要发挥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作用。记者要忠实地反映群众的呼声、要求，要如实地反映党的政策在执行中的情况和问题。人民是革命报刊的主人，新闻宣传工作者一定要向人民说真话，为人民坚持真理，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刘少奇这些植根于新闻宣传实践中的真知灼见，对我国无产阶级新闻宣传工作的发展和壮大，对无产阶级新闻理论的建立和完善，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1、注重理论联系实践，丰富和发展无产阶级新闻思想。

刘少奇的新闻思想继承和发展了无产阶级新闻思想的发展脉络，奠定了中国无产阶级新闻理论的构建。他关于新闻与新闻工作的理论观点，它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革命的新闻实践的产物。他十分重视新闻工作，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新闻思想。

一是注重新闻工作的重要性。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新闻工作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新闻事业得到蓬勃发展的机会，报纸、刊物数量很多，广播电视网遍布全国，带动和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也提高了国民的素质。新闻媒介具有双重属性，它向人们宣传党的思想，党的号召，党的理论，具有党性原则；同时，又是代表人民的利益，代表人民的想法，具备人民性。因此，新闻工作是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它既要对党负责，也要对人民负责。新闻媒介是加强党与群众联系的纽带和桥梁。刘少奇也始终认为：

“新闻工作很重要，党很重视这个工作。党历来的文件书刊都曾说明党报的重要性”^[2]，“办报是联系

群众很重要的工作”^[3]，“报纸办得好，就能引导人民向好的方面走，引导人民前进，引导人民团结，引导人民走向真理。如果办得不好，就存在着很大的危险性，会散布落后的错误的东西，而且会导致人民的分裂，导致他们互相摩擦。因此，新闻工作的影响是很大的”。^[4]

二是要坚持以马列主义理论作为新闻工作的指导思想。列宁说过：“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5]对新闻工作来说，也是一样，只有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思想和行动的指南，才能真正起到党的喉舌作用。刘少奇曾说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我们观察一切社会现象、处理一切问题的武器，特别是观察一切社会现象、处理一切社会问题的武器。如果我们不能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器，我们就不能正确的认识和处理在革命斗争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就有迷失方向、背离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6]。刘少奇认为新闻工作者应该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我们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需要长年累月的学习再学习，只有用马列主义的理论来武装自己的头脑，新闻工作者在写东西的时候，才不会偏离方向，才不会犯政治错误。

2、坚持依靠人民群众，才能夯实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基础。

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和以往历史上任何新闻事业相比较，它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的人民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政治立场，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唯一宗旨。刘少奇认为，新闻工作需要人民群众的支持，也需要人民群众的参与，坚持依靠人民群众，走群众路线，才能夯实新闻事业的基础。

一是要坚持深入群众，学习群众。刘少奇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开门见山地说道：“你们

写东西是为了给人家看的，你们是为读者服务的”^[7]，“你们是人民的通讯员，是人民的记者，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8]，刘少奇要求新闻记者“要和群众生活在一起，了解他们真正的情绪和要求”^[9]，写群众所关心的和群众要求解决的。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作为新闻工作者，只有深入群众，了解群众，向人民群众学习，才能做好每一篇宣传报道，才不会出现刘少奇所说的“客里空”现象，才可以充分发挥“桥梁”的作用。报纸的好坏，关键在于群众的反映，只要新闻工作者处处为群众着想，深入了解民间的疾苦，反映他们的真实情况，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刘少奇说过“党依靠你们的工作，指导群众，向群众学习，因此，你们做得好，对党对人民的帮助就大；做得不好，帮助就不大”^[10]，所以，作为新闻工作者，应该把群众的切身利益放在首位，应该用认真负责的态度报道人民群众的真实想法，用客观的事实向人民群众阐述我党的正确主张、决策。

二是要以人民群众的满意作为新闻工作的检验标准。“看报的人从你们那里得到材料，得到经验，得到教训，得到指导，你们的工作就是做好了。”新闻事业办得好坏，唯一的标准是我们的服务对象，群众的反映，新闻工作者的群众观点，主要表现在时时处处考虑到群众的需要，群众的愿望，群众的困难，群众的意见，并且根据这些来安排宣传内容。区别不同的读者进行不同的宣传报道，目前，我国的报纸、刊物数量很多，广播电视网遍布全国，每天同广大群众见面，随时随地影响着群众的思想和行动，舆论导向正确，人心凝聚，精神振奋；舆论导向失误，后果严重。同时，报纸它具备双重属性，它是代表党政的报纸，具有党性原则，它向人们宣传的是党的思想，党的号召，党的理论；同时，报

纸又是代表人民的报纸，它代表人民的利益，代表人民的想法，具备人民性。它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两者的统一，它既要对党负责，也要对人民负责，这两者的联系，所依靠的便是报纸的影响，报纸是桥梁，是喉舌，只有依靠报纸，才能加强党与群众的联系。

在建国前，刘少奇在当时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中，就已经提及过：“我们党必须和广大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如果和群众联系不好，就要发生危险，就会像安泰一样被人扼死”^[11]，而怎样保持这种联系并且巩固这种联系呢，这就需要报纸的不断宣传、报道，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反映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报纸应当把国家的政策，党的方针告诉广大群众，向广大群众宣传好的思想，好的理论。我们宣传的目的是为了发动群众，引导群众向好的方向走，大家团结起来，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奋斗。而要组织好群众，便要靠党的方针、政策，正如刘少奇所说“要了解人民群众中的各种动态、趋向和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反映”^[12]，就是要把群众的呼声困难反映给党，以便制定新的、正确的政策。

三是新闻宣传要坚持原则性。1961年5月，刘少奇与《人民日报》副总编胡绩等谈话时指出：“你们宣传了很多高指标，放‘卫星’，《人民日报》提倡错误的东西，大家也以为是中央提倡的。在报纸和党委的关系方面有两种偏向，一种偏向是脱离地方党委的领导，认为党委领导就不能批评，因而就闹独立性；一种偏向是完全听党委的话，因而就出现浮夸这类事，什么公共食堂好，放‘卫星’。作一个共产主义的新闻记者，在把坚持原则性和坚持纪律性结合起来。一方面要服从党委领导，要坚持纪律性，一方面也要敢于向党委反映问题，提高意见，要坚持原则性”^[13]。

3、要提高新闻工作者的政策、理论水平，才能



为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发展提供后劲基础。

新闻工作者的素质如何，直接影响新闻事业的发展，刘少奇认为，要把新闻工作做好，一定要具备相应的素质。1948年10月，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刘少奇针对当时出现的情况，实事求是的将新闻工作中的不足及需要改进的地方一一进行阐述，并提出了四点要求，这对当时的新闻工作者是一种鼓舞，一种鞭策，而对当今的新闻工作者更是一种借鉴。

一是要有正确的态度。所谓正确态度，即新闻工作者应该谨慎、严肃的对待自己的工作，将“新事讲实”。新闻无小事，来不得半点潦草，做新闻工作，更不能凭自己的经验办事，想当然的开展工作，而是应该实事求是的进行调查研究，不搞经验主义，文本主义，要致力培养一丝不苟，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要针对不同的写作对象，进行不同侧重点的描述，这样写出来的文章，读者才会爱读，想读，这样你的文章才会有存在的价值。所以，刘少奇认为新闻报道要形成“精”“采”的风格，他说“‘精’就不是拉杂，‘采’就是漂亮，挂点‘采’，读起来爱读。你写得不‘精’，人家看不了那么多，你写得不‘采’，人家不愿看^[14]。”所以，作为新闻工作者，一定要捡重要的东西，一定要讲大局，要站在全局的角度考虑问题，不能随心所欲，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事实上，这也是一个责任心的问题，什么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都要反复思考，权衡利弊。另外，刘少奇也特别强调了新闻工作的真实性。他认为新闻工作者有责任考虑政策的正确性，应该实事求是的报道任何新闻事件。刘少奇曾多次指出，新闻的真实问题实际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问题，即无产阶级新闻的真实观，要求我们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为指导，坚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深

刻反映揭示事物的本质，新闻报道离开了“真实”这个“魂”就要迷失，党的原则之一就是实事求是，党性是不可能脱离真实而独立存在的，它总是寓于新闻真实性之中，通过客观事物的报道来体现正确的舆论导向。新闻工作者应该维护新闻的真实性，不能道听途说，捕风捉影，更不能为了个人的利益，拿新闻作为交易与筹码，从而导致新闻丧失了真实性，所以刘少奇认为作为新闻工作者应该“不能采取轻率的、哗众取宠的、‘客里空’式的态度，而应当采取负责的、谨慎的、严肃的态度去工作”^[15]。

二是新闻工作者必须独立地做相当艰苦的工作。这对新闻工作者提出了能力方面的要求，要有扎扎实实的真功夫，要有敏锐的新闻敏感性，要能独挡一面，果断地解决遇到的任何问题。新闻是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的，它每天都存在于我们的身边，新闻工作者就应该要孜孜不倦、乐此不疲地去搜集，寻找，探索这些人们想知道，而又不知道，看得见而又说不上事情，这就要求新闻工作者一定要有独立的观察与思考问题的方式和方法，要有特殊的思维方式和思维能力。新闻工作者要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要有健全的体魄，充沛的精力。新闻工作者需要搜集新闻线索材料，而往往最艰苦最危险的地方，就是第一手材料的存在处。新闻工作者要能够经受风吹雨打，挨冻受饿，不怕苦，不怕累，不畏艰险。

三是新闻工作者应该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科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建党立国的根本。刘少奇说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我们观察一切现象、处理一切社会问题的武器。”^[16]因此，党的新闻工作者，应当充分认识提高理论修养的重要意义，认真学好理论。刘少奇认为“新闻工作者要提高理论水平，要熟悉马

列主义，特别要学习唯物史观，认识论，学习阶级分析的方法”^[17]，要善于用马列主义理论来武装自己的头脑，要积极主动的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理论，并鼓励要花3个月、3年、30年的努力，把马列主义学好。

四是新闻工作者“要熟悉党的路线和政策”。新闻工作者写文章要有创造性，要有新意，但总的原则却是不能违背党的政策，这也是新闻工作者的职责之一，要导好方向，要通过正确的舆论引导，把全心全意为人民的思想统一起来，要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学习，接受党的路线政策，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弄清是非，才能使社会稳定、人民团结。刘少奇指出“你们不仅要宣传党的政策，还要在群众的实践中去考察政策是不是正确，有没有缺点^[18]”。任何一项政策的实施，都会经历一段适应的过程，政策的宣传能不能够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这是对新闻工作者能力的一种考验，这项政策是否真正适用老百姓，老百姓有什么情绪，这种情绪的正确与否需要新闻工作者的判断与传达。当然，不是所有群众的情绪都要说，都要写，这也得靠新闻工作者的敏锐的洞察力，而这种能力的拥有，一个最大的前提，便是新闻工作者本身对政策的熟悉程度，自己本身是否领悟透彻，是否真正学到了心坎里，只有这样，新闻工作者写出来的文章才不会偏离方向，才会真正的为广大群众接受。

刘少奇提出来的这四个条件，是针对当时的新闻工作者提出来的，有一定的时代性，也存在局限性，但是对于当今的新闻工作者而言，却又是适用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箴言，是值得我们新时期的新闻工作者借鉴与思考的。

4、发展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要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新闻工作是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改进和发展新闻事业，对于进一步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促进经济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刘少奇认为，新闻工作自始至终要坚持党管新闻的原则。1951年5月7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刘少奇作了重要讲话，阐述了国际国内形式和党的宣传工作的重要性。指出：对于群众的宣传对于党员的教育，思想的批判工作，都是党的工作，各级党委要领导这个工作。在过去各级党委对于宣传教育工作的领导是不够的，不注意宣传教育工作，常常把一些工作委托给宣传部的人来做，做一点就做一点，没有做也不去管理，做错了也不管，使我们的宣传教育工作陷于自流。我们说，别的工作做错了，表现出来还慢一点，但宣传工作做错了，就要出乱子。所以加强各级党委对于宣传工作的领导，是一个决定性的问题。一方面加强各级党委对宣传工作的领导，一方面加强宣传工作机构提高其工作能力，这是改善宣传工作的一个重要问题^[19]。

刘少奇认为，党管理新闻，主要是管指导思想、宣传方针。“宣传工作必须与各级党委所定下来的中心工作密切配合，离开了党的中心工作，宣传工作就会失败。”^[20]

实践证明刘少奇的新闻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适合于中国国情的，是围绕政治、经济发展服务的。新的历史时期，刘少奇的新闻思想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明的网络空间”。关于新闻舆论价值取向的准确定位，习近平总书记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着重强调要把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提出“四个牢牢坚持”：牢牢坚

持党性原则，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牢牢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牢牢坚持正面宣传为主。他始终强调新闻舆论工作“以人民为中心”，依靠人民，讴歌人民，服务人民，当好党和人民的“喉舌”。他倡导“创新新闻传播的理念、内容、体裁、形式、方法、手段、业态、体制、机制，适应分众化、差异化传播趋势”，努力提高“四力”：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指示“从时度效着力，体现时度效要求，努力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他的这些新

闻舆论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和组成部分，深刻的阐述了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发展的性质和特点，是对刘少奇新闻思想的升华和发展。

目前，我国已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速发展时期。新形势、新任务对新闻宣传工作和新闻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重温刘少奇的新闻思想，对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发展，有着很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注 释〕

[1]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397页。

[2]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397页。

[3]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398页。

[4]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396页。

[5] 《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版，第242页。

[6]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116页。

[7]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396页。

[8]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402页。

[9]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396页。

[10]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399页。

[11]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397页。

[12]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402页。

[13] 刘崇文，陈绍畴主编《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518页。

[14]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402页。

[15]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405页。

[16]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116页。

[17]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406页。

[18]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406页。

[19] 刘崇文，陈绍畴主编《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277页。

[20]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86页。

（作者单位：刘少奇同志纪念馆）

试析刘少奇在白区工作期间的宣传工作

罗超群

〔摘 要〕刘少奇是党的“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为党在白区工作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白区工作期间，刘少奇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十分重视宣传工作，使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得到比较全面的宣传，对指导当地的工人运动和群众运动产生了积极作用。为做好宣传工作，刘少奇进行了深入的调查，重视斗争的口号，撰写了大量理论文章详细阐述党的方针政策，还注重发挥报刊杂志等舆论阵地的作用，有效促进了党和群众在思想上的统一。

〔关键词〕刘少奇 白区 宣传工作 特点

刘少奇被誉为党的“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1〕}，他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是一个模范”^{〔2〕}。宣传工作，不管是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年代，都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尤其是在革命时期，宣传工作的好坏与革命能否取得胜利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1951年5月，刘少奇在党的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作的报告中指出：“别的工作做错了，表现出来还慢一点，但宣传工作做错了，就要出乱子。”^{〔3〕}

在白区工作时，宣传工作是刘少奇的一项重要工作，他对此十分重视。在满洲工作期间，刘少奇兼管省委军委及宣传部工作，曾多次指出要做好宣传工作。1928年11月17日，在其撰写的《怎样改造顺直的党？》指出要“严格党的组织秩序与纪律，扩大党的教育宣传工作”^{〔4〕}。1928年12月，在与韩连会、陈潭秋以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央特派员的名义发出关于军运问题的通告中指出：“目前在军队中做组织与宣传工作，在工农群众中做军事组织与训练工作，实在是本党最严重的任务。”^{〔5〕}在与韩连会、陈潭秋共同研究制定保北工作计划中指出：“保北目前的工作任务是：改造党的组织，发动城市职工运动，发动农民的各种斗争，扩大党的政治宣传……”^{〔6〕}1936年，他受命到北方局，贯彻瓦窑堡会议精神、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是他的主

要工作任务。纵观刘少奇在白区工作期间所开展的宣传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注重斗争的口号

口号与宣传关系密切，具有鼓动性、领导性。在白色恐怖笼罩的地区，如何让党的各项政策深入人心，如何更好的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口号是值得重视研究的。为更好的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刘少奇十分重视宣传口号，善于利用口号所能产生的积极影响，来促进革命的发展。

1、对于错误的口号，刘少奇能及时纠正。针对白区职工运动中，存在不顾客观实际，不顾斗争环境变化提出过高过左的口号，强迫群众进行斗争的情况，1928年10月，刘少奇撰写了《论口号的转变》一文，在文章中强调，口号性质的转变及口号的转换，要依争斗实际形势的转变来决定。从六个方面对怎样正确规定斗争口号进行了阐述。他认为首要的就是要坚持从实际出发。这一点，不仅是制定口号必须要遵从的第一要点，也是刘少奇开展其他各项工作所遵循的第一要义。第二是要弄清口号的性质，将口号分为宣传口号、鼓动口号、行动口号三种。第三是要注重口号提出的时机，各种口号都要应时应景，让群众易于接受。第四是行动口号要极简短、极明显、极通俗，能代表普遍群众的要求和心理的中心。第五要把群众



现时的要求和革命的奋斗目标结合起来。第六要及时提出斗争后的口号和中心任务。^[7]

2、对于口号的制定，刘少奇强调口号要符合实际，要能满足适应群众的需要。他在《论口号的转变》一文中强调，口号性质的转变及口号的转换，要依斗争实际形势的转变来决定。在奉天指导开展工人运动期间，在了解掌握了当地各方面的情况后，他又特别强调：“我们党提出的口号，要能为多数群众所接受。”^[8]1929年在《满洲党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指出：“至于党的土地革命纲领的宣传，须按照各地土地关系的特殊情形，提出适合于实际的土地革命的口号，如在关东州提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没收中日地主的土地。”^[9]1936年，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派去华北工作。4月，在其撰写的《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一文中，指出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表现之一就是不懂得口号的运用，不懂得党的基本口号、基本纲领与目前的行动口号之间的联系。我们的同志常常不懂得根据当时当地的环境与条件，根据群众觉悟的成都，提出群众可能接受的部分的口号、要求和斗争的方式，去发动群众斗争。^[10]1936年刘少奇在指导争取宋哲元抗日的工作中，就是从改变相关策略口号开始的。刘少奇及时地引导学生将游行示威中“打到卖国贼宋哲元！”“打到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口号改为“拥护宋委员长抗日！”“拥护二十九军抗日！”等口号。仅仅几个字的变化，结果却大不一样：宋哲元被彻底拉进了抗日阵营，并从此和广大的人民群众站在了一起。口号的变化，既是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运用，同时也为群众的爱国运动减少了阻碍，增加了活动取得合法地位的可能性。

刘少奇对口号的充分利用，对顺直、满洲等地工人运动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特别是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确立后，为我党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争取更多革命力量，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总结革命经验，撰写大量理论文章

总结革命经验，撰写理论文章，纠正错误观念的影响，统一党内外思想，是刘少奇在白区工作期间开展宣传工作的重要方式之一。从1928年3月到天津指导顺直省委的工作开始，刘少奇撰写了大量的理论文章，很多都发表在党内外的一些刊物上。这些文章既有对革命工作的指导和总结，也有对工作中出现的错误路线的纠正，还有对群众工作的正确指导等等。

1、在顺直工作期间：在顺直工作的八九个月时间里，刘少奇撰写了7篇文章，发表在《党的生活》《出路》等期刊上。1928年10月，刘少奇撰写了《论口号的转变》，对如何正确制定斗争口号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为了更好的指导顺直地区群众工作，撰写了《职运须知》《“国民党不给工人好处，共产党要给工人好处”》等文章。为加快顺直党的改造和恢复，刘少奇撰写了《对于党的工作和组织的意见》（1928年12月2日）、《“客观环境很好，但是党没有出路”》（1928年11月16日）、《怎样改造顺直的党？》（1928年11月17日）和《错误观念的纠正》（1928年12月18日）等文章在党内刊物《出路》上发表，对如何改造和恢复顺直的党组织以及党组织该如何开展工作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2、在满洲省委：1929年7月，刘少奇同何宝珍一起来到沈阳，出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开始接手处理满洲省委的工作。在这里他也仅仅工作了八九个月，在此期间，多次以写信和发报告的形式给中共中央汇报情况。1930年3月，向中共中央提交《中东路工人斗争的总报告》，全面总结了中东路工人斗争的经验教训。

3、中央驻北方局代表期间：1936年春，刘少奇以中央驻北方代表的身份来到天津，执行两个任务，一是要建立华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二是在全国范围内宣传党的新政策。在抵达天津起至抗日战争爆发前

夕的一年多时间里，刘少奇先后写了30多篇文章、报告及党内通信，共约20万字。

为了纠正“左”倾错误，刘少奇撰写了《肃清左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1936年4月1日）。为了转变党的干部的工作作风，对党的干部在白区开展工人运动和领导、发动群众运动进行教育，写了《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1936年4月）、《论北平学生纪念郭清烈士的行动》（1936年4月5日）、《肃清空谈的领导》（1936年7月15日）、《所谓具体领导》（1936年10月8日）、《把一般原则与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联结起来》（1936年10月8日）、《怎样进行群众工作》（1936年10月8日）等文章在《火线》上发表。为了加强抗日救亡宣传，宣传解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刘少奇在《国防》《长城》上先后发表了《论合作抗敌的一封信》（1936年6月20日）、《论“全国抗战是否立刻爆发”和救亡阵线当前主要的任务》（1936年11月10日）等文章。这些文章针对某些人对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种种误解，深刻解释了当时政治形势的新变化以及实行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性和重要性，以正确的理论和斗争策略指导华北的抗日救亡运动深入发展。1936年4月13日，针对国家社会党首领张东荪在《评共产党宣言并论全国大合作》一文中所认为的中共共产党过去一向主张立即“废除私有财产”、立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等误解，刘少奇写了《关于共产党的一封信》，被《自由评论》公开发表，对消除各界人士对共产党新政策的种种误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西安事变发生后，刘少奇在《火线》《长城杂志》等刊物上先后发表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月蒋氏的恢复自由》（1936年12月26日）、《西安事变的意义及其以后的形势》（1937年1月1日）等文章，宣传解释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关于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刘少奇撰写了《民族

解放人民阵线》（1936年6月7日）、《人民阵线与关门主义》（1936年7月12日）发表在《生活日报星期增刊》上。1936年11月间，刘少奇写了一篇《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一文，全文长达2万字，详尽阐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原则，并被作为党内教育材料。针对“北平问题”，刘少奇先后写了《关于北平问题》《在北平问题上所应获得的教训》两文在《火线》上发表，对帮助指导改进北平党组织的工作起了重要作用，也成为了指导白区党组织的建设工作的重要文献。除此以外，1937年1月30日，刘少奇撰写《论左派》一文，对徐芸书和黄刊等人所认为的“组织左派就会妨碍与破坏统一战线”等错误观点进行了批评，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由各党各派，各种信仰不同、主张不同的团体组织而成的；……在统一战线内部，必然有觉悟的、先进的、能为民族解放而斗争到底的左派分子或左派团体。^[11]1937年2月20日，他在《“联合抗日”与“团结建国”》一文中，深刻地论述了抗日和建国的关系。

三、注重身份的隐藏

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笼罩下白区，敌强我弱，为了不暴露目标，中国共产党许多工作都是秘密进行的。刘少奇深知在白区隐藏好自己，以便更好的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是十分必要的。

1、在与其他人交往中，不以自己的真实身份示人。刘少奇在白区工作时，不仅外界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和身份，就连党内的一些同志也不知实情。在1929年6月公布的由中央批准的中共第五届满洲省委成员中，有一位叫赵子琪，其真实姓名就是刘少奇。7月，刘少奇同何宝珍一起前往奉天（沈阳），他使用化名之启、赵子琪，对外以海军司令部某部副官身份为掩护。^[12]奉天被捕后，在厂方的审讯中被问到叫什么名字时，刘少奇不慌不忙的回答自己叫成秉真（成秉真确有其人，是他的表哥，如此回答是刘少奇



早已相好的应变对策）来应对。1936年初，刘少奇和他的夫人谢飞从瓦窑堡出发去华北，化名胡服，一路上他们夫妇装扮成富商以掩人耳目。到达天津后，刘少奇以南开大学教授周先生的身份为掩护，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领导北方国统区的革命斗争。当时，天津市委的工作人员郭秋明与刘少奇在北方局一起工作了近两年的时间，都不知道这位中央派过来的驻北方局代表就是刘少奇。

2、在对外公开发表文章时，不用真名采用笔名。在顺直和满洲省委工作期间，刘少奇在刊物上发表文章使用最多的是“赵启”“之启”这两个名字。1936年到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期间，刘少奇在《生活日报》《火线》《自由评论》《华北烽火》《国防》等党内外公开半公开刊物上，以“莫文华”“K.V”“陶尚行”“尚陶”“吕文”“凯丰”等笔名，发表了大量文章，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向社会各界开展思想工作。

四、重视舆论阵地，充分利用各种刊物宣传党的政策

报刊是开展宣传工作的重要利器之一。刘少奇曾指出：“报纸办得好，就能引导人民朝好的方向走，引导人民前进，引导人民团结，引导人民走向真理。”^[13]“进行宣传工作要运用好各种宣传工具。如宣传员网、报纸、刊物、出版、戏剧、电影、美术、音乐、广播、学校等，要把这些宣传工具都搞好，都加强，都统统动员起来，运用起来。”^[14]虽然，这不是刘少奇在白区工作时提出的，但是他以实际行动证明了利用好报刊是十分必要的。在白区时，刘少奇善于利用党内外公开、半公开的刊物，对党的相关政策进行了宣传和解释，促进了党内思想的统一，他指出要“成立小报社，开展宣传鼓动工作”。^[15]为了利用好报刊这个舆论阵地，刘少奇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充分利用党内外公开刊物发表自己撰写的理论文章，解释党的方针政策。为了让更多的革命工作者和广大群众了解党的最新政策，更好的开展工人运动和群众运动，刘少奇及时的将革命斗争的经验总结上升为革命理论，及时的对党的相关政策进行解释，撰写了近40篇理论文章在《出路》《火线》《长城》《自由评论》《华北烽火》《国防》等十多种报刊杂志上发表。

2、对进步刊物的创办表示支持或进行指导。刘少奇在担任满洲省委书记期间，十分关心东北地区青年的成长进步，1929年11月，刘少奇指示杨一辰与由哈尔滨东北大学附中几位青年学生主办进步刊物《冰花》取得了联系，在办刊原则、编辑方针上给予指导。1936年5月，特意写信对邹韬奋主办的将在香港出版的《生活日报》表示支持。1935到1937年，北方局在刘少奇的指导下，先后出版了《华北烽火》《国防》《长城》《中国人》《华北评论》《人民之友》等刊物，对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积极作用。

3、亲自创办刊物。在顺直工作期间，刘少奇曾担任《布尔什维克》报编辑委员会委员，积累了办报的经验。1928年，为更好的解决顺直党内的的问题，刘少奇和韩连惠一起创办了党内刊物《出路》。该刊物于1928年11月中旬创刊，刘少奇写了出版“序言”，在序言中讲明了出版该刊物的目的。他还先后在《出路》上发表了《怎样改造顺直的党》等多篇文章。该刊物的出版，对顺直党的改造，起了积极作用。

4、利用报纸或者出小报解释党的政策，揭露事实真相。在哈尔滨指导中东路工人斗争期间，刘少奇曾指出，组织总罢工的时机还没有完全错过，补救的办法，一方面是在报纸上发表揭露事实真相的报道，以抵消有关反苏罢工报道所造成的恶劣影响。^[16]大家要加紧拥护社会主义苏联的宣传，通过出小报、发传单、标语小册子等，向工人详细解释反对军阀的必

要性，说明中东路工人待遇被取消的原因及他们保障自己利益的出路所在。^[17]

5、争取报刊对抗日进行更多正面的报道。《益世报》是当时天津最有名的报纸之一，影响力也比较大，在抗战前夕由罗隆基任主编。为了更好的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做好思想统一工作，召集更多的力量参与抗日救国，1936年4、5月间，刘少奇派人同天津《益世报》主编罗隆基会晤，向他说明党的抗日救国主张。之后，益世报多次发表社论，抨

击日本的侵华政策，揭露国民党的妥协投降活动，并表示支持爱国学生的救亡运动。

总之，刘少奇在白区开展宣传工作时，能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同错误的思想路线进行斗争，能处理好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关系，能积极争取广大群众、保存党的组织、积蓄力量，为党在白区工作的开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注 释〕

- [1] 1945年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决议中对刘少奇关于白区工作的理论和白区工作的实践作了高度评价。
- [2]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975、979页。
-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27页。
- [4] 刘少奇：《怎样改造顺直的党？》，《出路》，1928年11月17日版，第1期。
-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87页。
-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88页。
- [7] 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13页。
- [8] 孟用潜：《少奇同志在奉天被捕前后》，《红旗飘飘》第20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3月版，第55页。
-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98页。
- [10] 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页。
- [11] 人民出版社编：《一二九运动资料》第2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350—351页。
- [12] 辽宁社会科学院编：《少奇同志在满洲省委》，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版，第20页。
-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96页。
-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5页。
-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04页。
- [16] 辽宁社会科学院编：《少奇同志在满洲省委》，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版，第65-66页。
- [17] 陈绍畴：《刘少奇在白区》，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1月版，第65页。

（作者单位：刘少奇同志纪念馆）



刘少奇家书解读

李桂芳

2016年12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的讲话中强调，“要弘扬优良家风，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家书是维系家庭的纽带、传承家风的桥梁。俗话说“家书抵万金”。解读优秀家书，弘扬家书文化，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选取刘少奇在20世纪50年代的3封家书进行解读，希望读者能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一、同意刘允斌与费多托娃结婚（一九五〇年八月十九日）

王大使转刘允斌：

来信悉。我们同意你与费多托娃结婚，但你在大学毕〔业〕后，应即回国工作。我们前已有信告你。

刘少奇、王光美

八月十九日

这是刘少奇和王光美给在苏联留学的儿子刘允斌的家书，同意刘允斌与苏联姑娘曼娜·费多托娃结婚，但大学毕业后应即回国工作。

在对待刘允斌的婚姻问题上，刘少奇始终要求他以党和国家利益为重，在国家需要的时候，要顾全大局，牺牲小我为大我。

刘允斌为刘少奇和何宝珍夫妇的长子。1924年春出生于江西萍乡安源煤矿。在湖南宁乡炭子冲老家长大。1938年，被接到延安，进入延安保育小学就读。1939年，和妹妹刘爱琴一起赴苏联，进入莫斯科莫尼诺国际儿童院学习。1940年入苏联十年制中学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夏，考入莫斯科钢铁学院学习。1946年，考入莫斯科大学化学

系，学习核放射化学专业。其间担任中国留苏大学生同乡会会长。1949年夏，与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委托秘密出访苏联的父亲刘少奇相逢，这是刘允斌自1939年与父亲分别后第一次见到父亲。

1950年，刘允斌与苏联姑娘玛拉·费多托娃相爱。玛拉是他在莫斯科大学化学系的同学，也是一个好學上进的姑娘，她父亲是个红军老战士，母亲是教师，她是家中的独养女儿。刘允斌一向学习用功，又天性活跃，能唱歌、跳舞，这一切早被玛拉看在眼里。他们通过接触、了解，对对方都有好感，就相爱了。后来，在大学图书馆、阅览室、校园树阴下、联欢会上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

刘允斌对这场跨国婚姻并不是盲目的。一来他年龄已经不小；二来他学习还没有结束，一年半载回不了国；三来他感到玛拉为人不错，是个好姑娘，对自己真心实意。刘允斌也知道他和玛拉结合将会带来一系列问题：父母能原谅他吗？将来自己是决心要回国的，玛拉能跟自己去吗？她父母会不会拖她的后腿，还有玛拉在中国生活得习惯吗？等等……

1950年8月，刘允斌吸取妹妹刘爱琴和费尔南多相爱的教训，主动写信告诉了父亲和母亲，并征求他们的意见。刘少奇接到儿子刘允斌的信后，他从自己接触到的一些革命者的涉外婚姻中看到，由于种种原因，在事业和生活中，不少人遭受过挫折。从关心爱护儿女的角度，特别是从接受党的培养，将来要报效祖国的政治角度考虑，他并不支持儿女与外国人结婚，这就是他不同意大女儿刘爱琴和西班牙费尔南多那段婚恋的原因。但是，如今看到儿子的来信，感到不同的是，如果说西班牙与我们新

中国国体不同，而苏联则是我们学习的“老大哥”。最后，一向以党和国家利益为重的刘少奇，还是同意了这门婚事。但是，在8月19日刘少奇和王光美发的这封《王大使转刘允斌》的电报中，却明确写道：“但你在大学毕〔业〕后，应即回国工作。我们前已有信告你。”意思是说，刘少奇夫妇看到儿子刘允斌的来信后，经过分析考虑，最终还是同意儿子与费多托娃结婚。但是，刘允斌在大学毕业之后，应该立即回祖国工作，为祖国服务。在之前刘少奇给刘允斌的信中也讲过应回国工作这个问题。

1950年9月，刘允斌与玛拉·费多托娃结婚。婚后生活十分美满幸福，两人都继续学习，并生了一对儿女。1951年，刘允斌考取莫斯科大学化学系研究生，继续攻读核放化专业。

1952年，刘少奇第二次率领中共代表团前往苏联参加苏共十九大会议。在苏联，刘少奇见到了刘允斌并告诉他：中国科学院已经成立了“近代物理研究所”。所谓“近代物理”，顾名思义就是原子核物理，这是三四十年代才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的前沿尖端科学。刘少奇说：“机构是有了，就是缺少人才。”言外之意要他学成赶快回国服务。

1954年11月，刘允斌获得副博士学位。后进入莫斯科大学化学研究所担任高级研究员。这时刘允斌接到父亲刘少奇的来信，信中说祖国很需要留学生回来服务。“祖国和人民等待着你的归来。在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我相信你一定能无条件地牺牲个人的利益而服从党和国家的利益。”看到父亲的信，刘允斌在思想上进行了好几天的斗争，尽管他十分向往回到祖国工作，但毕竟要抛妻弃子，心里总有万千不舍。尽管他十分热爱妻儿，但在党和国家利益面前，他最终选择了回到祖国。

1957年10月，拥有核专家身份的刘允斌冲破重

重阻力回到北京。在国家二机部所属中国原子能研究所401所工作。1962年，调到内蒙古包头市郊外的核燃料元件厂202厂，组建中国原子能研究所第三研究室，并担任主任，负责新型热核材料的研制工作，默默为祖国核工业贡献自己的智慧。

但“文化大革命”中刘允斌受到迫害，1967年11月21日在包头逝世。1978年得以平反，恢复了作为中共党员和核化学专家的名誉。1979年2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为他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二机部部长给他做了公正的评价：“刘允斌同志在政治上是成熟的，业务上是精通的，在发展我国尖端科学事业中是做出了重要贡献的。”

正是刘少奇身上那种以党和国家利益为重的高尚品德和情操，潜移默化地影响、感染着刘允斌，他在面对个人幸福与国家利益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舍小家为大家，这种精神仍值得我们今天学习和深思。

二、给王光美的信（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二日）

光美同志：

我们到此后，有几个人伤风，但我至今很好，体重增加约有两公斤，大概是因为此间的饭食较好。现大会很忙，每日开会八小时，不能作别事，大概明后天大会即可开完。你写来的信收到。允斌已见到，他们很好。

余不尽，祝你们平安！

刘少奇

十月十二日

王光美，是著名的女政治活动家。1921年生于北京，原籍天津。1943年在北平辅仁大学物理系本科毕业，又考取了该校的研究生。1945年研究生毕业后，任辅仁大学物理系助教。1946年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英文翻译，后赴延安，担任外事翻译并参加土改工作。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农忙时，进行突击性的劳动，是必要的，但是突击过去以后，应当有必要的休整，使若干同必要的休整适当地结合起来，才能坚持长久。

你说，是否可以由合作社以生产队为单位，建立公共食堂以及公共的洗衣、作衣、补衣、作鞋……等组织？完全可以。有不少的合作社已经这样做了，并且还设立了农忙托儿所。但是这要在男女社员共产主义觉悟提高的基础上才能做好。应当经过社员的大鸣大放，特别是女社员的积极性大大发扬之后，才好动手去办。可以采取自由加入自由退出的办法。办起来，定要比各人自己办的还要好的（点），就是要有充分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

不再多说，祝你进步！

你的叔祖父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九日

这是刘少奇给他的侄孙女刘维孔的书信，近1500字。

刘维孔，女，湖南宁乡人，1934年3月生。刘少奇胞兄刘云庭孙女，刘云庭长子刘允明女儿，刘少奇侄孙女。刘云庭曾是一位追求进步的民国军人，对早期刘少奇走上革命道路产生过积极影响。1949年9月，刘云庭逝世后，刘少奇亲自撰写了“你是我幼年学习和活动的第一个帮助者”的挽联。1949年10月，刘维孔在刘少奇的帮助下到北京读书。

1957年刘维孔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打算到广州父亲刘允明那里去复习功课，等来年再考。离开北京前，刘维孔去向叔祖父刘少奇告别。当时，党中央为解决城市人口增加过快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正在动员城市居民及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刘少奇南下五省调查，正是为了解决这一人民内部矛盾。他听说刘维孔没有考取大学，就动员她回到家乡参加农业生产。刘少奇

对刘维孔说：“你是一个革命者的后代，应该到人家不想去的地方去，到最困难的地方去。你回家乡参加生产去，好不好？”“一个人要有远大的理想，要有解放全人类的决心和毅力，遇到困难的时候，要冷静地考虑，什么是集体利益，什么是个人利益，当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个人利益要无条件地服从集体利益，因为有了集体利益才会有个人利益。今天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既然需要有文化的人，你就应该服从祖国的需要，把我们的农村建设好。当祖国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是光荣的事情，将来要记载在历史上的。农村的前途是美好的，但要克服许多困难，付出辛勤的劳动，才能得到。……青年人要遇难挺先，舍己为人。”刘少奇还关切地说：

“下去有什么困难可以来信。”并嘱咐说：“多给我反映农村情况，多反映农民的思想情绪和要求”，“回农村后要服从社队的领导，和农民打成一片，当一个好社员”，“不要过早当干部，要尽力帮助老百姓”。刘少奇还专门嘱咐夫人王光美找了一些有关农业劳动方面的书送给即将离开北京的刘维孔。

其实刘少奇哪里会不知道，在那个时期只要能考上大学就能留在城市，过上比农村好得多的生活。可是刘少奇一心为民，尽管内心牵挂，但他仍然希望自己的后辈都能够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工作。

刘维孔听从叔祖父刘少奇的教导，于1957年冬，愉快地回到了家乡宁乡花明楼炭子冲，积极参加农业生产，一直努力地按刘少奇的吩咐去做。由于她在党的教育下能够苦钻实干，在劳动中获得很大的提高，深受群众拥护，被选为人民代表，出席了县和省的人民代表大会。1958年5月，她在宁乡县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上作了《要在劳动的熔炉里炼成钢》的发言。

当然，劳动之余刘维孔也忘不了经常给刘少奇

写信，汇报乡下的情况。

这封信就是刘少奇收到刘维孔的信后于1958年5月29日给她的回信。

首先，刘少奇在信中针对刘维孔想考大学的问题表明自己确实态度：“我还是劝你今年不要考大学，继续在农村劳动，这比你在大学中所学到的本事，会要多一些。你在农村劳动三、五年之后，你会有机会再进大学（例如半工半读的大学）学习的。那时，你会学到更多的本事。”

接着，刘少奇为了提高刘维孔各方面的思想认识和能力，信中对她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你应当抛弃一切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确立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你应当确立鲜明的阶级观点和阶级路线；你应当确立坚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你应当向劳动人民中的先进人物学习，不要接受一切落后思想的影响；你除开在同自然界的斗争中学得知识以外，还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求得进步，你才会有好的发展前途。

信中建议刘维孔：“为了你的从事共产主义事业的远大前程，你应当全力以赴，不要为家庭琐事所牵累。你应当把婚姻问题摆在次要的地位”，“若干同必要的休整适当地结合起来”。刘少奇还邮寄有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的文件和一些其他的消息的报纸数张，让她仔细阅读。

最后，刘少奇还答复了刘维孔提出的“是否可以由合作社以生产队为单位，建立公共食堂以及公共的洗衣、作衣、补衣、作鞋……等组织？”的问题以及要注意的事项。

刘维孔收到刘少奇的书信后，在农村积极劳动锻炼，思想认识不断提高。1959年，她当选为出席全国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代表。

刘维孔因表现优秀，组织上准备送她上大学，征求她的意见。因为她心里特别想读大学，而且准

备读工科，就写信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叔爷爷刘少奇。后来王光美回信给刘维孔说：如果执意要上大学，就上农学院。1959年9月，刘维孔由组织上保送进了湖南农学院。

1962年暑假期间，刘维孔北上北京去见叔祖父刘少奇。谈到她农学院毕业后的去向问题，刘少奇的意见还是让她先下基层去锻炼。因此，刘维孔农学院毕业时，遵照刘少奇的嘱咐，在毕业志愿书上填写了“下基层”3个字，此后在农村基层当了10年农业技术员。刘维孔从农民身上学到了许多高贵的品质，和农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这时，她才真正懂得了叔祖父让他下农村、下基层的深远含义。

今年五一期间，笔者打电话问及现年84岁高龄的刘维孔老人当时的相关情况时，她回忆说：“当时我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已买好去广东父亲那里的车票，准备复读再考，走前去跟刘少奇叔爷爷一家打招呼告别，叔爷爷就劝我回老家宁乡农村去锻炼，因为农村需要有文化的农民。还说‘知道苦，才能为人民服务’。”“当时，我也给叔爷爷写了一些信。”

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是刘少奇一生的准则，也是他家风中最鲜明的特点。刘少奇总是要求家人多从人民的角度考虑问题，把自身的选择同人民的需求结合起来。从他给刘维孔的这封信看，他仍然是希望自己的晚辈都能够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工作、去锻炼，去提高。刘少奇心中装着人民的这种高尚品质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作者单位：刘少奇同志纪念馆）



“成为一个真正对人民有用的人”

——读《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中有关家风建设、子女教育的几封书信

赵丛浩

〔摘要〕从《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中刘少奇的书信特别是给子女和其他亲属的书信中，可以看出他对家人既严格又关爱。他要求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要有为人民而学习，为人民而工作的观点，要抛弃个人主义，接受集体主义，要在行动上遵循更有组织的办法。他提倡学以致用，认为学习成果要由将来的工作来决定，要求处理好学习与休息时间的关系，锻炼好身体，细心地指出选择专业要有周到的了解和考虑。他强调要正确对待批评，习惯于虚心领受同志们的批评，鼓励子女与自己交流。他还要求家人不要搞特殊化，提倡“吃亏”。刘少奇对待家人非常严格，但这恰恰是他表达关爱的方式，他希望自己的家人能够成为真正对人民有用的人。

〔关键词〕刘少奇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 家风建设 子女教育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风好，不仅会使一个家庭兴旺，也会令社会充满正气。培养好的家风很重要，传承好的家风也非常关键。要将好的家风一代一代延续下去，不仅要从老一辈身上继承优良传统，还要注重言传身教，做好下一代的教育工作。刘少奇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承担着繁重的工作。在家庭中，他虽然无法投入很多精力，但对子女的成长教育和其他亲属的生活工作，依然十分关注。从《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中他的书信特别是给子女和其他亲属的书信中，可以明显感受到他那颗培养、传承优良家风的良苦用心。他在信中提出的一系列要求，更体现了他的殷殷期望。从中，我们也能获得诸多教益和启示。

一、要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在刘少奇看来，为家人着想最关键的不是为他们提供优越的物质条件，而是帮助他们在思想上成长，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第一，“要有为人民而学习，为人民而工作的观点”。

刘少奇在给女儿刘平平的信中，曾严肃认真地提出一个问题：要做一个什么样的青年？他对下一

代的希望是：“做个进步的、革命的青年，具有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具有雷锋式的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能够真正继续承担起革命前辈的革命事业。”（本文引文均引自《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

他在给侄孙女刘维孔的信中，也希望她能“确立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他认为，学习能使人学到一项技术，也是使人掌握了一门为祖国服务的本领。但是，要真正为祖国有所贡献，仅仅拥有技术是不够的，还“要有为人民而学习，为人民而工作的观点”，取得人民的信任，“成为一个真正对人民有用的人”。通过学习掌握丰富的知识与先进的技术，是为了更好地融入人民，造福人民，而不意味着游离到人民之外，更不意味着高人一等。如果没有一切为了人民的观念作为指导，那么就很容易脱离人民，学到的本领也很难施展出来，甚至会成为“被集体被人民抛弃了的人”。

第二，“必须抛弃个人主义，接受集体主义”。

在对下一代的教育中，刘少奇特别关心被选派到苏联学习的儿子刘允若的情况，给他写了多封书信。革命战争时期，由于生母何宝珍英勇就义，刘允若在3岁时就被送到一户贫困农民家作养子，

十二三岁便到上海当学徒，经常以卖报纸、捡破烂为生。这样的童年令他受过很多苦，也染上一些不良习气。在进入学校学习后，刘允若在与同学和组织的相处中产生了一些矛盾。对此，刘少奇很关注，他告诫刘允若，如果凡事都认为自己是对的，不肯为他人着想，不肯为他人牺牲，就是把自己与集体、组织对立起来，是个人主义的表现。“个人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思想，只有集体主义才是无产阶级的思想”，二者是不可调和的，“必须抛弃个人主义，接受集体主义”。他要求刘允若应该下决心做到“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都要首先考虑集体的利益，把集体的利益摆在前面，把个人愿望、个人利益摆在服从的地位；当个人愿望和个人利益同集体利益发生矛盾时，应该肯于为了集体的利益而牺牲个人的利益”。他还鼓励刘允若振作起来，指出他心情不舒畅主要是由于思想问题即世界观问题没有解决。如果能解决思想问题，那么心情就可能舒畅一些，身体也可能健康一些。他希望刘允若能像女儿刘爱琴那样“决心建立真正的无产阶级世界观”。

第三，“应该遵循更有组织的办法”。

树立集体主义观念不是一句空话，而是要在行动上相信组织，依靠组织。青少年处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期，这一阶段远离父母，到异国求学，难免对环境有些不适应，甚至与他人发生矛盾。当自己的子女与他人相处不融洽时，刘少奇的态度是“当你同你的同学们、你的组织方面搞不好，而且真理又不完全在你这方面时，我是不会支持你的，我只能相信和支持你的组织方面”。关于刘允若所反映的生活上与苏联同学之间的矛盾，他建议说如果同住的苏联同学确实有酗酒、吵闹等不良习惯，一方面要坦率地将他的问题提出来，认真地劝告、批评，另一方面“应该遵循更有组织的办法”，“先向自己所属的中国青年团的组织反映，经过中国的

团组织或党组织向他所属的苏联团组织或党组织反映，再由苏联的团组织或党组织去批评他、教育他”。刘少奇不仅建议子女更多地依靠组织，而且自己也是这么做的。他对于刘允若，不仅多次直接去信开导，而且也给驻苏大使馆与其他留苏学生写信，希望他们通过大使馆与学校的党组织对自己的儿子“进行严格的批评和处理，不要怕他难受”。他说，在批评教育孩子方面，“我和党组织密切合作，是完全必要的”。

二、对待学习，要学以致用

刘少奇提倡学以致用，学必有用，主张学习的目的是在工作中出成绩。

第一，“一切都要看将来的工作来决定”。

刘少奇认为，学习是为了给以后的实际工作打基础，不必过度看重考试分数，更不能将分数作为检验学习成果的唯一标准，“一切都要看将来的工作来决定，而不能只看今天的分数来决定”。分数是一项衡量学习成果的重要标准，但分数高低并不必然地决定未来工作能否取得成绩。他对子女学习成绩的要求是，不需要门门满分，而是要真正学懂。在他看来，学校中学到的知识是有限的，还要到实际工作中继续学习，并将二者结合起来。比如他在考大学还是工作的问题上，就建议刘维孔继续在农村劳动，这可能比她马上考大学所学到的本事还多一些。如果劳动三五年后再进入大学学习，她能学到的则会更多。

第二，处理好“学习与休息时间”的关系，锻炼好身体。

学习是为了将来做好工作，而做好工作必须有健康的体魄。因此，刘少奇很强调保持身体健康。在这方面，他认为要着眼于长远。就在学习而言，“必须把长期坚持学习放在第一位，把现在得多少分数放在第二位”，正确处理“学习与休息时间”



的关系。人的时间是有限的，学习与休息时间确实存在着矛盾，但只有保证休息，保持身体健康，才能更好地、长期地坚持学习，“谁能坚持学习到最后，谁就能胜利，谁不能长期坚持学习，谁就要失败”。如果以损害身体健康为代价争取高分，是不妥当的。

第三，选择专业要有“周到的了解和考虑”。

刘少奇认为，在工作中各行各业都是平等的，只是分工不同。对于后辈选择什么专业，将来从事什么工作，他都主张要结合自己的实际，在“周到的了解和考虑”前提下作出决定。但一旦作出决定，就要持之以恒地努力，不能朝秦暮楚，随意更改。当然，所学专业并不等于将来从事的职业，因为现代工业是完整的体系，各专业之间虽分工不同，但互相联系非常紧密，且有很多共通之处。在给刘允若的信中，他多次强调这个问题，并举例说，如果想从事原子能事业未必一定要学习原子能专业，学好无线电电子学一样可以到原子能工业部门工作，而且还可以参加火箭、导弹、远程控制、宇航工程等工作。退一步讲，如果没有从事与专业相关的工作，那么所学的专业也决不是束缚，“不独不会妨害你将来干别的工作，相反，只会有帮助”。他以孙中山、鲁迅、毛泽东为例说，他们求学时学的是医学、教育，但并没有阻碍他们成为政治家、文学家、党的领袖。要取得大的成就，“不只是需要一门专业知识，而且要有各方面的知识，要有创造性的天才”，专业是不会阻碍一个人自我发展的。

三、正确对待批评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对待家人的生活工作时，刘少奇不仅会直接提出一些批评，更重要的是引导他们正确对待批评。

第一，“每一个人都应该习惯于虚心领受同志们的批评”。

虚心接受批评不容易，特别是青少年，因为心智不够成熟，受到批评后很容易产生逆反心理，体会不到批评所蕴含的积极意义。刘少奇曾在信中叮嘱刘允若，“每一个人都应该习惯于虚心领受同志们的批评”，批评不是“骂人”，同志式的批评是诚恳而恰如其分地指出某种错误，目的是进行帮助。

他还对刘允若说，作为青年团员，不能拒绝组织的监督。既然已经申请入党，就要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每个共产党员，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要受群众、受组织监督的，而且是应该欢迎别人监督的”，“一切拒绝组织和群众监督的人，都不能作共产党员”。他认为，子女在成长过程中肯定会犯错误，需要身边亲人朋友的帮助，其中最重要的帮助“就是当面指出你的错误和缺点”。而要得到帮助，“最好的办法就是虚心地听取同志们对自己缺点的直率的批评”。特别是对于组织的批评，应该向组织声明“承认错误，请求同志们批评，虚心地接受大家的意见，使相互之间的关系正常起来”。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不要把正当的自尊心同保存一种虚假面子混淆起来”。接受批评并不是丢面子的事情，反而可以真正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要像古人那样“闻过则喜”。能够勇于承认错误，接受批评，才是真正的自尊、自信。刘少奇不仅这样要求后辈，对同辈人也是如此。新中国成立初期，他的一些亲属在湖南老家自己不耕种，完全靠收地租生活。刘少奇在给姐姐刘绍懿的信中，就客观地说，“人家说你们剥削了别人，那是对的”。他要求姐姐接受批评，“不能骂人，说他们是小子会、棍子队”。他还指出，她的态度应该是“尊敬”与“感谢那些送租给你们、养活你们的作田人”，并坚决执行人民政府关于土地问题的法令。

第二，“说出来，你的同志，你的亲属，才好帮助你”。

正确的批评建立在对情况的切实了解上。比如，父母和子女作为两代人，经常会有不同的判断事物的标准，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父母和子女之间做不到相互了解，就往往不能解决矛盾，反而会扩大双方的分歧，既不利于家庭感情的和睦，也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对此，刘少奇的办法是鼓励子女和自己多多交流，尽可能了解他们成长过程中各方面的情况。比如，他鼓励刘允若在有不同想法时，直接提出要求，“不要绕弯子，不要找什么借口”。如果有问题，“向我、向同志们说出来，总比不说要好。因为不说，不等于没有问题，问题还是存在的；说出来，你的同志，你的亲属，才好帮助你”。他非常肯定刘允若通过写信的方式将个人的想法充分表达出来，说“你写这些，不是没有用，而是很有用”。他欢迎孩子将思想上的问题与困惑直爽地、无隐晦地说出来，因为只有如此，他才可以帮助分析，提出建议，挖掘问题根源，迅速纠正错误。

四、不搞特殊化，提倡“吃亏”

刘少奇屡次向家人提出，不能搞特殊化。他认为，只要是真正“决心献身于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决心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真正关心全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那么任何客观的困难都能想办法克服，如果“吃了苦，吃了亏，你反而会心情愉快”。

在给恽希仲的回信中，刘少奇表示完全赞同他所反映的加强对干部子弟的教育和取消对干部子弟的特殊待遇的意见。对于在苏联留学的子女，刘少奇在各方面都提出过严格而具体的要求。在学习上，他要求必须遵守大使馆制定的作息时间与生活制度，不能自行其是。如果打算调换学校、更改专业，要以合理的理由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并取得同意，而非求助于自己的职权与影响。饮食上，他要求子女主动适应苏联的生活习惯，坚持不从国内给他们邮寄

食品。在穿着上，他要求子女同其他留苏学生保持相同的标准，不要追求衣物样式的时髦，而是以实用为原则。在住宿上，他要求子女应该和党组织安排的同学住在一起，并尊重这种安排，不能粗暴地坚持个人意见。他还以自己1921年时在苏俄的学习经历鼓励说，自己最初也对饮食不习惯，但过一段时间就适应了，体重还增加了几公斤，“那时的生活条件确是很困难的，更没有什么人寄东西给我们，而我们都没有怨言，都是愉快地学习和生活着”。在给刘绍懿的信中，刘少奇提出自己的亲属应该像普通农户一样“作田吃饭”，不能以为自己的弟弟当了国家领导人就可以不遵守法令。他说：“我当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你们在乡下种田吃饭，那就是我的光荣。如果我当了副主席，你们还在乡下收租吃饭，或者不劳而获，那才是我的耻辱。”

刘少奇对家人的要求非常严格，甚至可以说是严厉，坚决不利用自己的影响为他们争取特殊待遇；但同时，他也对家人也充满了关爱。刘少奇对家人的一系列严格要求，恰恰是他表达爱的一种方式，饱含着他对培养、传承优良家风的良苦用心。他希望自己的家人能够自尊自爱、自立自强，“成为一个真正对人民有用的人”。同时，这一系列严格要求，也是他自己一贯遵循的工作与生活原则，是他作一名“人民的勤务员”的郑重实践。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刘少奇在瑞金的故事

曹春荣

刘少奇于 1932 年冬离开上海前往赤都瑞金，先后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执行局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直至 1934 年 10 月长征撤离此地。由于他具有群众观点和全局观念，注重维护工人阶级的团结，善于把工会工作跟党和政府各项中心任务紧密结合，从而对革命事业多有建树，且留下了不少动人故事，兹选录数则以飨读者。

“炸掉三六石”

自从瑞金成为中央苏区中心、赤色首都以来，从各地运往瑞金的粮食和其他物资便与日俱增。那时苏区境内几乎没有公路和汽车运输，进入瑞金的东西就靠陆路的肩挑背驮与独轮车推，再就是河道船运。远途挑运谷子不仅费时还费粮，如从兴国到瑞金，每天至少有 1000 多人挑运稻谷，每百斤谷要两人挑，来回要上十天，这样，挑的谷子差不多就被挑担的人吃掉了。因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大力发展河道运输，以降低运输成本、加快运输周期、扩大运输量。这件事就由刘少奇亲自抓。

针对苏区多山，河道狭窄且地形复杂，刘少奇指示赣南省木船工会，成立了河流修道委员会，由赣南省木船工会委员长王贤选兼任河流修道委员会主任。其首要任务是发动工人群众疏通瑞金河道，要求在第二次全苏大会前一个半月内完成任务。

瑞金最重要的通航河道是绵江，沿绵江顺流而下可通赤白交界的赣县江口口岸。江口是赤白区物质交流的重要口岸，因而确保绵江通航顺畅十分重要。绵江从县城到城西 30 来里的武阳一段，河道上盘踞着一些大小不一的岩石，妨碍船舶航行及安全，其中尤以靠近武阳号称“三六石”的危害最大。刘少奇了解到这个情况后，指示王贤选抓紧组织人力，炸掉“三六石”。

岂料刚一行动就遇到阻力。当地人传说，“三六石”是“生龙口”，动不得，动了就会坏了风水要出事，给沿岸百姓带来灾祸。因此，要清除“三六石”，首先就要破除这个迷信思想。刘少奇和王贤选等人来到武阳，让武阳区苏请来一些地方上的代表人物，和他们一起座谈此事。座谈开始前，王贤选先简要说明清除“三六石”的意义，之后请刘少奇讲话。刘少奇没有说更多的大道理，但问有谁见过“三六石”撞翻撞沉过往船只，因而伤人死人的事没有。这一问立马引发众人响应，纷纷细数历年各式货船、渔船、木排、竹筏经过“三六石”时，不幸触石翻沉、物毁人伤亡的惨剧。刘少奇待众人说得差不多了再问：他们动没动过“三六石”？这一问倒让在座的两位老者尴尬起来，明知没人动过“三六石”，但先前的话风已放出去，如何下得合来？刘少奇见好就收，对大家说，“三六石”妨碍河道通航，大家都看得见，也想搬掉家门口这只“拦路虎”，只是苦于没法子、没力量，加上迷信思想作怪，才使它为难为害我们祖祖辈辈。现在有苏维埃政府出来清除河障，还怕什么呢？大家眼见得这几年共产党带领穷苦人闹革命大翻身的巨大变化，那都是过去不敢想、想不到的人间奇迹，就都对刘少奇的话心服口服，表示要响应政府号召。

座谈会一结束，刘少奇就要王贤选趁热打铁。王贤选旋即召来石工凿石、炮工装药，几声轰响，把“三六石”炸的连根拔起。接着安排人马清除大大小小的石块，疏通河道。几天工夫，武阳段的河道便通畅无阻了。再过个把月，整条瑞金河道的整修疏通工程也胜利完工。

不能只听一面之词

位于瑞金西北隅冈面乡竹园村的中央苏区红军兵工厂，是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初期，陆续从兴国、于都等地迁入的官田兵工厂、寨上杂械厂和银坑弹药厂等

军工企业合并而成的。全厂六七百人的职工队伍中，就有来自江西、福建、广东，以至上海、沈阳各地的人。他们有的是自愿当红军来的，有的是被俘的国民党军人愿意留下来的，有的是经当地党组织动员或派遣来的。因而由乡土意识、生活习惯、思想觉悟等差异而产生的不团结现象难免发生，有时还因此影响了厂里的生产。

有一回，厂里江西、福建和广东的工人之间闹矛盾，先是江西、福建籍工人看不惯广东籍工人摆技术资格、瞧不起人的样子；广东籍工人则感到江西、福建籍工人地相连、情相牵，有意合伙欺生。后来又因为一方爱吃辣椒，一方不喜欢吃辣椒，都要求厂部管理伙食的事务长改换本籍人士。这些现象被刘少奇知道后，他决定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于是，刘少奇找来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国家企业部部长马文，要他去厂里调查处理。

马文此前在中央苏区红军兵工厂做过团委书记，还在该厂前身之一的官田兵工厂做过职工委员会委员长，所以他对此行满有信心。说走就走，马文骑着一匹马迤逦而行，当天就到了冈面。厂里的技术能手李异凡是马文的广东同乡，彼此早就熟悉，马文便顺理成章地在李异凡家里落脚吃住。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调查、调解，马文觉得问题解决了，便启程返回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向刘少奇汇报处理经过。马文原以为刘少奇会肯定他的处理结果，却不料刘少奇问他：你到厂里住在什么人家吃饭。当他如实回答后，刘少奇指出：看来你得到的意见都是广东同志说的，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刘少奇让马文休息三天之后，回冈面去重新调查处理。接着他耐心对马文交待工作的方式方法，应该注意的事项。马文从中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能只听一面之词，要如古语所云“兼听则明”。

马文虽然感到重返冈面有些难为情，但出于对刘少奇的信赖，还是积极以赴。到得厂里一了解，情况果然像刘少奇所分析的一般：广东工人都很高兴，而江西、福建工人都不满意。马文按照刘少奇的交待，重新听取

了江西、福建工人的意见，对问题作了新的结论。这一来三方面工人都满意了，问题也就彻底解决了。

发展水上运输，打破敌人封锁

从 1932 年起，尤其是中共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到瑞金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对中央苏区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加紧了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致使苏区急需的布匹、棉花、煤油、电池、医药器材、军火原料、特别是食盐严重短缺，直接影响军民日常生活与健康，影响红军战斗力；而苏区盛产的稻谷、茶油、土纸、竹木等农林产品又销不出去，以致减少了工农群众的经济收入，抑制了苏区生产和经济文化建设。为此，中央苏区各级党组织、苏维埃政府和群众团体紧急动员，带领广大群众投入反封锁斗争。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雷厉风行，刘少奇亲自抓这项工作。

经过一番对苏区各省、县的调查、考察后，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召集各省和中央直属县的工会负责人到瑞金开会，讨论如何结合工会实际开展反封锁斗争。与会人员激情澎湃、争相发言，有的说要多增加生产，保证多出产品；有的说要多开店铺，多做生意，加快物资交换；有的说要利用各种社会关系，从白区弄些工业品过来，等等等等。刘少奇饶有兴趣地听着，不时发出会心的微笑，亮出赞许的眼光，但也觉得大家的认识还不够深刻，提出的种种办法还不足以发挥苏区工会自身优势。于是，他在作讨论小结时，首先强调指出反封锁斗争的重要性：只有彻底打破敌人的封锁，才能获得制造炸弹的原材料，解决军民的穿衣、吃盐和伤病员的医药问题；才能维持工农业继续再生产，维持群众生活，巩固苏维埃政权。为此，就要想办法把苏区各地的粮食、食油、生猪、柴火、钨砂等物资运输到白区去，换取我们所需要的东西，以增强我们反“围剿”的力量。

刘少奇因势利导接着说，要做到赤白区间物资交换，除了筹集物资，还要运输物资。前者已有外贸局在做，后者谁来做呢？当然是我们工会做最合适。一来我们有



充足的人力，二来我们有大量的木船、独轮车等工具，三来我们还有丰富的运输工作经验。况且我们这里有赣江这条河流贯通赤白区，利用河道运输比陆路运输不仅运量大，而且自身消耗少，周转速度快。所以，我们应该下大力气做好河道运输工作，为反封锁斗争作出我们工会应有的贡献。

大家听了刘少奇的分析，无不眼前一亮：原来路就在脚下，办法就在彼此之间。于是，造船修船、疏通河流、建立白区据点、联络各地商户等等点子纷纷涌出。一场讨论会圆满结束，效果超出预期。更重要的是，这些办法付诸实践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还锻炼了工人阶级的革命坚定性和斗争灵活性。

指导全总执行局扩红突击队工作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中革军委根据中共中央局指示，决定在1933年12月底以前在全中央苏区扩大2.5万名新战士，为此制订了《中革军委扩大红军突击运动的计划》，将扩红数目分配给江西、福建、粤赣三省所属各县，以及中央直属瑞金县。为了帮助并督促各地迅速开展扩红工作，中革军委的计划还给中央一级各机关（以及省一级）划分了扩红突击区域，包片负责。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的扩红突击区域为江西的石城县和福建的兆征县。

在中共中央局直接领导下，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组织了以时任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组织部部长梁广为队长的石城县扩红突击队，以时任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宣传部部长王子刚为队长的兆征县扩红突击队，分别深入两地进行扩红突击。另外，时任临时中央政府劳动部副部长的朱荣生担任长汀县扩红突击队长，其工作指导也归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负责。

1933年12月14日、12月22日，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刘少奇先后给梁广、郭光洲（时任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青工部代部长）及朱荣生、王子刚写信，就他们写给全总执行局的报告、来信反映的工作情况和思

想认识，进行批评指导。这两封信稍后以《反对扩大红军突击运动中的机会主义的动摇》为题，发表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第41期（1934年1月5日出刊）。

刘少奇写给梁广、郭光洲并转执行局突击队各同志的信指出，全总执行局讨论了梁广寄来的三个报告，尤其是中央组织局召集中央机关检查近期扩红突击运动后，“认为梁广同志在石城县的领导，是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对困难投降，对完成动员500个新战士的任务，是没有信心的”。这是由于他对石城的一般党、团员及苏维埃和党的一般干部“完全不信任”“完全不相信”，却过多强调“因为有大刀匪”，“因为要动员伕子”，“因为石城是到前方去（的）大道，有兵站和医院”等客观原因所致。鉴于梁广不能完成党中央及全总执行局给予他的任务，“决定撤销梁广同志突击队长的职务，并调回执行局工作，同时决定郭光洲同志为突击队队长”。信的末尾对石城县扩红突击队今后的工作提出了原则性意见：必须肃清机会主义的动摇，才能广泛开展扩大红军的群众运动，转变我们的工作，在一定时期内百分之百地完成我们在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中最重要的任务，动员二万五千个新战士到前方。

在给朱荣生、王子刚的复信中，刘少奇分别对二者来信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详尽分析，着重批评了他们工作打不开局面的主观原因（如朱荣生的顾此失彼、抓小弃大；王子刚强调兆征县工作没有基础，却不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以克服消极情绪，只在干部中打圈子），以及错误想法（如王子刚试图用“稍微强迫一下子”的办法要群众当红军）。信中指出：只有改造了那个不健全的组织，在思想斗争中团结与提拔了积极的干部，把组织健全起来，才能保证我们动员到广大群众中去，获得很大的成绩。

虽然目前还没有材料表明刘少奇两封指示信的实际效果，但我们仍然可以体会到他的指示的正确与及时。

（作者系瑞金市党史办原副主任）

魏振卿口述：刘少奇视察高唐姜店

徐秋宁

魏振卿生于1925年，1957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受到表彰，接受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8年7月18日，刘少奇同志到姜店视察工作，时任宏伟农业合作社主任的魏振卿全程陪同了视察工作。1959年，魏振卿作为国庆观礼代表赴京参加了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庆。2009年，高唐县档案局接收了魏振卿老人珍藏的中国第三赴朝慰问团第四总分团第二分团代表团全体合影、刘少奇视察姜店青年技术组棉花试验田、聂荣臻和郭沫若参加中国科学院第三次会议时接见特邀工农劳模代表合影等7张珍贵照片，填补了珍贵档案“空白”。魏振卿老人虽然已93岁高龄，但身体健康，对刘少奇及夫人王光美同志到姜店视察之事仍记忆犹新，讲述过程中老人十分兴奋，就像一个年轻小伙子掩饰不住内心的高兴与激动。

1958年7月16日至18日，刘少奇同志在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的陪同下，到聊城地区视察工作。16日，从济南出发，由泇口北渡黄河，经过茌平温陈走访农户，后从博平桥过徒骇河，晚上到达聊城。17日上午，在寿张县台前村实地查看了玉米、地瓜、谷子种植情况后，又去了寿张北四棚村，下午由阳谷、朝城到达莘县，在莘县大礼堂接见了“莘县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大会代表”，晚上对黄河抗洪作出了重要指示，鼓舞了沿黄干部群众抗洪的信心和决心。18日。从聊城出发到高唐姜店乡。魏振卿老人对刘少奇同志席在高唐姜店视察工作的全过程作了系统回忆：

一、接到首长视察通知

鲁西的盛夏，骄阳似火、热气蒸腾、酷暑难耐，高唐传统农业发达，尤其棉花生产历史悠久，“货似木锦、甲子齐鲁”，清代即为著名的产棉县，以“金高唐”闻名遐迩。1957年，宏伟农业合作社5000亩棉田平均亩产达到70斤皮棉，是全国先进典型之一。

7月17日，高唐县委接到通知，中央首长要来姜店视察工作，主题是棉花及农业生产，当时参与陪同工作的有高唐县委第二书记邢金岭、姜店乡第二书记徐祥之，宏伟农业合作社主任魏振卿。

7月18日上午10点左右，刘少奇同志一行，顶着烈日，没有休息，连一口水也没有喝，乘车直接来到了田间，车门打开后，刘少奇及夫人王光美同志走下车，他身着白色衬衣、灰色裤子，脚穿一双黑布鞋，与前来迎接的干部群众握手致意。

二、刘少奇同志叮嘱要管理好玉米及地瓜

在舒同同志陪同下，刘少奇与夫人王光美同志走向了玉米地，查看玉米生长情况。看到分散大小不一的玉米地，而且玉米长的很小，刘少奇就问：“这些玉米为什么长不好，这么小，这边的地瓜长势不错。”魏振卿回答：“这些是群众的自留地，前段时间旱，群众们都抢种社里的大片庄稼，自家的自留地就晚种了几天，所以与社里的长得就不一样了。”刘少奇同志就叮嘱邢金岭、徐祥之、魏振卿：“这些玉米要施肥，管理要跟上，不要减产，要让社员群众吃饱、穿暖，过上好日子。”

三、刘少奇视察棉花地

来到棉花地，大面积长势茂盛的棉花、绿绿的叶子、五彩的花朵，棉桃和花蕾布满棉枝。此时刘



少奇及夫人王光美，同行的舒同同志都很高兴，满眼的微笑，并对棉花的田间管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刘少奇同志是湖南口音，高唐也有很多土话，交流起来有点困难，王光美同志普通话讲的好，她及时将棉农的话“翻译”给少奇同志，也把少奇同志的话讲述给群众，还一边记录资料。

刘少奇仔细询问科学种植、科学管理等一系列情况，并蹲下身子仔细观察。魏振卿同志也蹲下身子、拨开棉花枝，详细向刘少奇同志介绍，从选种、育苗、播种、定苗、打枝，再到灭虫、施肥和浇水，一边比划一边讲。接着刘少奇又问了棉花的生长期，棉枝的生长期，棉桃的生长期，花蕾的生长期，魏振卿同志一一作了回答。王光美同志一边纪录，一边解释鲁西的土话，刘少奇越听越高兴，称赞魏振卿同志是种棉能手、扎实能干。对徐祥之等同志带领社员群众种棉，对国家的贡献给予表扬。

当魏振卿同志汇报道到每亩棉花的预计产量时，刘少奇同志认真询问，王光美详细的纪录这片棉花多少亩，每亩棉花能种植多少株？每株能长多少果枝，每个果枝能结多少花蕾，多少棉桃。魏振卿同志回答：“每亩种植 5200 颗，成活 5000 颗，每颗 3 至 5 个果枝，每颗每枝底层两个棉桃，中间枝 4 个棉桃，上层 3 个棉桃。”这样就能对每亩产多少棉有了初步的预算。在场所有人无不对刘少奇同志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表示敬佩。

四、田间管理要跟上

刘少奇到了合作社青年组管理的 20 亩棉花试验田。正在田间整枝打叉及管理的年轻人见到刘少奇主席来了，不约而同围了上来，向刘少奇、王光美问好。刘少奇高兴的一一握手问候。当握到青年技术员刘桂英时，赞扬他们勤劳、能干取得了可喜成果，接着刘少奇同志向旁边的赵希芳说：“你整

一颗我看看。”赵希芳激动的整理棉枝，由于心情太激动，漏掉一枝应打下的杈，刘少奇同志顺手掰下，而后给青年们讲述了搞好棉花田间管理的重要性。青年们心里暖融融的，非常敬仰的连连点头、表示赞同。不由自主紧紧跟在刘少奇、王光美身边，心中的喜悦也挂在脸上。一边的记者同志按动快门，留下了美好的瞬间，并铭记在姜店人民心中。

五、刘少奇同志讲苏联农庄的机井灌溉

刘少奇、王光美同志顶着烈日，汗水淋漓的来到机井旁，询问魏振卿同志机井灌溉情况：“一天能浇多少土地、动力怎么解决。”魏振卿同志答到：“一天能浇十亩地，动力有柴油或电力。”

刘少奇同志从包里拿出香烟，给每个人分发了一颗，就详细地介绍了他去苏联考察时，苏联怎么用机井灌溉土地的经验，怎么节水、怎么提高效率的。他讲：“要利用好机井旁的这个水库（也就是蓄水池），日夜不停地把水从机井里抽到这个池子中，储存起来，旱时浇地，不早时做储备。”刘少奇同志还风趣的说：“这样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池中的水经过太阳晒，可以使棉花喝点暖水，庄稼和人一样，人喝凉水肚子疼，庄稼喝了冷水也会不好受。”

魏振卿回忆说：“听了这些，因为对国外先进技术不太了解，当时还不太懂，可过了几天越想越对。”刘少奇同志来视察不但给了精神上的指引，还带来了苏联农庄在田地管理方面的宝贵经验。

六、人民群众牢记刘少奇同志叮嘱

刘少奇、王光美同志实地考察农田、玉米生长情况和机井灌溉情况后，早就过了吃午饭时间了。可到高唐县委后，又听取了县委第二书记邢金岭关于高唐县棉花生产情况的汇报。这时，县委负责人又将刚刚收到的“防总”关于花园口洪峰过后，后续洪水不大，不再使用分洪区滞洪的喜讯汇报给刘

少奇同志。他听后很高兴。

高唐县人民为了感谢刘少奇对高唐的鼓舞与指导，准备了十几道菜，可刘少奇、王光美同志说什么也不让他们做，只让县委食堂做了小米绿豆稀饭、鸡蛋面糊饼和一点小菜。饭后，刘少奇、王光美、舒同等领导同志与高唐县机关干部职工合影留念。

7 月 18 日这天，适逢高唐大集，大街上熙熙攘攘、非常热闹，刘少奇、王光美一行来到县城，人们看到有几辆小车过来，知道是大首长来了，便争先围上，由于刘少奇同志到高唐前就明确的给县委作出了“不搞欢迎仪式、不向外声张”的指示，可是还是有群众认出了刘少奇同志。消息传开后，广大群众不约而同奔向县委大院门口，等待着亲眼看到刘少奇同志的风采。按照预先的行动安排，午饭后要去禹城，当刘少奇同志一行乘车驶出县委大院门口时，在外等待的群众围了上来，刘少奇、王光美同志打开车门，向群众挥手致意，连声说：“谢谢大家。”人群中突然有人喊出：“刘委员长万岁。”刘少奇同志立即回应：“毛主席万岁。”群众恋恋不舍不愿离开，这时工作人员引导出一条通道，车辆由慢而快驶向远方。广大群众一直目送刘少奇同志的车辆看不到为止，才怀着幸福留恋的心情慢慢离开。

刘少奇同志的视察，给高唐县，尤其是姜店乡极大的鼓舞与振奋。为纪念这个光荣的日子，1959 年，高唐县人民在刘少奇、王光美同志视察的地方建造了“幸福亭”，亭高为七米，内径四米的六角仿古建筑，顶呈尖形，木亭角高高翘起，象征着高唐人民永远不忘刘少奇同志的关怀。县委第二书记邢金岭为幸福亭题了“伟大的会见、难忘的一天”的对联。

魏振卿同志回忆：在文革时，刘少奇同志受到了政治陷害和人身迫害，刘少奇同志视察聊城高唐

时接见过的干部群众，也受到牵连，有的被审查，在幸福亭前被批斗。幸福亭也作为县里领导人的一大罪状被毁坏。

回首过往，虽然刘少奇同志视察高唐姜店已经 60 余年。然而，刘少奇同志深入基层、关心群众、艰苦奋斗的作风，实事求是、认真细致的工作精神，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的伟人风范，仍然深深的印刻在高唐姜店乡干部群众心中，刘少奇同志的精神，也鼓舞着现在的同志继续保持对党忠诚、永跟党走的政治品格，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发有为，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不懈努力。

（作者单位：南京东送电力有限公司）



刘少奇谈如何“做一个好的党员”

刘新庆

1940年7月1日，应中共中央中原局机关报《抗敌报》和新四军的《前锋报》《迈进报》等报社邀约，刘少奇同志撰文《做一个好的党员 建设一个好的党》，纪念党成立19周年。这篇8500字的文章，简明扼要地阐述了怎样做一个好的党员的问题。

好的党员是建设一个好的党的基础。党员是党的肌体的细胞，党员合格，党的组织才会坚强有力。刘少奇在文中指出，要建设一个好的党最基本的是要有很多很好的党员。这就要求党员要把“做一个好的党员”作为自己自觉追求的目标而不懈努力。

“做一个好的党员”要勤于自我拷问

一个好的党员着眼于对自己过去的自省和对将来的期盼，拷问自己的内心和灵魂。刘少奇在文中写到，党员应该诚心地问问自己：为了党的事业，曾经尽了何种努力、今后准备怎样努力？检讨自己是否曾经有违反党的利益的思想、言论与行动、怎样确保今后不再违反？他把这样的自我拷问视为党员进步的出发点。孟子曾说“吾日三省吾身”，勤于自省是党员正视自身、加强自我修养的必备良方。“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所有党员都应勤于自省，在这种拷问式的自省中触动自己的灵魂，实现自身党性修养的不断进步，从而不断完善自我、不断超越自我，让自己的人格和思想得到升华，从而达到加强党员修养的目的。

“做一个好的党员”要尽心为党工作

党的最终奋斗目标是带领队伍，团结人民，实现共产主义。在这一过程中，党员需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才能引导人民群众跟党走。实现共产主义，不能停留在口号上，必须落实到行动中。立足本职岗位、努力创造一流业迹，是党员应尽的义务。刘少奇在文中指出，党员要尽心负责地为党工作，爱护党的每一个事物，如自己的事物一样。他的提法，妙在“尽心”二字。要尽心，就必须心有所向、心有所属。从长远来看，党的利益与个人利益终归是一致的，但在具体的事物上，可能会有冲突。党员必须在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有冲突时能做到舍小为大、“舍近求远”，摈弃本位主义的思想，树立大局观、整体观。

“做一个好的党员”要解决好“值得”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是总开关问题。解决好价值观的问题对于党员尤为重要。刘少奇认为，为党的与劳苦大众的公共事业而牺牲，是最值得的。一些党员由于没有解决好价值观的问题，在“值得还是不值得”的问题上犹豫未决，从而丧失了谋事创业的大好机会，甚至为时代潮流所抛弃。正确的价值观源自于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自觉认同。树立了正确的价值观才能放眼未来，为了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而不懈奋斗。这些党员“最引起人们的敬仰，最为万世子孙所怀念所歌颂”，因而最值得。刘少奇在文中批评了那些要求享受在前，吃苦在后的不好的党员，

认为他们虽然暂时讨了一点便宜，但是从长远看，会失去人民群众的信任，因此“最不值得”。

“做一个好的党员”要将之作为终身奋斗的目标

“做一个共产党员是最光荣的”，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则要在主观上和客观上，即在思想认识上和行动实践中，都能终身忠实于党的利益。“做终身的好党员”应是一名党员努力践行的目标。刘少奇指出，“做一个终身的好党员”是终身不能变的；变了就叫动摇、变节或叛变，是党员最大的耻辱。做终身的好党员，在保守党的秘密的同时，“对党就不要有什么秘密”，要做到对党绝对忠诚。如果党员在人生历程中对党有所隐瞒，甚至做不利于党的事情，即使当时不被发现，最后总是会被别人知道、了解，这些党员也不会是终身的好党员。《明史·刘大夏传》有言：“人生盖棺论定，一日未死，即一日忧责未已。”党员只有以“做一个终身的好党员”勉励自己、鞭策自己，才能不断提醒自己尽职尽责、克己奉公，不敢丝毫有所懈怠。

抗日战争年代，对于党员的要求，主要是引导党员愿付出、肯牺牲，相对而言粗线条一些，但也涵盖了政治品质、纪律意识、道德操守、奉献精神等方面的要求。1956年，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党的八大作政治报告时指出：“一个好党员、一个好领导者的重要标志，在于他熟悉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劳动状况，关心人民的痛痒，懂得人民的心”，从更高的站位概括了“好的党员”标准。联系近年来开展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刘少奇所言对“做合格党员”依然有重要指导意义。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共产党人的初心，体现在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在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伟大实践中，也凝聚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朽理论探索的经典文本里。刘少奇关于“好的党员”的阐释，对于我们今天做一名“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好党员依然具有启示意义。

（作者单位：刘少奇同志纪念馆）





历史丰碑

刘振法

2018年11月24日是刘少奇诞辰120周年纪念日，今以党的历史为鉴，我们满怀深情地缅怀他。刘少奇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他的丰功伟绩与崇高风范是一座熠熠生辉的丰碑！我们缅怀刘少奇，也是在缅怀无数的革命先烈，缅怀他们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而献身的崇高风范，纪念他们甘为共产主义事业而流血牺牲的伟大意志，铭记他们的丰功伟绩。正是他们，为着一个共同的伟大理想，不惧艰险、不畏牺牲，前仆后继，才创造了今天的美好幸福生活！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刘少奇在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之后，便将全身心投入到了中国革命的事业当中。从农村到城市、从白区到红区、从学校到工厂、由农民到工人，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刘少奇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呕心沥血，奉献了毕生精力。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刘少奇形成了一系列的理论著作。这些理论著作正是一颗颗闪耀明星，映照着我们中国共产党前进的道路。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写出了共产党人在革命的实践中不断改造自己以成为一个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方法；他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全面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各个方面，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党内的指导地位；他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革命指明了方向；他主持起草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系统说明了新中国的国家性质、人民民主政治制度和人民的权利与义务……

刘少奇是一个伟大的实践者，他的理论都来源于革命的实践——在困难时期他总是走在前面，总是身处最艰险的岗位，担负最繁重的工作。今天再看《刘

少奇选集》，大家不难发现，他的著作不仅在当时有着深刻意义上的历史指导作用，在今天仍然值得所有党员认真思考并学习。这显然与刘少奇一向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一向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的理论著作真正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所在。他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正如他在《论党》中指出的那样：

“党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是根据党所处的内外环境和党的政治任务来决定的，必须具有一定限度的灵活性，如果环境变更，工作条件改变，党提出了新的政治任务，那末，党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也必须有所改变；否则，旧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就要障碍我们党的工作内容的发展与政治任务的执行。我们党之所以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就是我们不仅在思想上、政治上从来不受死的公式束缚，而且从来不把党的组织形式以至任何组织形式，看成是不可改变的死的公式，我们能够根据中国革命斗争发展的具体条件和新的政治任务以及我们在组织上积累起来的新的经验，来经常改进我们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

刘少奇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是为人民幸福生活谋出路而奋力求索的一生，他是值得所有共产党人学习的光辉榜样！今天，我们满怀深情地来追忆刘少奇，不仅是要重温他与党一同成长的艰苦岁月，不仅是要重温他在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过程中写下的理论著作，也不仅是要重温他为党和国家做的贡献，更应当把他留下的宏伟志愿铭刻于心，更应当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更应当自觉地投入到建设中去，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对讲解工作的几点思考

刘徐嘉

从去年7月起，在局党组的推荐下，我进入长沙市委宣传部宣传处跟班学习。市委宣传部宣传处的工作职责是负责完成中央省市布置的各项任务、全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管理、社会宣传、形势政策宣传教育、重要节点群众教育活动的牵头组织等工作。因此，全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创建和管理成为了这两年我工作的重心之一。通过对中央省市各级领导部门对于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工作指导精神的学习，加上在实际工作中对于全国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客观情况的了解，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一级博物馆刘少奇同志纪念馆的讲解员，对于讲解工作也萌发了几点思考。

讲解员要清晰认识到所讲解人物的特征

由于工作需要，在宣传处期间，前往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进行考察指导也是我们日常工作之一，在这一年多时间里，我开始以观众的角度来审视讲解工作。考察过程中发现很多博物馆的讲解员对于讲解词内容通常烂熟于心，也经过了高标准的讲解仪态和礼仪培训，内外兼修、举止大方，但能做到吸引观众的却少之又少。反复比较和思考中，我发现吸引不了观众的讲解员有个通病，就是对于自己讲解的人物特征和品质并没有清晰和客观的认识。向观众展示的人物形象局限于讲解词中提供的基本信息，涉及到精神品质的介绍也仅仅是讲解词中的词句，讲解起来非常生硬，常让观众有被强行灌输的感觉。假设以我馆的讲解内容为例，观众认可度一般的讲解员谈到对刘少奇同志的认识，通常以“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

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是伟大的探索者，卓越的领导人”作为标准答案。诚然因为观众的知识文化水平高低不均，这些客观信息有必要在讲解过程中交代清楚，但作为一名博物馆讲解员的讲解却略显单薄。在这个教育水平高、信息传达快的时代，观众对于刘少奇同志等为党和国家做过杰出贡献的先辈是有一定认识和了解的，他们到刘少奇故里绝对不是来收获在网络中就可以查到的资讯的。想要观众有所收获，讲解员必须要尽可能的使他们对于刘少奇同志有更加深刻而鲜活的认识。例如将陈列展览的开场白大致设计成：“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在刘少奇故里，刘少奇同志标准像的两侧通常挂着‘坚持真理 修正错误’的对联，在我的理解中，这正是对刘少奇同志毕生信念的高度概括，是他最显著的品质特征。接下来就请各位随我来一同走近刘少奇同志的生平，从他人生中的各个阶段探寻他对真理的执着追求。”讲解员应在讲解过程中通过评估观众实际的认知水平，以自身准确且清晰的认识串联起整个讲解内容，让观众在听到讲解后有深刻且客观的认识，从而达到应有的宣传教育成果。通过这一年多大量的实际考察论证：对于所讲解人物有清晰、简洁、准确认识的讲解员在讲解内容重点的把握、内容的组织、临场的应变上都更加得心应手，更容易得到观众认可，同时观众也能从中得到收获。

讲解员要预估好观众的参观需求

博物馆所提供的精神食粮已经成为当下全



社会的普遍需求,但观众的价值取向、风俗习惯、知识文化水平、参观人员组成等因素各异,这决定了观众参观的目的大不相同,因此要做一场成功的讲解,讲解员需要做好观众参观重点的预估工作。例如在宣传处对全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进行考察的过程中,参观了解是必不可少的,有助于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软硬件发展水平的全面了解,更便于立足展览内容的特征来开展各项工作。“因人施讲”多年前是讲解培训中的一种较高的境界,而近年来,大量的同行专家通过对于讲解艺术的科学研究,达成了在大多数情况下可能产生的讲解侧重调整的共识,为“因人施讲”在一定程度上指明了方向。但由于“因人施讲”的讲解准备内容相对繁重,对应变能力的要求也更高,目前很多讲解员并没有很好的运用,甚至直接忽略了解观众的参观需求准备步骤,讲解内容统一用讲解词“以不变应万变”,导致观众的具体参观需求较难得到满足。因此讲解员在日常学习时就要注重设计不同侧重的讲解内容,挖掘更多的讲解角度,对省情、市情、馆情、馆史进行学习总结,在与观众联络的第一时间主动了解其参观需求,尽可能根据具体需求及时调整讲解内容。

讲解内容要跟上党和政府中心工作的宣传形势

要达到弘扬红色文化,宣传伟人精神的目标,宣传的方式和重点的选择尤为重要,从党和政府当前的中心工作中寻找切入点是获得上级政府和社会各界高度重视的良好方式。讲解员除专注于研究所讲解的人物本身外,还应该积极关注时事,对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有一定的了解。在党委机关的实际工作中,我渐渐有深刻的体会,各级部门在策划面向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的活动或竞赛时,其立意都是主题鲜明、意义深刻,有期望达到的社会效应甚至辅助于当前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的,也有其独特性和时效性。然而作为基层岗位的部分讲解员较难意识到这一方面,“往往一套稿子打通关”,什么活动和比赛都是一样的素材,把专注力全部用于斟酌稿件的词句用法、背诵的熟练程度,却没有在实践活动和竞赛的意义上下功夫,讲解宣传的角度也从未更新。一场比赛下来,每个人讲得都很好,素材也十分经典,但适合在当前工作中大力推广的宣传内容并不多。例如,关于刘少奇同志的讲解内容,在“蓝天保卫战”的重点工作背景下,刘少奇同志回乡调查和奔赴东北林区时我国林业问题提出的:要解决环境问题,必须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学会同自然打交道,保护和建设自然环境,但同时必须注意调整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解决好所有制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使人们主动而持续地保护和建设环境等观点就对当下工作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也更容易引起大众的共鸣,从而达到宣传效果。

(作者单位:刘少奇同志纪念馆)

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讲解员

成宣熠

“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讲解员”这是一个大课题,也是所有从事讲解员职业的人员共同的奋斗目标。我国博物馆根据教育活动的性质和特点等方面,可划分为历史类、艺术类、科学与技术类、综合类几大类型,这里主要以历史类,特别是红色文化宣传战线来举例讨论。各个纪念馆的实际情况不大相同,对“优秀”的标准自然也不完全一样,在此仅浅谈几点自己的理解。

一是要树立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具有正确的舆论导向意识。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大环境下倡导的思想也会因发展而不同,一份讲解词无法贯穿始终。讲解员要关注时事政治和社会动态,做到准确把握宣传方向,与时俱进更新知识和信息,进而寻找与讲解的人物或事物相契合的点,让观众真正感受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精神、思想在当下依然鲜活,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二是要具备岗位责任感,尽职尽责为观众服务。讲解员身处一线岗位,一言一行不仅代表个人,更代表着集体形象。一名讲解员从培训到上岗,需要经历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来熟悉陈列,也需要反复多次的练习讲述。上岗后日复一日的为观众讲解介绍,过程中,难免出现缺少激情甚至敷衍的状态。一个展馆或一件文物,作为讲解员也许已经介绍了成百上千遍,但需要认识到观众大多是第一次来参观,第一次来了解版面背后的故事,面对他们要时刻保持饱满的讲解状态,不掺杂个人情绪,热情细致的营造良好的参观氛围,深化责任意识,才能更好的推动工作。

三是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坚持积累的毅

力。讲解员其自身就是知识的传播者,我馆倡导的讲解员“五员一体”也可见对这个岗位较高的综合要求。讲解员对陈列内容和展品要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同时结合陈列形式,研究如何突出陈列亮点,达到教育目的。在熟悉本馆陈列展品之外,还需要沉心静气不断学习,拓展知识面,使自己的知识结构更丰富、严谨,从而更好地延伸讲解内容,扩大宣传效果。当然,作为一名合格的讲解员,要不断锤炼的业务能力还包括基本功普通话、语言表达能力、应急应变能力等多个方面,不变的宗旨都是为了做好讲解来服务观众。

四是真心热爱。它是最重要的,也是以上所有岗位要求的重要支撑。处在一个追求经济效益的大环境下,我们深知讲解员岗位无法带来多高的物质保障,它更多给予的是一种精神文化的富足,只有从内心认同这份事业,真心热爱这份职业,才能坚定信念,并努力提升自身能力和水平,以此更好的宣传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深入挖掘红色文化,推进红色革命文化的教育工作。我们迎来了红色文化事业的新高潮,中央、省、市、县各级对宣传战线的讲解员培养也非常重视,各种形式的比赛和展示机会多、平台好,在这样大好的形势下,讲解员更可花时间、下功夫锤炼自身,精进业务,为做好红色文化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者单位:刘少奇同志纪念馆)

《诗影花明楼》散文诗选登

摄影：罗雄 配文：菲萍



刘少奇同志纪念馆

当白色一再被昭示，
当雪层保留着它独有的释义，
我们还能给予它更多的宽容和憧憬吗？
一个人的心跳混合众多的心跳，
我唯一需要知道的，
这会是什么样的力量点燃反照中的镜像，
巍峨而且澄净，在天地一色间。
此刻，必定有一匹疾驰而去的烈马，
无畏地掠过我们记忆的雪地。
最后，定格在深邃的背景里。

碧水红莲

她一定喻示着什么，
在这样简单的构图中。
假使没有构成背景的熟悉的所在，
我也必定如此固执地认为。
假使没有常绿乔木的浓稠的倒影，
我还是不会改变我追探的执拗。
两相对映，
还需要更清晰的表白吗？



春风杨柳炭子冲

她的名字，
早已熟悉得如同手掌，
时光带来的隐痛，谁将一一述说？
对白或者自语，
在风中，都不足以挽留满湖的波光，
多少人来过，
就有多少人的影迹在堆积，如梭如风。
他们寄予的思和念，
他们沉淀的哀和痛，
在每一粒新发的柳芽里明白无遗地表露过，
一年复一年地。
所以，凝望一直是最好的慰藉。



春华秋实

再绚烂的色彩，
再华美的辞藻，
也掩盖不住她的高贵和冷峻。
叠翠浓彩里，
一切安详如故，一切无以言传。
或许只有最近的那抹红，
更深刻地泄露了我们必然要转述的情感，
在一片透亮中，
让光自由地降落，自由地奔走。
然后，停止联想。

（作者单位：刘少奇同志纪念馆）



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

1=C $\frac{2}{4}$

王硕、叶翔鹰 词
王富文 曲

朗诵：

1935年1月，党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在会议上，刘少奇也发了言，他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为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会后，刘少奇立即向五军团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他满怀激情地鼓励战士们说：“毛泽东又回到中央来了，我们的红军有了希望，我们的党有了希望了，中国革命有了希望了。要听党的话，跟党走，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会场顿时响起热烈掌声！
5月，中央军委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任命刘伯承担任先遣部队司令、聂荣臻任政委，率部为全军开路。在进入大凉山时，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使部队顺利通过彝区，迅速到达安顺场渡口。在刘伯承、聂荣臻、杨德志等亲临战场指挥下，在嘹亮的军号声中，在猛烈火力掩护下，十七勇士的小船象离弦的箭，飞向对岸，经过激战，红军占领了北岸渡口。后续部队过河后，一口气扫除了沿河四十里的敌人。接着南北两路红军积极配合，沿河而上，夺下泸定桥，彻底粉碎了蒋介石梦想让毛泽东成为第二个石达开的阴谋。为红军继续北上赢得了宝贵时间。

请听：《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

稍快

(枪炮声 321 321 | 543 543 | 321 321 | 543 543 | 5432 3456 | 7123 4567 | 111 111 | 5432)

男独

||: 1̣ 1̣ . | 5 5 . | 6̣ . 6 5 | 6̣ 6 6 6̣ 6 6 | 5 6̣ 6 | 5 — |

巨浪巨浪打小船，打呀嘛打小船，向前冲，
踏浪踏浪抢滩头，抢呀嘛抢滩头，向前冲，

男独

3 3 . | 1 1 . | 3̣ . 3 1 | 3̣ 3 3 3̣ 3 3 | 1 3̣ 3 | 1 — |

军号军号振军心，振呀嘛振军心向前冲，
勇士勇士冲敌阵，冲呀嘛冲敌阵向前冲，

男女齐

1̣ 3̣ 3 | 1 — |

女齐

6̣ . 6 1 | 3̣ . 3 3 | 5 5 6 5 1 | 2 2 | 5̣ . 5 3 | 0 0 |

子弹呀，飞满天，飞呀嘛飞满天嘞，向前冲，
群投呀，手榴弹，手呀嘛手榴弹嘞，向前冲，

男齐

0 0 | 0 0 | 0 0 | 0 0 | 0 0 | 6̣ . 6 1̣ 5̣ 5 3 |

炮声哪似雷鸣
敌乱呀心胆惊

0 0 | 0 0 | 0 0 | 1̣ 1̣ | 1̣ — |

冲冲冲！
冲冲冲！

5̣ 5 3 | 5 6 | 5 — | 6̣ 6 | 5 — |

似呀嘛似雷鸣。冲冲冲！
心呀嘛心胆惊。冲冲冲！

6̣ . 1̣ | 3 — | 6̣ 6 | 5 — | 3̣ 3 2̣ | 1̣ 7̣ 6 | 5 — | 5 — |

命悬大渡河，一发坠千钧，
短兵相接处，敌溃逃富林，

0 0 | 6̣ . 1̣ | 3 — | 6̣ 6 | 5 — | 3̣ 3 2̣ | 1̣ 7̣ 6 | 5 — |

命悬大渡河，一发坠千钧，
短兵相接处，敌溃逃富林，

6̣ . 1̣ | 4̣ . 3̣ | 2̣ . 3̣ | 5 — | 4̣ . 6̣ | 4̣ . 6̣ | 5 4̣ 3̣ | 2 — | 2 — |

勇士十七人，忘我忘我舍死生。
乘胜追逃敌，美罗美罗野猪岭。

5 — | 6̣ . 1̣ | 4̣ . 3̣ | 2̣ . 3̣ | 5 — | 4̣ . 6̣ | 5 4̣ 3̣ | 2 — | 2 — |

勇士十七人，忘我舍死生。
乘胜追逃敌，美罗野猪岭。

1

朗诵：船近北岸触暗礁，浪打船冲桃子湾，四位船工跳下水，拼命用背顶着船，船上四位老船工，奋力向前撑篙杆，小船颠簸地靠了岸，勇士们跳入水中冲上岸。:||

2

(3̣3̣2̣ 1̣1̣ | 7̣1̣7̣6 55 | 6̣6̣1̣ 543 | 2234 5 | 6̣6̣1̣ 33 | 5435 22 | 3523 567 | 1111) |

女高

5 — | 3̣ — | 1̣ 1̣ 1̣ 6 | 5 — | 1̣ 1̣ 2̣ | 1̣ 7̣ 6 | 5 — | 5 — |

女低

3 — | 1̣ — | 5 5 5 4 | 3 — | 5 5 7 | 5 5 4 | 3 — | 3 — |

红军突破封锁线，突破封锁线，

男高

5 — | 3̣ — | 1̣ 1̣ 1̣ 6 | 5 — | 1̣ 1̣ 2̣ | 1̣ 7̣ 6 | 5 — | 5 — |

男低

3 — | 1̣ — | 5 5 5 4 | 3 — | 5 5 7 | 5 5 4 | 3 — | 3 — |

翼王悲剧成泡影，悲剧成泡影，

6 — | 2̣ — | 3̣ 3̣ 1̣ 6 | 2̣ — | 5̣ 3̣ 5̣ | 2̣ 3̣ 5̣ 6 | 1̣ — | 1̣ — |

4 — | 7̣ — | 1̣ 1̣ 5 4 | 7̣ — | 3̣ 1̣ 3̣ | 7̣ 1̣ 3̣ 4 | 5 — | 5 — |

翼王悲剧成泡影，悲剧成泡影，

6 — | 2̣ — | 3̣ 3̣ 1̣ 6 | 2̣ — | 5̣ 3̣ 5̣ | 2̣ 3̣ 5̣ 6 | 1̣ — | 1̣ — |

4 — | 7̣ — | 1̣ 1̣ 5 4 | 7̣ — | 3̣ 1̣ 3̣ | 7̣ 1̣ 3̣ 4 | 5 — | 5 — |

男女齐，第二遍快一倍

||: 3̣ . 3̣ 6̣ 6 | 1̣ 6 5 | 2̣ . 2̣ 1̣ 2̣ | 1̣ 6 5 | 6̣ . 6 2̣ 2̣ | 3̣ . 3̣ 2̣ | 3̣ . 3̣ 2̣ 3̣ | 2̣ 5 1̣ :||

昼夜奔袭二百四，泸定桥上显威名，强渡大渡越天险，勇猛威风贯古今。

男女高

3 — | 6 — | 6 1̣ . 1̣ | 7̣ . 1̣ | 6 — | 6 — | 6 — | 6 — |

男女低

0 0 | 0 0 | 0 0 | 0 0 | 0 0 | 0 5 6 | 5 1̣ 2̣ | 3̣ — |

红军北上，

0 6 | 2̣ — | 2̣ 2̣ 3̣ | 1̣ 6 | 2̣ — | 2̣ — | 2̣ — | 2̣ — |

历史雅安留美名。

3̣ — | 0 0 | 0 0 | 0 0 | 0 0 | 0 5 5 | 5 5 | 5 — |

雅安留美名。

女高

5̣ 5̣ 3̣ | 2̣ . 3̣ 5̣ 6 | 1̣ — | 1̣ — ||

女低

3̣ 3̣ 1̣ | 7̣ . 1̣ 3̣ 4 | 5 — | 5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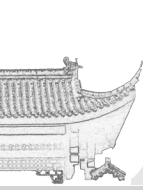
雅安留美名。

男高

5̣ 5̣ 3̣ | 2̣ . 3̣ 5̣ 6 | 1̣ — | 1̣ — ||

男低

3̣ 3̣ 1̣ | 7̣ . 1̣ 3̣ 4 | 3 — | 3 — ||



纪念刘主席诞辰 120 周年

春游花明园

黄树诚

不负河清雾净天，赏春来到花明园。
琼楼映日融春色，细柳摇风吻睡莲。
点缀绿荫红桤木，伤怀冤屈白杜鹃。
繁花似锦流芳远，何处荣华可比肩？

（作者系湖南省诗词协会会员）

梅花盛开是少奇的缕缕幽香

刘丙坤

一个给春天写信的人，夙夜在公趟过春风和石径小路
信封里装进满天星斗，也装进花明园里枝头的梅花
皑皑白雪，宁乡的梅花，在古圣先贤们的典籍里，长久盛开，从未凋谢
渭璜先生，你有一颗玉蝶、朱砂的梅花素心
穿山渡水，随风而来，世间万物，焕然一新
一叶湖畔，梅花盛开是少奇的缕缕幽香
怒放在被历史铭记的生活中
——那些灵魂里隔世的钢筋铁骨
被大爱、温暖与缅怀的时光照亮

（作者系湖南省诗歌学会会员）

一张老照片的故事

孙意谋

1961 年 4 月 2 日至 5 月 16 日，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同志回到阔别四十多年的家乡湖南，先后在宁乡县东湖塘公社、花明楼公社、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农村开展了为期 44 天的农村调查研究。

5 月 9 日，刘少奇到黄材视察建设中的黄材水库。

下午返回县城途中，当经过双凫铺公社黑塘仑时，见到一妇女正在路旁哭泣。他示意司机停车，疾步走到这名妇女身边，问她：“你为什么事情伤心？”

那妇女说：“我家八口人，土改时分了五间房子，两年 before 被拆了建猪场，老信子修黄材水库

时活活累死了，到今天我已经搬了八次家，现在又要我赶快搬，我拖儿带女的往哪里搬……”

刘少奇要随行人员找来一个大队干部，问明这妇女讲的是实话后，对这个大队干部说：“你告诉大队不要让她搬，县委很快有文件下发的，按文件办。鸟必有窝，人必有屋嘛！”“一家人没有一个落脚点，怎么能安心呢？定了屋也就定了心，生产也就定了，积极性才能调动起来。”

发生在黑塘仑的这件事对刘少奇的触动很大。回县城后，刘少奇立即找来县委领导，听了县委何长友关于社员住房情况的汇报：全县原有社员住房

70 多万间，前两年拆茅屋作土杂肥，拆掉一批，大炼钢铁需要木材拆掉一批，大办食堂强调集中统一居住又拆掉一批，这样“三个一批”共拆掉社员住房 15 万多间，还有 5%—7% 的住房被公社、大队以及企事业单位平调和占用。公共食堂解散后，社员

要求住原屋，一动引起百动。

刘少奇听后百感交集，严肃地指出：“我们革命的目的，是要解决广大群众的吃饭、穿衣和住房问题，人民受了这么多苦，要为他们分忧啊！要不然要我们共产党人干什么？”“县委要立即起草一个

文件下发，我等着看稿，修改后一面报省委，一面立即发生产队。”并指示，以下四条作为文件的主要内容：第一，重申党的政策，公社、大队、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平调社员的房屋一律要退还，并应先退给被平调或被拆毁房屋的社员住；第二，社员搬家要经过社员开会决定，大队统一安排，公社批准；第三，在现在的条件下，暂不提“屋归原主”的口号，社员与社员之间不应当直接进行房屋的借租和购买；第四，现有土地、劳力、自留地一律不动。

文件初稿拟出后，已是 5 月 10 日凌晨 2 点，刘少奇立即审阅修改。天亮时，刘少奇提笔写下了如



下批示：“何长友同志：此件我作了一些修改，是否妥当？请酌定。此件是否印发或在电话会上通知各公社、各大队？也请你酌定。又，此件应立即报告省委。刘少奇。5月10日。”

刘少奇对文件作出批示后，县委立即认真贯彻。省委很快向全省转发了这个文件。这对当时全县乃至全省稳定大局，防止和解决房屋纠纷，恢复和发展生产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件发生在黑塘仑并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事，却并未在相关史料里留下记录。《刘少奇大辞典》中，只是简单地记录了这一天的活动：“5月9日，同花明楼公社整风整社工作队座谈。下午，在返回宁乡县城途中视察黄材水库。晚上，回到宁乡县城。”在其他的有关少奇主席的书籍里，也没有少奇主席在黑塘仑了解群众住房问题的记录。

2018年7月30日，市历史文化资源普查办公室来到黑塘仑，了解少奇主席在黑塘仑调研的情况。这里如今属于双凫铺镇双明村红塘组。盛夏时节，田野山岗一片翠绿，想必当年少奇主席来到黑塘仑时，也正是这样的景象。年过八旬的姜端桃老人精神矍铄，站在门前远远地迎接我们。老人家正是当年接受少奇主席调研的见证人之一。在老人家的讲述中，一段尘封的往事在我们眼前徐徐展开。

那一年，姜端桃还只有20多岁，正是两个孩子的妈妈。这天午后，她正要往供销社去买盐。刚走出家门不远，便见到一行人正朝她走过来。走在前面的是一位身材高大、满头白发的老人，见到她，便问到：“要做么子事去啊？”姜端桃告诉他，正要去买盐。随同的人便和气地告诉她，想去她家看看她的房子。姜端桃这才觉察，她今天是碰到了领导来视察。

她带着这一行人来到她家，请他们在堂屋里坐下，她自己也在那位白发领导前面坐了下来。她当

时并不知道坐在她面前的这位领导是时任国家主席的少奇同志。直到他们离开她家，同来的村里的领导才对她说：“这是少奇主席！”她才恍然大悟。

尽管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当年少奇主席在她家调研的情景，姜端桃还记忆犹新，历历在目。气氛很融洽，姜端桃感觉像在聊家常。主席先问她家里多少人吃饭，伙食如何？又问她，这房子是她自家的，还是分配的？够用吗？她一一作了回答。

这一行人与她谈了大约半个小时，便告辞走了。姜端桃送走他们，便也关了门，继续去供销社买盐。

后来，当她知道来到她家的是少奇主席时，便将这一次与少奇主席见面的情景牢牢地记在心里。

前几年，村支部书记给她送来一张照片。她一看，马上就认出，这照片正是当年少奇主席来她家调研时拍的。照片上的她，一头秀发如同瀑布倾泄而下，她面带笑容，正坐在少奇主席面前。少奇主席神态安详，正在和她聊着什么。他的身旁站着一位女性，姜端桃认出那便是少奇主席夫人光美同志。

我们听完姜端桃老人的讲述，请她老人家在沙发上坐好，摆上当年的那张照片，给老人又拍了一张照片。当年秀发如云的年轻人，如今已经满头白发。韦力先生说：时代巨轮滚滚向前，我们无法阻止整个社会的大变革。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多地拍下一些照片，记录下一些详细的文字，使之有迹可循。我想，这也是我们开展历史文化资源普查工作的全部意义所在。

（作者系宁乡市政协文教卫体委主任）

2018年7-12月刘少奇同志纪念馆工作提要

7月

7月1日，宁乡经开区党工委书记、宁乡市委书记周辉，市委副书记、市长付旭明，市委副书记刘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喻亚军，市政协主席邓杰平等来馆参观学习。

7月3日，由我馆和广州博物馆联合主办的《从严治家——刘少奇家风专题展览》在广州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纪念馆开展，我馆宣传教育部部长姜艳辉参加开展仪式。

7月13日-14日，馆长罗雄应邀参加由哈尔滨市文广新局组织的抢救性保护修复中共满洲省委和刘少奇在哈尔滨革命活动旧址（刘少奇旧居）专家论证会。

7月14日，中南大学党委副书记蒋建湘率中南大学研究红色旅游风景区配套服务设施转型升级工作调研团一行来馆参观考察。

7月18日，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二处处长、刘少奇思想生平研究会秘书长杨志强来馆指导《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刘少奇生平业绩陈列布展等工作。

7月20日，湖南省十大文化地标评选入围答辩会在湖南省文化厅举行，馆长罗雄参加。

7月20日，我馆开展全员安全生产业务知识培训，组织安全生产知识抢答赛。湖南省文物局调研员刘春、长沙市旅游局副局长廖双寅等应邀讲授安全生产业务知识。

7月22日，中南大学党委副书记蒋建湘来馆考察新生入学教育相关事宜。

7月24日，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办公厅主任狄瑞明一行来馆参观。

7月31日，新华社“城市精神”调研团来我馆参观。

8月

8月9日，我馆召开干部任命会议，会议由市委副秘书长、我馆党组书记刘晖主持，市委组织部干二处处长刘克刚宣读市委任免决定：聂勇同志任刘少奇同志纪念馆（刘少奇故里管理局）党组成员、副书记、馆长（局长）。

8月12日，朱德故居管理局原局长（馆长）龙腾飞一行来馆考察。

8月16日，湖南省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120周年省委常委议事协调会议在长沙召开。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蔡振红，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谢建辉，省直相关单位、长沙市、宁乡市、刘少奇同志纪念馆等单位领导出席。

8月23日，长沙市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120周年筹备工作领导小组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市委副书记徐宏源，市委常委、秘书长夏建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高山，市委常委、副市长舒行钢，长沙市相关市直单位、宁乡市、刘少奇同志纪念馆等单位领导出席。

8月31日，李自健、毛国保、雷宜锌等艺术家来馆共商我馆基本陈列《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所需艺术品，落实省委宣传部艺术品评审会的会议精神，馆长聂勇、副馆长彭明建等出席。



9 月

9 月 4 日,我馆召开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 120 周年活动筹备工作推进大会。 9 月 5 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周农,省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徐文龙,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李铁华等一行来馆调研考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高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芮英姿,市委副书记、馆党组书记刘晖,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周宏兆,馆长聂勇,宁乡市市长付旭明等陪同。

9 月 20 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胡衡华来馆调度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 120 周年活动筹备工作。市委副书记徐宏源,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夏建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高山,宁乡经开区党工委书记、宁乡市委书记周辉,市委副书记、馆党组书记刘晖,馆长(局长)聂勇,市直相关单位领导出席会议。

9 月 26 日,武警部队原副政治委员贾润兴来馆参观。

9 月 29 日,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机关党委书记符俊根一行来馆参观。

9 月 29 日,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司长欧晓理一行来馆参观,长沙市委副书记、市长胡忠雄,市发改委主任夏文斌,馆长聂勇陪同。

10 月

10 月 19 日,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蔡振红带领相关部门来馆调研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 120 周年活动筹备工作情况,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高山,宁乡经开区党工委书记、宁乡市委书记周辉,市委副书记、馆党组书记刘晖,馆长聂勇陪同调研。

10 月 24 日,由长沙市文明办、长沙市直机关工委组成的湖南省文明单位考评验收组来馆检查我馆湖南省文明单位创建工作开展情况。

10 月 25 日,市委副书记徐宏源来馆调研督查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 120 周年活动筹备工作,市委副书记、馆党组书记刘晖,馆长聂勇,副馆长易锦君、黄可、熊学爱、彭明建陪同。

10 月 26 日,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编研部主任李颖,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张超来馆参加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 120 周年学术研讨会协调会。

10 月 27 日,刘家亲属刘维宁、佟丽娅一行 40 余人来馆参观,敬献花篮,馆长聂勇,副馆长易锦君、黄可陪同。

11 月

11 月 6 日,由湖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湖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华声在线承办的潇湘“红八景”负责人培训班在长沙开班,副馆长熊学爱参加。

11 月 7 日,湖南省博物馆学会 2018 年年会暨 " 博物馆——让藏品活起来 " 专题学术研讨会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首府吉首市召开。我馆李桂芳、吴力斌、罗超群 3 篇论文入选。

11 月 8 日,由湖南省委宣传部、省委网信办、省文化和旅游厅共同主办,红网承办的湖南文化地标(2018)推选活动在湖南音乐厅举行授牌仪式,我馆获评湖南文化地标。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蔡振红,副省长吴桂英出席仪式并为文化地标单位授牌。我馆馆长聂勇出席并接受授牌。

11 月 8 日,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省党史联络组常务副组长杨泰波一行来馆参观,市委副书记、馆党组书记刘晖,副馆长易锦君陪同。

11 月 10 日,福建省政协副主席薛卫民一行来馆参观。

11 月 12 日,长沙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夏建平率队到北京向刘少奇之子刘源将军汇报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 120 周年活动筹备工作情况,并邀请刘源将军参加省、市纪念活动,馆长聂勇陪同。

11 月 13 日,全国关心下一代国史党史教育基地授牌仪式在我馆门楼广场举行,副馆长熊学爱主持授牌仪式,原长沙市政协主席、长沙市委工委书记董学生讲话并授牌,馆长聂勇接牌。

11 月 18 日,高检院党组第三巡视组组长李定达一行来馆参观。

11 月 20 日,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 120 周年书法美术作品展在长沙市博物馆开展。

11 月 23 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馆长聂勇参会。

11 月 24 日,湖南省举行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全体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负责同志;刘少奇同志主要亲属代表及部分革命元勋后代;省直有关单位、长沙市、宁乡市主要负责同志及社会各界代表出席。座谈会前,全体与会人员在我馆向刘少奇同志铜像敬献花篮,并参观基本陈列《共和国主席刘少奇》。

11 月 25 日,为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 120 周年,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编研部、湖南省委宣传部等联合主办的“刘少奇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学术研讨会在长沙举行,来自全国各地 100 余位专家学者参加研讨会。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务委员陈晋,湖南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蔡振红出席研讨会并讲话,刘少奇之子、刘源将军及多位革命元勋后代应邀出席。

11 月 27 日,中国文联副主席、原党组书记赵实同志一行来馆参观,馆长聂勇陪同。

12 月

12 月 2 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郭声琨来馆参观,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胡衡华,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谢建辉,长沙市委副书记、馆党组书记刘晖,馆长聂勇等陪同。

12 月 8 日起,我馆开始实行周一闭馆制度(法定节假日除外),开放时间为:周二到周日 9:00—17:00。

12 月 10 日,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耿惠昌一行来馆参观,副馆长黄可陪同。

搜集、整理: 周雨城

2018 年 10–12 月我馆及刘少奇宣传与研究篇目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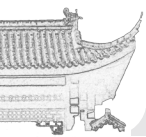
一、我馆宣传研究动态

- 1、《花明楼》MV 宁乡开拍 / 长音 //《长沙晚报》，2018.10.15 第 8 版
- 2、故居——一代伟人在这里诞生 / 刘淑兰 //《今日宁乡》，2018.10.19 第 5 版
- 3、十大湖南文化地标出炉——蔡振红吴桂英为获评单位授牌 / 胡兆洪、刘清心 //《长沙晚报》，2018.11.09 第 1 版
- 4、深挖红色资源 传承红色基因——杨泰波钟兴详谭小平到宁乡市调研 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 120 周年筹备等工作 / 黎铁桥 //《长沙晚报》，2018.11.09 第 2 版
- 5、全力以赴完成好各项筹备任务——高山调研刘少奇同志诞辰 120 周年纪念活动筹备工作 / 唐朝昭 //《长沙晚报》，2018.11.21 第 2 版
- 6、特色党课讲唱演俱全 / 张禹、尹芳 //《长沙晚报》，2018.11.21 第 4 版
- 7、书法长卷《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刘少奇故里首展——60 米长卷书写刘少奇著作 / 夏瑞虹 //《长沙晚报》，2018.10.22 第 12 版
- 8、精准精细做好筹备工作——徐宏源调研督查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 120 周年活动筹备工作 / 唐朝昭 //《长沙晚报》，2018.10.26 第 1 版
- 9、刘少奇故居及纪念馆获评湖南文化地标 / 刘淑兰 //《今日宁乡》，2018.11.14 第 1 版
- 10、日新月异的少奇故里花明楼 / 陈燕 //《今日宁乡》，2018.11.15 第 4 版
- 11、中共中央举行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李克强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 栗战书主持 / 李昌盛 //《人民日报》，2018.11.24 第 1 版
- 12、在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 习近平 //《人民日报》，2018.11.24 第 2 版
- 13、在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冷溶、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杨振武、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湖南省委书记杜家毫 //《人民日报》，2018.11.24 第 7 版
- 14、在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冷溶、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杨振武、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湖南省委书记杜家毫 //《光明日报》，2018.11.24 第 7 版
- 15、在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 习近平 //《光明日报》，2018.11.24 第 2 版
- 16、卓越的历史功勋 伟大的人民公仆——关于刘少奇同志一些档案文献的回顾 / 王刚 //《人民日报》，2018.11.26 第 6 版
- 17、缅怀不朽功勋 弘扬革命精神 开启湖南高质量发展新征程——我省举行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杜家毫发表讲话 许达哲主持 刘源出席 / 贺佳、周映恒 //《湖南日报》，2018.11.25 第 1 版
- 18、在湖南省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 杜家豪 //《湖南日报》，2018.11.25 第 2 版
- 19、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市广大干群中引起热烈反响——传承少奇风范 建设美好家园 //《今日宁乡》，2018.11.26 第 2 版
- 20、他的英名和功勋永远为人民所铭记——湖南省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发言摘登 //《湖南日报》，2018.11.26 第 3 版
- 21、“刘少奇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学术研讨会举行——刘源陈晋蔡振红出席 / 李国斌、尹芳 //《湖南日报》，2018.11.26 第 2 版
- 22、“刘少奇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学术研讨会举行——刘源陈晋蔡振红出席 / 李国斌、尹芳 //《长沙晚报》，2018.11.26 第 1 版
- 23、上海召开“刘少奇与新四军”学术研讨会 / 江跃中 //《镜·党史信息报》，2018.11.28 第 2 版
- 24、刘少奇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学术研讨会在长沙召开 / 尹芳 //《中国文物报》，2018.11.30 第 1 版
- 25、刘少奇同志纪念馆每周一闭馆 / 张禹、尹芳 //《长沙晚报》，2018.12.02 第 3 版
- 26、习近平《在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人民日报》，2018.12.04 第 1 版
- 27、用好新媒体，为红色景区添彩——刘少奇同志纪念馆的新媒体运营实践 / 吴力斌、成佼 //《中国旅游报》，

- 2018.10.19 第 6–7 版
- 28、写给花明楼 / 钟菲萍 //《中国工人报》，2018.10.19
- 29、花明楼的白玉兰 / 钟菲萍 //《今日宁乡》，2018.11.01 第 8 版
- 30、刘少奇同志眷念的父老乡亲 / 钟菲萍 //《今日宁乡》，2018.11.02 第 7 版
- 31、特殊的礼品单 / 钟菲萍 //《今日宁乡》，2018.11.05 第 4 版
- 32、中山装背后的故事 / 钟菲萍 //《今日宁乡》，2018.11.07 第 3 版
- 33、一把破旧的藤椅 / 李桂芳 //《今日宁乡》，2018.11.08 第 3 版
- 34、一件羊毛衣 / 李桂芳 //《今日宁乡》.2018.11.12 第 3 版
- 35、“我看书就是最好的休息” / 李桂芳 //《今日宁乡》，2018.11.13 第 4 版
- 36、特殊党费 / 李桂芳 //《今日宁乡》，2018.11.15 第 3 版
- 37、一块经常“罢工”的手表 / 李桂芳 //《今日宁乡》，2018.11.16 第 3 版
- 38、视察都江堰的摄影相册 / 李桂芳 //《今日宁乡》，2018.11.20 第 3 版
- 39、少年刘少奇了解时事的一个窗口，勤思好学的一个见证——《辛亥革命始末记》 / 李桂芳 //《今日宁乡》，2018.11.21 第 3 版
- 40、普通而简单的木床 / 李桂芳 //《今日宁乡》，2018.11.22 第 3 版
- 41、山高水长 万古流芳——刘少奇同志纪念馆文物背后的故事 / 李桂芳、孙中华、戴娇、魏枫 //《中国纪检监察报》，2018.11.23 第 5 版
- 42、刘少奇积极提倡“半工半读”这种新型的劳动制度和教育制度，探索一条“培养全面发展新人”的道路——多次阅读《资本论》第一卷 / 李桂芳 //《今日宁乡》，2018.11.23 第 3 版
- 43、一张不寻常的礼品单 / 李桂芳 //《今日宁乡》，2018.11.27 第 3 版
- 44、刘少奇读过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 李桂芳 //《今日宁乡》，2018.11.28 第 3 版
- 45、一本被翻得残缺不全的字典 / 李桂芳 //《今日宁乡》，2018.11.29 第 3 版
- 46、从文物看刘少奇同志务实清廉的优良作风 / 李桂芳 //《中国文物报》，2018.11.30 第 5 版
- 47、少奇故里（组诗） / 钟菲萍 //《今日宁乡》，2018.12.03 第 8 版
- 48、见证友谊的《宋庆龄选集》 / 罗雄 //《湘潮》，2018 年第 9 期 P62
- 49、刘少奇送给农民的《新华字典》 / 罗雄 //《湘潮》，2018 年第 10 期 P63
- 50、少奇和他的平民亲属 / 钟菲萍 //《长沙通讯》，2018.11.05P58–59
- 51、刘少奇：不做“爬行的马克思主义者” / 刘新庆 //《党史文苑》，2018.10P61–62
- 52、“一定要了解和掌握真实情况”——刘少奇湖南农村 44 天调查的启示 / 罗雄 //《新湘评论》，2018 年第 22 期 P31–32
- 53、刘少奇同志纪念馆的建设和发展历程 / 罗礼、彭明建 //《长沙改革开放实录》第一辑，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2018.11P323–334
- 54、《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从刘少奇的几件遗物说起》 / 李桂芳 //《档案春秋》，2018 年第 12 期 P4–10
- 55、刘少奇的革命生涯 / 罗雄 //《百年潮》，2018.11P5–11
- 56、“我们的修养不能脱离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学习刘少奇的党性修养理论与实践 / 聂勇 //《新湘评论》，2018 年第 21 期 P28–29
- 57、刘少奇诞辰 120 周年学术座谈会举行，陈元、刘源等出席 / 岳怀让 // 央视网，2018 年 11 月 20 日
- 58、刘少奇故居纪念馆获无偿捐赠经典著作版本填补馆藏空白 / 应妮 // 中新网湖南站，2018 年 12 月 30 日

二、国内刘少奇宣传研究动态

- 1、刘少奇在宁乡——你所不知道的学习故事 / 喻梦霖 //《文史博览》增刊，2018P56–61
- 2、刘少奇最后一次回宁乡 / 喻梦霖、任铁、杨亚 //《文史博览》增刊，2018P62–67
- 3、护送刘少奇过微山湖 / 朱宗珂 //《百年潮》，2018.10P58–61
- 4、刘少奇的人民情怀 / 谭智俊 //《百年潮》，2018.10P12–17



- 5、坚持终身学习的刘少奇 / 刘宝东 //《百年潮》，2018.10P18-25
- 6、刘少奇的治学之道 / 王玉强 //《百年潮》，2018.10P93
- 7、刘少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要认真学 / 沈鹤 //《新湘评论》，2018 年第 21 期 P42-45
- 8、刘少奇的历史瞬间 //《党史文苑》，2018.10 封二、封三
- 9、探索新中国之路：站在毛泽东与邓小平之间的刘少奇 / 林蕴晖 //《党史博览》，2018.11P13-19
- 10、以宏观的视野看刘少奇到山东 / 黄瑶 //《党史博览》，2018.11P20-28
- 11、青年刘少奇的初心之旅 / 沈鹤 //《湘潮》，2018.09P20-23
- 12、刘少奇与吕振羽的工作交往与革命情谊 / 吕坚 //《湘潮》，2018.10P4-9
- 13、1961 年：刘少奇的调查研究 / 潘敬国 //《湘潮》，2018.10P18-20
- 14、刘少奇的人民情怀 / 王文珍 //《湘潮》，2018.11P4-9
- 15、刘少奇与人民军队两次大发展 / 刘明钢 //《党史博采》，2018.10P21-24
- 16、刘少奇与党的建设 / 胡新民 //《党史博采》，2018.11P14-18
- 17、刘少奇一生所担任的职务 / 王树人 //《党史博采》，2018.11P19-23
- 18、全面抗战时期刘少奇担任三个中央局书记始末 / 水新营 //《党史博采》，2018.11P24-29
- 19、近六年来刘少奇安源工运历史研究情况述评 / 黄仉 //《党史文苑》上，2018.11P57-60
- 20、刘少奇民主集中制思想探析——重温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 / 王一喆 //《党的文献》，2018 年第 5 期 P56-62
- 21、刘少奇与陈云的世纪友谊 / 陶蕾 //《党史博采》，2018.12P23-27
- 22、刘少奇与安源工人运动 / 石杨柳、谢卓芝 //《党史纵横》，2018.12P4-6
- 23、刘少奇同志与母亲的最后一次见面 / 彭智勇 //《今日宁乡》，2018.10.25 第 4 版
- 24、刘源：父亲刘少奇的早期革命生涯 //《文萃报》，2018.10.26 第 13 版
- 25、《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怎样炼成的 / 彭智勇 //《今日宁乡》，2018.10.30 第 4 版
- 26、巧用空棺 平安脱险 / 刘淑兰 //《今日宁乡》，2018.11.01 第 5 版
- 27、花明楼赋 / 陈丽柯 //《今日宁乡》，2018.11.09 第 3 版
- 28、刘少奇炮火硝烟中关心群众疾苦 / 孟红 //《镜·党史信息报》，2018.11.14 第 3 版
- 29、共和国主席的钱柜 / 刘振德 //《今日宁乡》，2018.11.19 第 3 版
- 30、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刘少奇的长征岁月 / 董杨 //《镜·党史信息报》，2018.11.21 第 3 版
- 31、独登花明楼 / 易风葵 //《长沙晚报》，2018.11.22 第 12 版
- 32、刘少奇论个人与组织 / 王黎锋 //《镜·党史信息报》，2018.11.28 第 4 版
- 33、刘少奇与朱德的亲密交往 / 刘健 //《作家文摘》，2018.12.04 第 1 版
- 34、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 120 周年专刊 //《党的文献》增刊，2018 年总第 192 期
- 35、刘少奇诞辰 120 周年，刘源有话要对父亲说 //《宁乡文史》，2018.12P4-8
- 36、刘少奇的民本思想与新农村蓝图 / 罗雄 //《宁乡文史》，2018.12P9-11
- 37、刘少奇与何宝珍烈士的人生交往 / 谢仲舒 //《宁乡文史》，2018.12P12-13
- 38、小故事 大胸怀 / 黄祖同、黄向秦搜集整理 //《宁乡文史》，2018.12P14-15
- 39、刘少奇求学玉潭镇 / 孙意谋 //《宁乡文史》，2018.12P16-19
- 40、宁乡刘少奇祖源于江西 / 王智琦 //《宁乡文史》，2018.12P20
- 41、抗战时期刘少奇在山东以“螺丝钉”精神育人 / 王晓华 //《宁乡文史》，2018.12P21-23
- 42、青花笔筒陪刘少奇读过不眠之夜 / 李家军 //《宁乡文史》，2018.12P24
- 43、刘少奇为何被誉为“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 / 水新营 // 人民网，2018 年 11 月 27 日
- 44、刘少奇如何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 / 陈斌、唐莲英 // 光明网，2018 年 12 月 04 日
- 45、以更高的共产党员标准为追求——重温刘少奇《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 人民网，2018 年 12 月 12 日
- 46、刘少奇共产党员修养理论的重大意义及启示 / 司顺文 // 中国社会科学网，2018 年 12 月 29 日
- 47、刘源，不负父辈教导 //《作家文摘》，2018.10.12 第 2 版

搜集、整理：唐芳